

北京文博

文 丛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博文丛·2017·第1辑 / 祁庆国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402-4464-4

I. ①北… II. ①祁… III. ①文物工作 - 北京 - 文集②博物馆 - 工作 - 北京 - 文集

IV. ①G269.2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0520号



北京文博文丛·2017·第1辑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责任编辑: 王梦楠

版式设计: 肖 晓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81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4464-4

定 价: 15.00元

北京文博



2017年第1辑（总87期）

特约专稿

- 1 谈张家园上层类型、“张家园上层文化”和琉璃河早期类型

韩嘉谷

“三个文化带研究”专栏

- 25 北京大运河概述

赵福生 蔡 蓓

- 45 明代窑运与昌平河和潮河川运道

陈喜波

- 50 从通州万亩森林公园谈大运河历史风貌的保护问题

周 良

北京史地

- 53 “石景山”古遗迹考察报告

吕玮莎

- 68 北京海淀区明代西禅寺碑考证

张文大

- 74 北京绩溪会馆遗存刻石略考

李 巍

- 80 国子监与国立历史博物馆

王琳琳

考古研究

- 89 十二平方公里项目南区N14地块汉、唐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北京文博》编辑部

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

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邮箱：bjwb1995@126.com

博物馆研究

- 104 石头“动”起来 文物也精彩
——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为例
石 奕
- 109 博物馆行业也应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白 崇

文献资料

- 113 最后的“高士”——朱家溍先生
姜舜源
- 119 北京市文物局2016年四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 白
副主任：舒小峰 孔繁峙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平 王 丹 王 岗 王丹江
王玉伟 王有泉 王培伍 王清林
卢迎红 田淑芳 白 岩 向德春
刘素凯 刘超英 齐东发 关战修
许 伟 许立华 杨玉莲 杨曙光
李 晨 李建平 肖元春 吴志友
吴梦麟 何 沛 何小平 沈其顺
宋大川 张德华 范 军 赵建明
哈 骏 侯兆年 侯 明 郝志群
徐 丽 徐 明 高小龙 高凯军
郭 豹 郭小凌 姬脉利 崔国民
葛英会 谭烈飞 薛 俭

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辑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辑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辑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辑刊声明，本辑刊将做适当处理。

主 编：祁庆国
执行主编：韩建识
编辑部主任：高智伟
本辑编辑：韩建识 陈 倩
高智伟 康乃瑶 侯海洋
特约编辑：孙 莉 雷 英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1, 2017

SPECIAL CONTRIBUTION

- 1 Discussion on the Zhangjiayuan Upper Type, "Zhangjiayuan Upper Culture"
and the Liulihe Early Type
by Han Jiagu

COLUMN OF RESEARCH ON THREE CULTURAL ZONES

- 25 Survey of the Grand Canal in Beijing
by Zhao Fusheng, Cai Fan
- 45 Transportation in Ming Dynasty, Changping River and Chaohechuan
Channel
by Chen Xibo
- 50 Discuss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s Historical Features from
the Ten Thousand Mu of Forest Park in Tongzhou
by Zhou Liang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 53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the Ancient Relics in the "Shijingshan"
by Lü Weisha
- 68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Tablet in the Xichansi of Ming
Dynasty in Haidian Distict, Beijing
by Zhang Wenda
- 74 A Brief Study of the Tablets Retained in the Jixi Hall of Beijing
by Li Wei
- 80 The Imperial College and the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by Wang Linl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 89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Tombs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n N14
Land in South Area of Twelve Square Kilometers Project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Organizer: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Book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Branch,
Science Press

URL: <http://www.bjmuseumnet.org>

E-mail: bjwb1995@126.com

MUSEOLOGY RESEARCH

- 104 Stone Move, Culture Relics Become Wonderful: A Case Study of the Beijing Stone Carving Art Museum
by Shi Yi
- 109 The Museum Industry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Side”
by Bai Chong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 113 The Final Sage: Mr Zhu Jiajin
by Jiang Shunyu
- 119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4th Quarter of 2016)
by Bureau Office of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bo*

Advisors: Li Xueqin, Lü Jimin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en:

Shu Xiaofeng, Kong Fanzhi,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Wang Dan, Wang Gang,

Wang Danjiang, Wang Yuwei, Wang Youquan,

Wang Peiwu, Wang Qinglin, Lu Yinghong,

Tian Shufang, Bai Yan, Xiang Dechun, Liu Sukai,

Liu Chaoying, Qi Dongfa, Guan Zhanxiu, Xu Wei,

Xu Lihua, Yang Yulian, Yang Shuguang,

Li Chen, Li Jianping, Xiao Yuanchun, Wu Zhiyou,

Wu Menglin, He Pei, He Xiaoping, Shen Qishun,

Song Dachuan, Zhang Dehua, Fan Jun,

Zhao Jianming, Ha Jun, Hou Zhaonian, Hou Ming,

Xi Zhiqun, Xu Li, Xu Ming, Gao Xiaolong,

Gao Kaijun, Guo Bao, Guo Xiaoling, Ji Maili,

Cui Guomin, Ge Yinghui, Tan Liefei, Xue Jian

Editor-in-chief: Qi Qingguo

Executive Editor: Han Jianshi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Office: Gao Zhiwe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Volume:

Han Jianshi, Chen Qian, Gao Zhiwei, Kang Naiyao

Hou Haiyang

Contributing Editor: Sun Li, Lei Ying

谈张家园上层类型、“张家园上层文化”和琉璃河早期类型

韩嘉谷

一、学术研究中的分歧意见

“张家园上层文化”是西周时期燕国境内诸考古学文化中目前拥有遗存点最多的一支，然而关于它文化内涵的界定，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蓟县张家园遗址经三次发掘：第一次发掘在1965年，1977年发表报告，分早、晚两期，早期为“燕山以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为其他地区少见”，没有命名^①。1979年第二次发掘，继续获得上述两种遗存，报告称早期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类型，晚期为“围坊三期文化遗存”^②。1982年笔者撰文认为：大坨头类型、围坊上层（三期）类型、张家园上层类型，是当地土著文化连续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具体指出了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下层两个文化类型的区别^③。1987年，张忠培先生等把张家园晚期遗存和围坊三期合在一起，称“张家园（围坊）上层文化”^④。1995年，李伯谦先生把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类型一起分为五期，统称为张家园上层类型^⑤，实际上是对“张家园（围坊）上层文化”的系统阐述，但其内涵已和张家园上层原点不同，此后学术界使用的“张家园上层文化”概念多和此同。1998年，赵福生、刘绪先生撰文认为：“把围坊上层与张家园上层区分为两种文化是合适的。”^⑥这是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类型关系的最早讨论。

张家园上层类型发现之初被归入围坊三期文化，是由于初发现时资料较少，但后来被称作“张家园上层文化”，则和另外一个原因有关。1962年房山考古调查^⑦，在刘李店、董家林两地发现二组面貌略有差异的西周时期燕文化遗存^⑧，均未见张家园上层类型的陶器，1984年公布的墓葬资料也是如此^⑨，于是随后的研究文章多以此为依据，把西周时期含有土著文化因素的遗存都归为“张家园上层文化”。1983年笔者把宝坻歇马台、牛道口、唐山古冶和唐山大城山的一件鬲足归为张家园上层类型^⑩。1990年又把蓟县刘家坟归入^⑪。1998年李伯谦先生把围坊第②层、涑水北福地H25、炭山H2、张家洼、玉田东蒙各庄、古冶等归入^⑫。1999年《镇江营与塔照》发掘报告认为，该遗址的商周第三期遗存属“张家园上层文化”^⑬。2002年，纪烈敏先生把蓟县青池、易县燕下都东沈村和北京西便门外古庙村等归入^⑭。这样便使西周时期燕国境内古文化的分布形成这样一个格局：除了琉璃河便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分布区。对此，对琉璃河燕文化有深入了解的赵福生、刘绪先生于1997年撰文认为，“在京津和与之相邻的部分地区，属于燕文化或含有燕文化因素发现已有不少”，“所见陶器与琉璃河者相同，仅在制作上稍显粗糙”。并列出了镇江营、塔照、张家园、邦均、东沈村、张家

洼等遗址^⑥。这里所说的燕文化，应是指《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公布的琉璃河遗址，认为“早期遗存文化因素复杂，既有强烈的周文化风格，又有浓厚的商文化气息，还有一定数量的当地土著文化成分，呈现出燕文化形成时期多姿多彩的特性”^⑦。此文对张家园上层类型、“张家园上层文化”和琉璃河早期遗存之间的关系具有独到见解，但并未引起学术界重视，近年蒋刚先生等对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做了系统分析，但还是把西周早期含土著文化因素的遗存都归入“张家园上层文化”，未对遗存中包含的大量周、商文化因素予以应有的注意^⑧。

陈光先生把“张家园上层文化”的概念扩大到最大范围，2000年《西周燕国文化初论》一文^⑨，除把涑水北封、安新辛庄克、滦县雷庄镇、迁安马哨村、小山东庄、卢龙各庄、大厂大坨头、平谷韩庄、顺义牛栏山等遗存归入“张家园上层文化”外，还把琉璃河居住址的所谓“第六等级”也纳入其中，并定性为异族遗存。该文附图七“第六等级——张家园上层文化”所举器物为琉璃河遗址早期的筒腹鬲（G1H27：2）、袋足鬲（G1H33：2）、高领鬲（G11H33：5）、簋（G3T3637^⑩：5）、直领瓮（G11H36：4）、小口瓮（G11H2605^⑪A：24）、甗（G11H27：7）、甗（G11H27：5），以及刘李店78H1的一件联裆鬲（刘78H1：6）和一件四系壶（刘78H1：7），认为“张家园上层文化”延续时间为西周早期和中期，西周燕文化延续时间为西周中期和晚期。在附图八“永定河以南的张家园上层文化（西周时期）”中，举镇江营商周三期的A型III式筒腹鬲（FZH1278：1）、E型II式鼓腹鬲（FZH957：1）、A型I式袋足鬲（FZH951：7）、A型II式和B型I式深腹盆（FZH692：4、FZH957：2）、A型II式鼓腹罐（FZH946：25）、A型

II式簋（FZH687：1）为“张家园上层文化”西周早期的陶器，又以A型VI式和C型I式筒腹鬲（FZH953：4、FZH503：11、FZH926：13）、C型III式袋足鬲（FZH967：15）、B型VI式和C型II式鼓腹鬲（FZH1324：1、FZH713：1）、A型II式鼓腹罐（FZH946：25）、D型I式深腹甗（FZH953：1）、I式浅腹甗（FZH906：3）、D型II式簋（FZH711：3）、III式四系罐（FZH896：1）为“张家园上层文化”西周中期陶器。在附图九“永定河以北的张家园上层文化（西周时期）”中，属西周早期的有张家园出土的陶器和铜器，唐山古冶的晚期陶器为西周中期。并认为“从琉璃河附近之镇江营遗址的情况看，西周中期已有一种周、商文化因素合体的文化覆盖了异族文化”。

不过上述分歧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琉璃河早期和镇江营商周三期遗存是由周、商、土著文化因素构成，只是在何种因素决定文化性质上存在分歧。赵福生、刘绪先生认为：“西周早期燕文化并不单纯，它是一种多因素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包含不少‘张家园上层类型’的土著因素，而张家园上层类型也包含一定数量周系统和商系统因素。二者的关系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关系，只不过在分布地域上，距燕都越近则周系和商系因素越多，土著因素越少；距燕都越远则土著因素越多，周系和商系因素越少，很难把二者的分布范围区分开来，也很难说何者强大，何者弱小。从这一点来说，二者很可能为一码事，即燕文化。”文章虽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种因素决定了琉璃河遗存是西周燕文化，但从文章开头强调遗址出土“成周”卜甲，以及墓葬“随葬品中的铜礼器无论组合还是器物特征都与中原周墓所见无大区别，不少铜器铭文中铸有‘偃侯’字样”等内容看，显然是把周文化因素作为决定遗存性质的主要因素，同时又顾及其他因素的存在，因此称为燕

文化而不是周文化。陈光先生则认为，在包括琉璃河居址“第六等级层面”等在内的“张家园上层文化”中，以筒腹鬲等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因素是“主体文化因素”，与之相始终的还有商文化因素，这两种因素相对于燕国政权来说都是“异族文化”。“从考古学的角度界定了西周燕国文化、西周燕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之后，可以看到周人所建的燕国最初以琉璃河都城为中心，北至永定河南岸，南到白洋淀的任丘、满城一带，但是仅距燕都数十公里的镇江营遗址和涑水炭山遗址仍是张家园上层文化的生活区”。

两种不同意见使西周早期燕国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形势。按前一种意见，燕国政权在地方上已建立了卓有成效的统治秩序，因此琉璃河都城以外的村落遗址文化面貌也多与都城渐趋一致。按后一种意见，西周早期燕国境内仍然是土著文化的世界，琉璃河都城形同土著族包围中的孤岛。要判断这两种意见哪一种是正确的，单靠强调遗存中的某种因素已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双方所说确实是“一码事”，具体例子就是琉璃河“第六等级”，在陈光先生看来属“异族文化”范畴，而在赵、刘二位先生看来却是燕文化的主体。因此在对相关遗存进行类型学界定的同时，还必须考察不同谱系因素在遗存中的发展变化，弄清哪种因素主导着遗存发展方向，决定文化性质。

赵、刘二位先生认为：“在张家园上层类型材料尚不丰富和系统的条件下，我们还不能把它划归燕文化。”可是土著文化在进入周人燕国政权后，大面积地被改造、“周化”，仍然保持传统内涵和面貌特征的数量很少，要等待张家园上层类型的资料更加丰富和系统，在时间上可能是个未知数。其实张家园遗址毕竟进行了三次发掘，发表有数十件陶器标本图像，较清楚地展示了文化内涵和面貌特征^①，如果把需要甄别的对象分别放到各自得名的原点进行考察，彼此间的联系和区别完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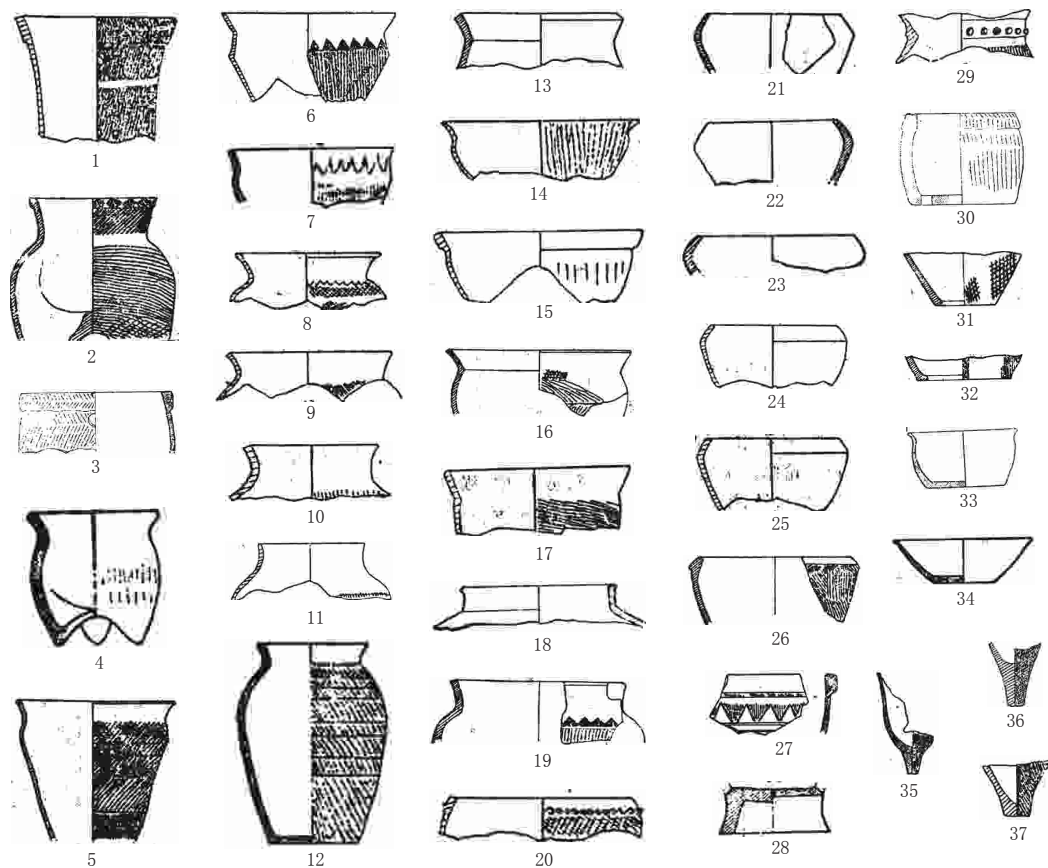
可以厘清。至于是哪一种因素主导了遗存的发展，则可通过像镇江营那样商周时期文化堆积连续、地层资料丰富而又进行了较深入研究的遗址，从中了解遗存发展中各种文化因素的变化，不难看出其中的主导因素和非主导因素。

二、张家园上层原点陶器和张家园上层类型

张家园上层类型的原点张家园上层，三次发掘共公布陶容器图像39件，包括鬲、罐、盆、甗、钵、碗、簋、缸、瓮、甗等器类（图一）。虽然复原器不多，但是作为西周时期燕国境内土著文化的面貌特征是清楚的，在此不仅可看到与围坊三期文化的时代性变异，也可看到和琉璃河早期遗存的谱系性差别，同时还可看到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相邻文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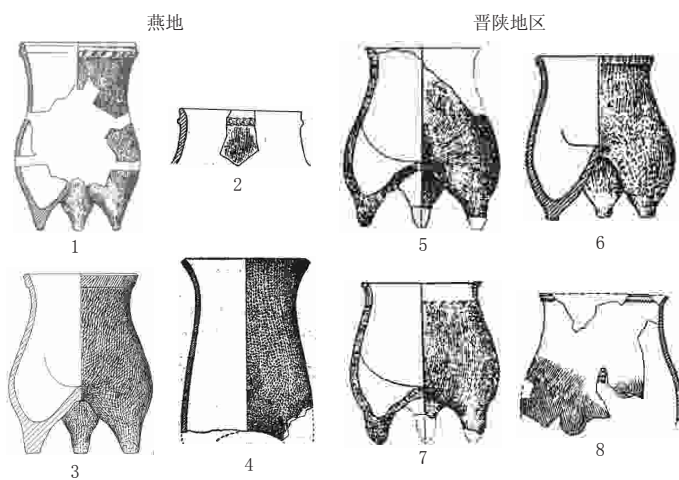
和商周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一样，鬲是最具谱系特征的器类，有图像7件，其中3件是鬲足，4件为四种不同形制的陶鬲。第一种，长颈鬲（79H1：5），夹砂灰黑陶，敞口方叠唇，领、腹间无转折是其主要特征（图一，1）。原报告称“筒形器”，造型和镇江营A型I式筒腹鬲（FZH1278：1）、青池B型深腹鬲（T1510③：1）^②、古冶长颈大鬲（T8②：331）^③同，为叙述方便起见，本文统一称为长颈鬲。此种鬲在围坊三期文化时已经出现，如塔照商周二期的B型高领鬲（FTT3011④：1）、涑水渐村^④的A型V式鬲（H3：3）等。相似器物亦见于晋陕地区，如太原光社^⑤、柳林高红^⑥、清涧李家崖^⑦、绥德薛家渠^⑧等。有学者研究认为此种鬲最早出现在山西地区^⑨（图二）。

第二种，高领鬲（87临T4②：1），夹砂灰陶，带状叠唇花边口沿，高领，鼓腹，通体饰绳纹，形制和古冶I式鬲（T8②：332）、青池B型深腹鬲（H16：1）同，本文统称为高领鬲（图



图一 张家园上层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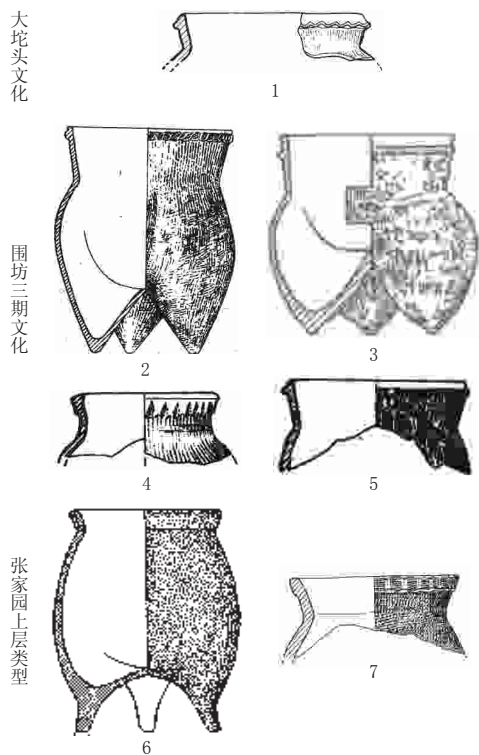
1~4.鬲(79H1:5、87临T4②:1、65T3②:1、65T3②:2) 5~13.罐(87临T4②:16、79F1:7、65T3②:3、79F1:5、79H1:3、65T1③:1、79F1:6、65H5:2、87临T4②:9) 14~16.盆(65T2④a:1、79H1:6、87临T5②:1) 17.缸(79F1:8) 18~20.瓮(65H5:1、87T6②:4、79H1:4) 21~26.钵(87临T4②:9、65H3、87临T4②:11、79H1:2、79F1:4、87T6②:1) 27、28.簋(65T1③、87临T4②:7) 29.甗(65H5:1) 30~32.甗(65F1:0、87T4③:1、87T4②:7) 33、34.碗(65T1③、65T2③) 35~37.鬲足(65F2、79H1:1、79F1:3)



图二 长颈鬲举例

1.塔照FTT3011④:1 2.渐村H3:3 3.青池T1510③:1
4.古冶T8②:331 5、6.光社 7.高红H1:4 8.李家崖AT18③:1

一, 2)。此种鬲是围坊三期文化标志性器物之一, 在蓟县围坊(T8②:6)、房山镇江营商周二期(FZH1051:1)、涑水渐村(H7上:16)、北福地(H25:2)^⑤等遗址都有出土, 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张家园上层鬲的口沿外缘是叠唇带状花边, 围坊三期是泥条锯齿状花边。高领鬲最早见于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一段, 属龙山文化晚期^⑥, 随着距今约3500年前气候逐步变冷^⑦, 牧区南移, 花边鬲亦随之广泛分布到长城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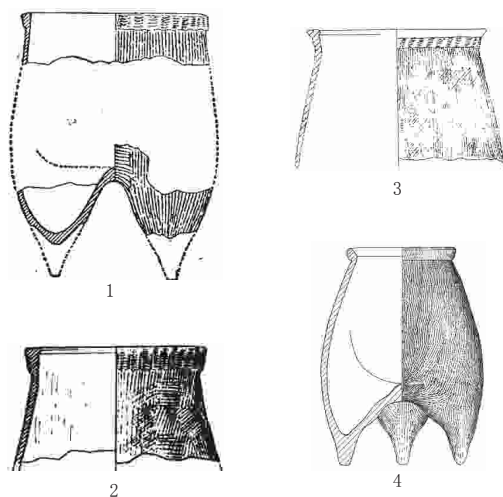


图三 高领鬲举例

- 1.张营H100:5 2.渐村H7上:16 3.北福地H25:2
4.镇江营FZH1051:1 5.围坊T8②:6 6.古冶T8②:332 7.青池H16:1

带以南地区^⑧。燕山地区年代最早的高领鬲例子见于平谷张营(H100:5),属大坨头文化晚期^⑨(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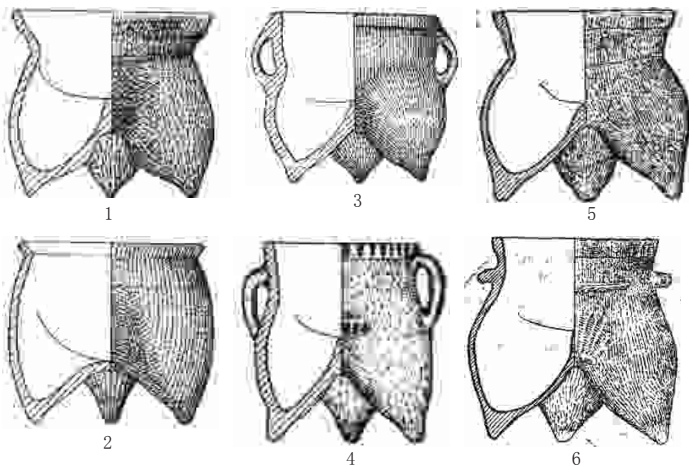
第三种,筒腹鬲(65T3②:1),泥质灰陶,直腹,口沿饰叠唇带状花边(图一,3)。张家园第一次发掘的简报称罐,形制和镇江营商周三期BV式筒腹鬲(FZH535:3)、涑水炭山高领鬲(H2:8)^⑩、琉璃河1995年报告的A型高领鬲(G11H33:5)、1996年报告的高领鬲(H108②:16、H94:3)^⑪同,本文统称为筒腹鬲。其中有的略呈侈沿,如镇江营商周三期A型VI式筒腹鬲(FZH953:4)、琉璃河B型高领鬲(G11H3:18)等。从青池A型深腹鬲



图四 筒腹鬲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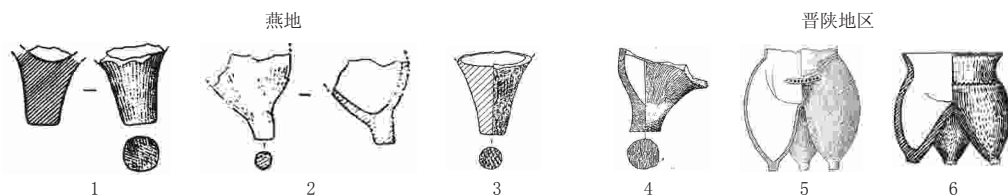
- 1.炭山H2:8 2.镇江营FZH535:3
3.琉璃河G11H3:18 4.青池T1507③b:1

(T1507③b:1)看,此种鬲应是围坊三期文化的小口鼓腹鬲(T5①:1)的变异,由于受长颈鬲影响使侈沿变得不明显甚至消失,又受关中地区叠唇带状花边鬲影响口沿多做成叠唇带状花边(图四)。叠唇带状花边晚商时期在关中地区颇为流行,见于先周文化^⑫的郑家坡^⑬,以及和先周文化关系密切的碾子坡类型^⑭、被认为是姜戎遗存的刘家文化^⑮。碾子坡遗址分居住址和墓葬两部分,都有饰带状花边的陶鬲出土,如居住址的H106:5、



图五 关中地区带状花边鬲举例

- 1.郑家坡H14:29 2.郑家坡H4:32 3.刘家村M7:2
4.刘家村M49:12 5.碾子坡H134:5 6.碾子坡M109:1



图六 平跟鬲足举例

1.塔照FTH70:22 2.北福地H25:3 3.青池H2:5 4.光社 5.高红H1:5 6.李家崖AT13H1:1

H134:5、H131:74, 早期的M660:1、采0:2, 晚期的M109:1等。刘家文化在刘家村发现的都是墓葬, 分六期, 一期和齐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接近, 六期为西周文武之际, 前后都有带状花边鬲。郑家坡遗址分三期, 早期约当二里岗下层期, 晚期约当文王作丰之时, 带状花边鬲有早期的T4G2:1、中期的H4:32、H14:29等, 其中T4G2:1和H4:32皆为瘪裆鬲。张家坡遗址^⑥的D型鬲也多见带状花边, 如标本H18:128、H18:127等。比较这些花边形态, 郑家坡、碾子坡、刘家村的带状花边更具原创特征(图五)。因此有理由认为, 燕地的这种带状花边是随周人势力的到来而传入的, 西周早期突然出现并迅速广泛流行, 全面替代朱开沟文化开始的泥条锯齿状花边。

第四种, 甗形鬲(65T3②:2), 夹砂灰陶, 卷沿鼓腹联裆, 竖压横排细绳纹留抹平痕迹(图一, 4), 造型和纹饰均和张家园遗址下层大坨头文化的同类陶鬲相近, 涑水渐村H9:9和此近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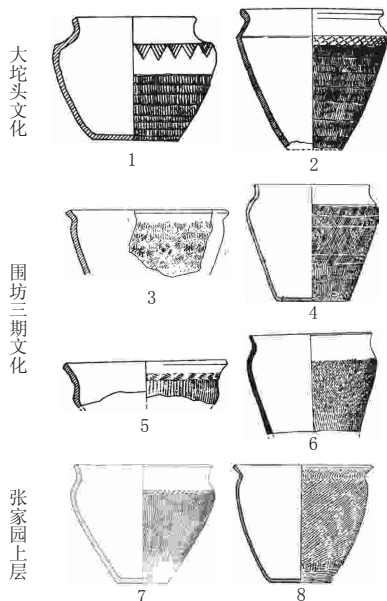
除上述四种外, 在第一次发掘中“出少量折沿浅腹鬲片, 与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鬲相似”。第二次发掘也“发现了这一地区西周早期常见的宽折沿, 矮足, 特粗绳纹鬲的口沿和残片”。这些应是商系袋足鬲和周系联裆鬲, 只是过于残碎, 均未见图像。

另有3件鬲足(65F2、79H1:1、79F1:3), 皆平跟, 有的足底压印绳纹, 形态粗大, 独具特色(图一, 35~37)。青池T1015③:1(长颈鬲)、古冶T8②:332(高领鬲)都属这种鬲足。此种鬲足亦见于围坊三期文化的塔

照, 如标本FTH70:22、FTT3105④:5等。晋陕地区出土长颈鬲的一些遗址也流行此种鬲足, 如太原光社、柳林高红H1:5、绥德薛家渠(H1:32)、清涧李家崖(AT13H1:1)等(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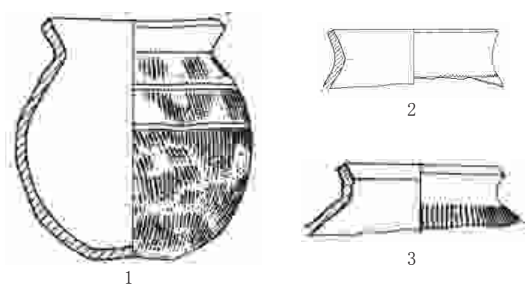
罐的形制多样, 有图像11件, 除2件器底外, 其余9件按形制可分五种。

第一种, 大口折肩罐, 3件(87临T4②:16、79F1:7、65T3②:3), 皆侈沿、折肩、深腹, 口径和腹径接近(图一, 5~7)。相似形制有青池T1609④:2、炭山H2:1等。此种罐在大坨头文化时已出现并流行, 见于房山塔照、昌平雪山^⑧、怀来官庄^⑨等, 张营出土达数十件之多。围坊三期文化, 继续见于房山塔



图七 大口罐举例

1.雪山M42:3 2.塔照TH105:2 3.渐村T7下:17 4.围坊T5①:7 5.塔照FTT2810④:8 6.龙坡T3⑦:3 7.青池T1611②:1 8.炭山H2:1



图八 中口罐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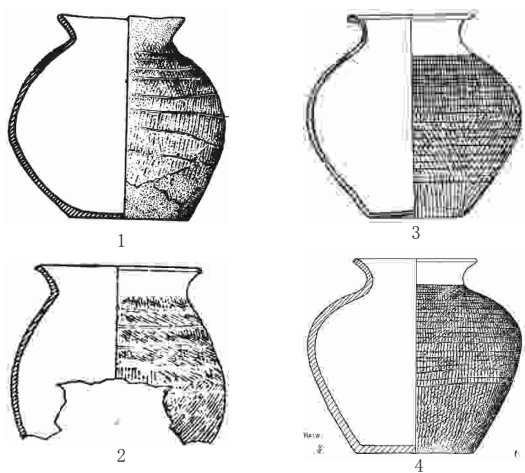
1.要庄M1:1 2.青池T1510②:1 3.大坨头

照 (FTT2810④:8、FTH78:4)、蓟县围坊 (T9②:3、T5①:7)、涑水渐村 (T7下:17、T3⑤:20)、平谷龙坡 (T3⑦:3)^④等,是当地传统器物 (图七)。

第二种,中口罐1件 (87临T4②:9),方唇、折沿,口径22厘米 (图一,13),相似形制见于青池 (T1510②:1)、满城要庄 (M1:1)^⑤和大厂大坨头西周灰坑^⑥ (图八)。

第三种,小口鼓腹罐3件 (79F1:5、79H1:3、65T1③:1),均作侈沿、鼓腹,饰绳纹 (图一,8~10)。形制和镇江营FZH896:37、炭山0:1等相近,而和刘李店78H1:8^⑦、青池H2:11等卷沿的风格略有不同 (图九)。

第四种,小口广肩深腹罐,1件 (65H5:2),泥质灰陶施黑陶衣,侈沿、圆肩、深腹,饰交叉绳纹和横弦纹 (图一,12),接近古冶的瓮 (T2②:206)、镇江营A型鼓腹罐 (FZH477:2)、围坊IV式瓮 (T8②:22),基本造型和藁城台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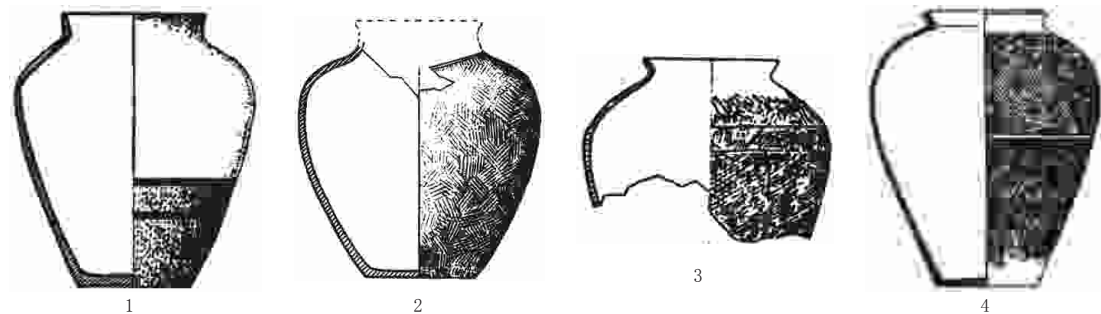
图九 小口鼓腹罐举例

1.镇江营FZH896:37 2.炭山0:1 3.刘李店78H1:8
4.青池H2:11

F6:53相似^⑧ (图一〇)。杨建华先生将古冶罐和李家崖AT18③:4陶罐相联系^⑨,但从形制特征看,后者更和龙坡T1⑦上:1、青池T1609④:1、T1508③b:6小口罐相似。此种罐同时也见于高红、李家崖和薛家渠,是燕地和晋陕地区之间联系的又一种器类。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岔^⑩、陕西安塞县西圪渠^⑪遗址的陶罐也和此有一定关联,前者被命名为西岔文化,后者被认为是南迁的朱开沟文化遗存^⑫ (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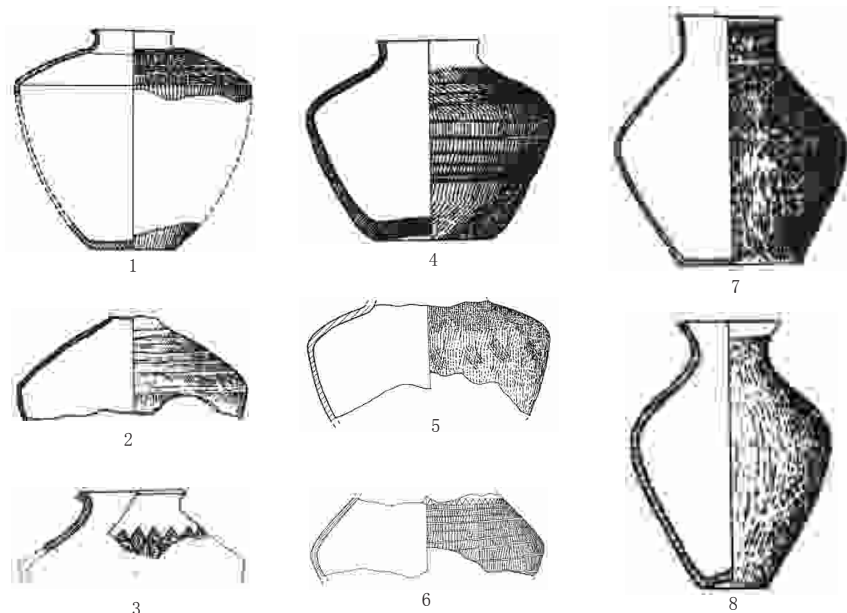
第五种,直领罐1件 (79F1:6),小口、直领、圆肩、鼓腹,领、腹间无转折 (图一,11)。造型和龙坡D型罐 (T1⑦:2、T1⑦上:1)、镇江营C型I式鼓腹罐 (FZH694:4) 近似,太原光社、清水河县西岔有和此相似的器物 (图一二)。

瓮3件,有两种形制。①直领瓮2件



图一〇 小口深腹罐举例

1.古冶T2②:206 2.镇江营FZH477:2 3.围坊T8②:22 4.台西F6:53



图一— 小口折肩扁举例

1.李家崖AT18③:4 2.高红H1 3.薛家渠T1①:1 4.龙坡T1⑦上:1 5.青池T1508③b:6 6.青池T1609④:1 7.西岔渠H3:10 8.西岔H43:4

(65H5:1、87T6②:4)直领、广肩(图一,18、19),造型和镇江营商周三期A型瓮(FZH1278:2)、琉璃河B型小口瓮(95G11T2605③A:24)近似,但口沿等细部特征不同。②敛口瓮1件(79H1:4),敛口、鼓腹,饰绳纹,沿下有附加堆纹一周,较少见(图一,20)。

盆3件,分浅腹和深腹两种。浅腹盆2件,65T2④a:1敞口、束颈、急收腹,通体绳纹。79H1:6形制略同,外叠唇,绳纹抹平(图一,14、15)。深腹盆1件(87临T5②:1),侈沿、弧肩,饰粗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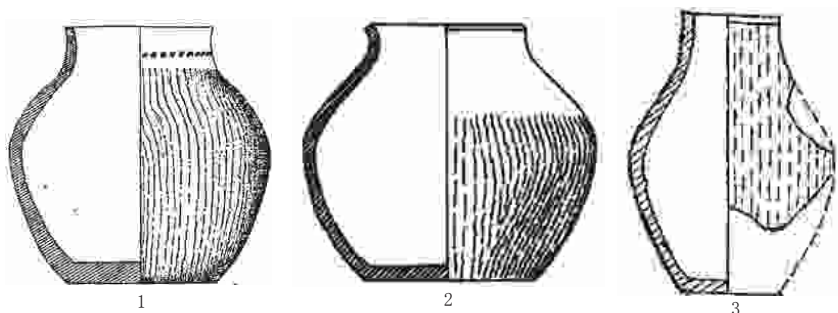
纹加横弦纹(图一,16),形制和琉璃河I式盆(G11T2603⑧A:10)、镇江营深腹盆(FZH692:4)、青池A型深腹盆(H2:10)相似。

钵是又一种特征突出的器类,有标本6件,皆敛口、折肩或折肩略缓,1件饰绳纹(87T6②:1),其余均素面(图一,21~26)。敛口钵也是燕山地区的传统

器物,属大坨头文化的如雪山M34:2、张营T0104④B:22等,属围坊三期文化的如龙坡T1⑦:1、渐村T4④:20等,和张家园上层同时期的如炭山H2:5、古冶T2②:75等。绳纹敛口钵数量略少,与素面钵同时流传,风格一致,属大坨头文化的如围坊T1③:19,属围坊三期文化的如围坊T5①:5,与张家园上层同时的如青池T1507③a:5(图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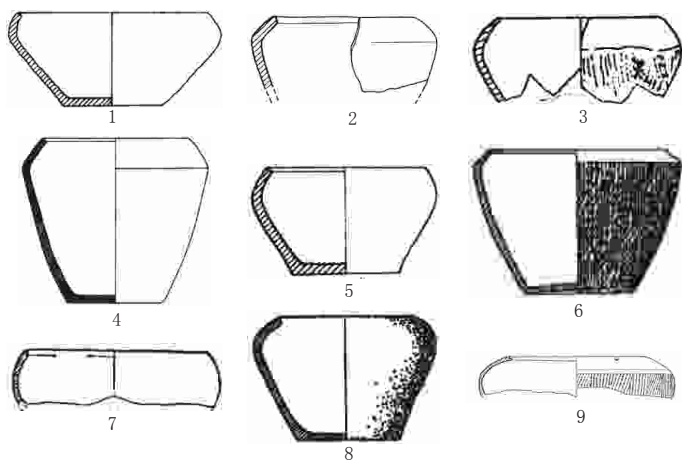
甗3件,有盆形和钵形两种(图一,30~32)。盆形甗二件,87T4②:7有璧形算托,87T43②:1无。钵形甗1件(65F1:0),直腹,口微敛,叠唇附加堆纹,通体饰粗绳纹,底穿圆形算孔。

甗腰1件(65H5:1),压印窝点纹一周,无腰隔,是燕地传统形式(图一,29)。



图一二 直领罐举例

1.光社 2.龙坡T1⑦:2 3.西岔H30:1



图一三 敛口钵举例

1.雪山M34:2 2.张营T0104④B:22 3.围坊T1③:19 4.龙坡T1⑦:1 5.渐村T4④:20 6.围坊T5①:5 7.炭山H2:5 8.古冶T2②:75 9.青池T1507③a: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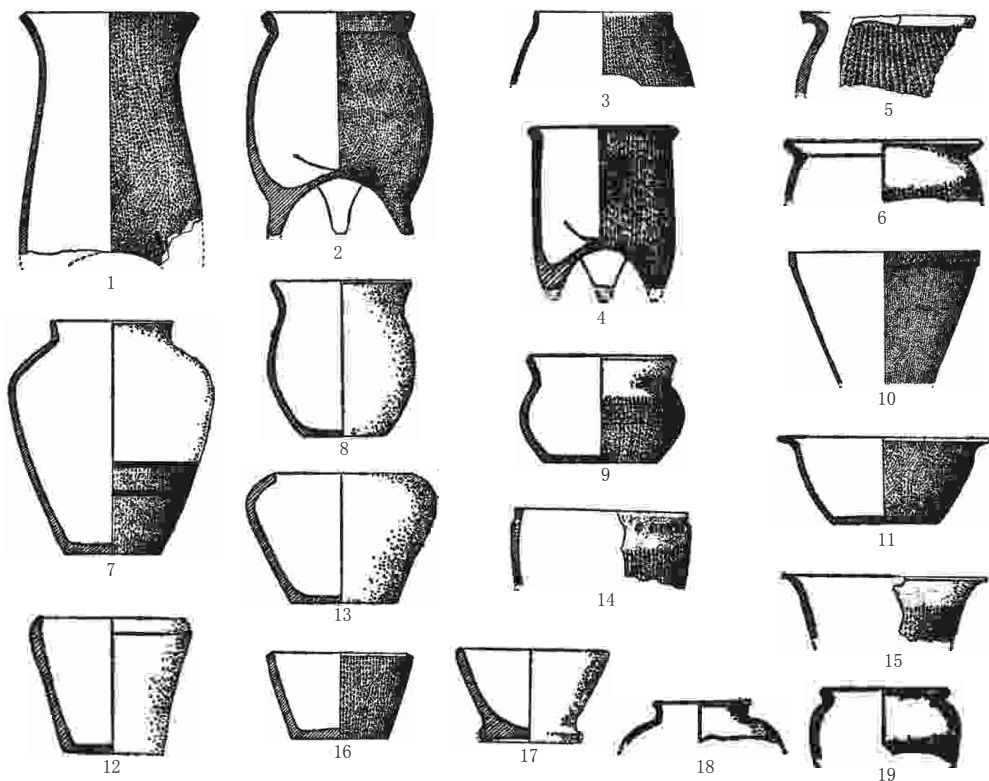
簋2件。一件是圈足(图一, 28), 另一件为腹片, 厚唇、弧腹, 饰三角划纹和细绳纹(图一, 27)。此种簋在大坨头文化时已出现, 如张营F1:6, 围坊三期文化亦有, 如渐村T11②:1, 西

周时期的如镇江营三期A型I式簋(FZH1025:5)、青池T1508③b:8等, 是燕地流传时间较长的商系器物之一。

缸1件(79F1:8), 厚胎方唇, 高领微侈, 直腹, 饰绳纹(图一, 17)。

碗2件, 造型不同。65T2③, 夹砂红陶, 敞口、斜腹、平底, 表面磨光(图一, 34)。65T1③, 泥质灰陶, 侈沿、弧腹、平底(图一, 33)。

上述陶器展现了张家园上层的基本面貌特征, 其中以高领鬲、长颈鬲、筒腹鬲、大口折肩罐、小口深腹罐、直领罐、敛口钵、浅腹盆等器物最具代表性。陶器中包含有一些琉璃河早期的商周系文化因素, 如发掘报告中提



图一四 古冶晚期陶器

1.T8②:331 2.T8②:332 3.T1②:165 4.T3②:77 5.T1②:100 6.T10②:337 7.T2②:206
8.T7②:81 9.T11②:331 10.T6②:115 11.T13②:328 12.T1②:124 13.T2②:75 14.T1②:145
15.T3②:141 16.T1②:78 17.T2②:74 18.T1②:124 19.T1②:125

到的“宽折沿，矮足，特粗绳纹鬲的口沿和残片”，以及图像中的深腹盆、饰三角划纹和细绳纹的厚唇簋等，但都数量不多，有的只在文字中有报道，没有图像，显然是因为数量少和过于残碎，不居主要地位。可见构成这个陶器群的主要成分是土著系陶器，周商系陶器只占较少部分，和琉璃河早期存在基本区别，和“张家园上层文化”也不一样。

和张家园上层陶器群相似的遗存，目前所见只有唐山古冶晚期和宝坻牛道口三期^⑨两处。在古冶晚期陶器中，张家园上层的特征性器物，如长颈鬲、筒腹鬲、高领鬲、敛口钵、小口深腹罐、小口鼓腹罐等，都可找到相似形式，和琉璃河早期相通的周、商文化因素，20多件陶器图像中只有2件陶鬲残片，一件是袋足鬲（T1②：100），另一件可能是联裆鬲（T10②：337），数量不多，和琉璃河早期明显不同，和张家园上层相接近（图一四）。牛道口三期陶容器标本共6件，其中H10：2鬲口沿是筒腹鬲残片，H1：3盆口沿可能是长颈鬲残片，其他如小口罐（H1：4）、敛口钵（H1：6）等皆和张家园上层同类器物相同，柱状鬲足也和张家园上层79H1：1等一致。张家园上层、古冶晚期、牛道口三期三处遗存面貌特征基本相同，地缘相连，一起构成西周时期燕国境内一支独具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张家园上层类型的名称依然成立，只是分布区域偏处距离燕国都城较远的燕山南麓东部，数量较少，尤其是长期一直淹没在“张家园上层文化”中，被认为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相同或是其一个类型，未被人们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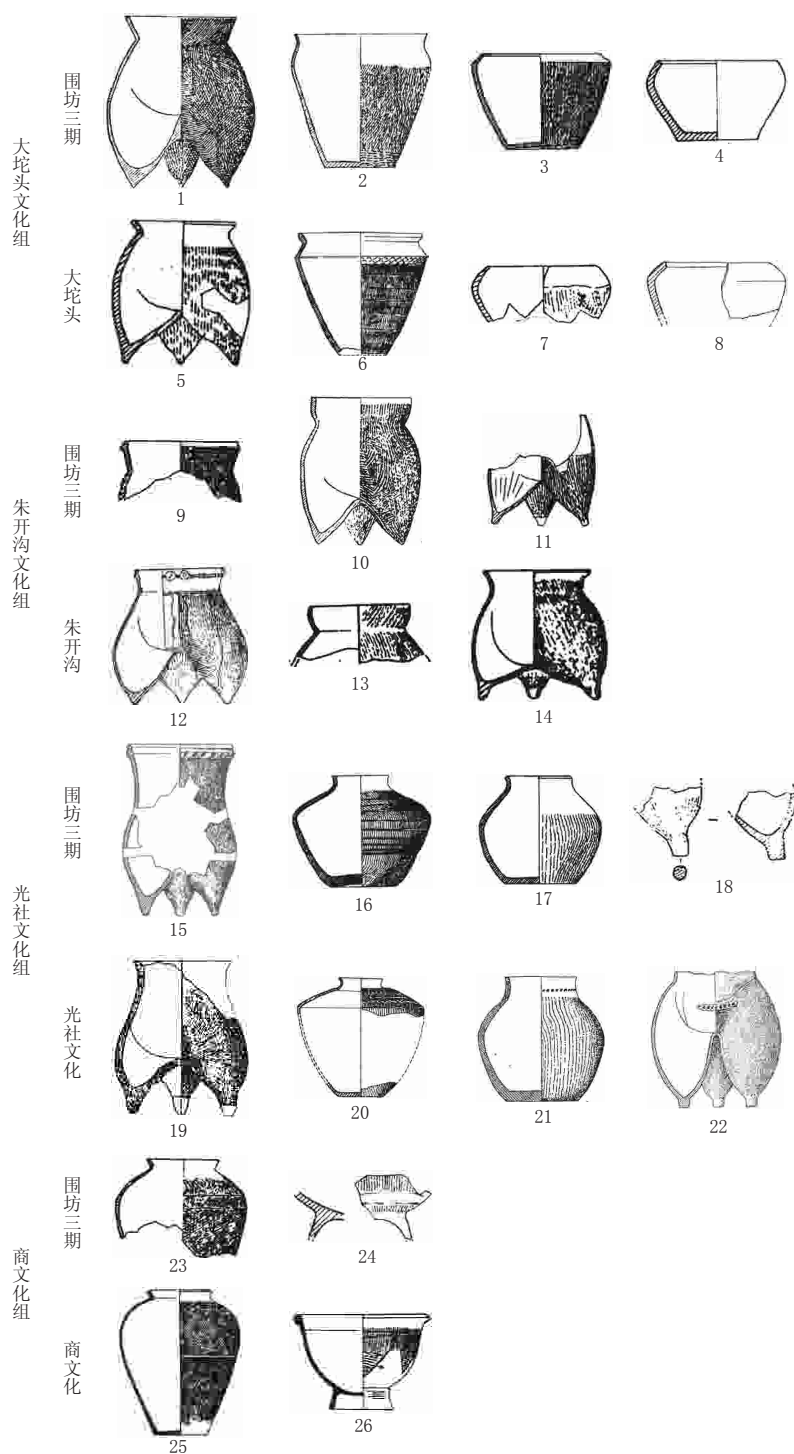
三、张家园上层类型和围坊三期文化

张家园上层类型被淹没，是从被误读为围坊三期文化开始的，因此要成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首先要厘清和围

坊三期文化的联系和区别。围坊三期文化的原点是蓟县围坊三期遗存，目前见诸报道的此类遗存已积十余处，除围坊外，还有三河冯家府^⑩、卢龙阡各庄^⑪、双望^⑫、玉田东蒙各庄^⑬、城关五里桥^⑭、平谷龙坡^⑮、平谷刘家河^⑯、滦县后迁义^⑰、房山刘李店^⑱、房山镇江营和塔照^⑲、涞水北封^⑳、涞水渐村^㉑、易县北福地^㉒、唐县洪城^㉓等，分布范围从燕山南麓至唐河流域。这支文化主要承袭大坨头文化，陶器中的许多基本器类，如鼓腹鬲（围坊T5①：2）、大口折肩罐（围坊T5①：7）、敛口钵（围坊T5①：5、T8②：4）、无腰隔甗（围坊T5①：1、T4②：21）等，都可在大坨头文化找到原型^㉔。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相邻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面貌发生较大改变，主要来自西部地区。

较早是受朱开沟文化^㉕的影响，不晚于大坨头文化晚期，如张营的H100：5高领鬲，围坊三期时（围坊T8②：6）成为标志性器物之一。围坊三期的足跟鬲（围坊T8②：7）和凹沿鬲（围坊T4②：32）在朱开沟文化乙组陶器中能見到相似形式^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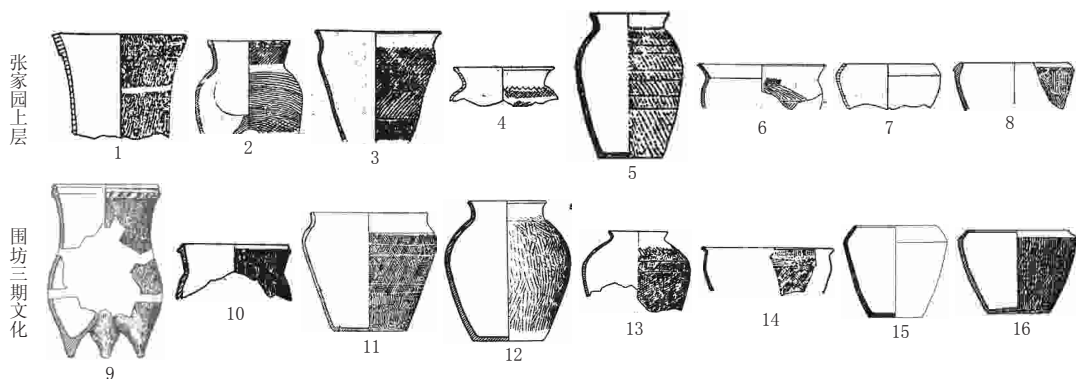
约在商代早中期之际，商朝对北方地区曾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㉗，朱开沟文化结束，但燕山南麓来自西部地区的影响丝毫未减，主要是晋陕地区的光社文化和李家崖文化，代表性器物如领腹间无转折的长颈鬲（塔照FTT3011④：1、渐村T2④：4）、平跟鬲足（塔照FTH70：22、北福地H25：3），小口折肩深腹罐（龙坡T1⑦上：1）、直领罐（龙坡T1⑦：2）等。其中长颈鬲和平跟鬲足见于光社文化的光社、高红、东大堡和李家崖文化的李家崖、薛家渠等遗址，直领罐见于光社和西岔文化的西岔遗址，小口折肩深腹罐见于高红、李家崖、薛家渠、西岔和南迁朱开沟文化的西岔渠，这一波的影响从围坊三期开始，在和山西接壤的北京、冀中地区尤为明显，如塔照、渐村、北福地、龙坡等遗址，津、唐地区相对



图一五 围坊三期文化来源举例

1.围坊T5①:1 2.围坊T5①:7 3.围坊T5①:5 4.渐村T4④:20 5.大坨头H2:14 6.塔照TH105:2 7.围坊T1③:19 8.张营T0104④B:22 9.围坊T8②:6 10.围坊T8②:5 11.围坊T8②:7 12.朱开沟M1064:1 13.寨子塔T2①:3 14.寨子塔H109:1 15.塔照FTT3011④:1 16.龙坡T1⑦上:1 17.龙坡T1⑦:2 18.北福地H25:3 19.光社 20.李家崖AT18③:4 21.光社 22.高红H1:5 23.围坊T8②:22 24.渐村T11②:1 25.台西F6:53 26.苗圃北地H113:2

淡薄，于是使围坊三期文化显现出围坊和塔照两个面貌特征略显差异的地方类型。有学者认为“永定河以东的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是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向东发展形成的一个地方类型”。其实围坊遗址三期陶器的来源比较清楚，主要承袭大坨头文化，同时又受到朱开沟文化影响，不见长颈鬲、平跟鬲足、小口折肩深腹罐等源自晋陕地区的器物。这类器物在津、唐地区出现已是在西周时期，如平跟鬲足见于青池（H2:5、T1510③:1）、长颈鬲见于古冶（T8②:331、T1510③:2）、小口折肩深腹罐见于青池（T1508③b:6、T1609④:1），皆属周代，意味着围坊三期文化时存在的塔照和围坊两个地方类型，西周时在燕国政权统一管理下差别已趋缩小。这些来自晋陕地区的大量文化因素，为“燕亳”和位于汾河流域的“燕京之戎”可能存在亲缘关系提供了证据^⑧，这两个氏族集团名称相近，地理相邻，故有学者推测“燕亳”是



图一六 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陶器

1. 张家园79H5:1 2. 张家园87临T4②:1 3. 87临T4②:4 4. 79H1:3 5. 65H5:2 6. 87临T5②:1 7. 79H1:2 8. 79H1:4 9. 塔照FTT3011④:1 10. 围坊T8②:6 11. 围坊T5①:7 12. 塔照FTH30③:17 13. 围坊T8②:14 14. 围坊T3②:11 15. 龙坡T1⑦:1 16. 围坊T5①:5

“燕京之戎”来到燕地的一支^①，从今天的考古资料看，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由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商文化分布区相邻，因此遗物中也常见商文化因素，如围坊三期小口深腹罐（围坊T8②:22）的相似器物见于台西，渐村的厚唇簋和殷墟同类器物相似。这些器物沿袭相传，在当地不同时期都能零星见到（图一五）。

张家园上层类型陶器基本上承袭围坊三期文化，包括高领鬲、长颈鬲、大口深腹罐、小口鼓腹罐、小口深腹罐、深腹盆、折肩钵，以及属商系因素的厚唇簋、小口深腹罐等，都可在围坊三期文化找到相同或相似器物，因此是围坊三期文化的延续（图一六）。有人把天津晚商至西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为张家园上层类型，第三类为围坊三期文化，认为“直至目前还没有发现第一类遗存和第三类遗存在同一个遗址里同时或先后存在的层位关系，因此无法直接判断二者的相互年代关系。以往天津考古界提出的第一类遗存晚于第三类遗存，第一类遗存是由第三类遗存发展而来的意见，既缺乏层位学的证据，又缺乏类型学的支持，因此没有说服力”^②。此说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两类陶器群之间大量存在的承继关系，而正是这种承继关系，明确提供了张家园上层类型由围坊三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类型学证据，也

是张家园上层遗存初发现时被归入围坊三期文化的原因。

至于层位学证据，已发表的资料中至少有如下几处：①镇江营—塔照遗址属商周二期的H698被属商周三期的H946、H697直接打破，商周二期“相当于商后期”，研究者将其归入围坊三期文化。商周第三期遗存中的主体成分在河北省的保定地区（炭山二期）、京津地区均有分布（古冶上层、张家园上层），被称为“张家园上层文化”，尽管把古冶上层、张家园上层称为“张家园上层文化”不妥，但其中的土著因素无疑反映了张家园上层类型和围坊三期文化前后叠压的层位关系。②古冶遗址“晚期文化层”叠压“中期文化层”，中期文化层多数器物具有大坨头文化晚期特点，但其中的泥条附加堆纹锯齿状花边鬲（T1③:103）是围坊三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晚期文化层陶器群则和张家园上层相似^③。③据蒋刚先生介绍：“南水北调工程中河北易县七里庄遗址，发现第三期和第四期遗存分别属于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和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类型。”^④④宝坻歇马台遗址^⑤渠西T1②:9“B型高领凹沿鼓腹鬲与河北渐村第三期遗存中出土的同类鬲颇为相近”，“大致相当于晚商时期”。渠东T1②:3、T5②:10 C型鬲“见于北京琉璃河遗址和北京房山镇江营遗址西周早期遗存”，叠

唇柱足鬲残片“是张家园遗址上层的代表器”，皆属西周时期，表明晚商和西周早期两个不同时期遗存共存于同一遗址，只是报告作者把二者归为同一文化期。其实与B型高领凹沿鼓腹鬲的渠西T1②共出的只有1件尊（渠西T1②：8），无论是地层还是出土遗物，都无法证明和出土C型鬲的渠东T1②、T5②等属同时期地层。

尽管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类型陶器群之间有如此紧密的承继关系，但还是不能把二者归为同一考古学文化，因为在文化内涵、面貌特征和年代方面都存在重要差别，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陶系。围坊三期“陶质以灰砂褐陶为主，约占百分之五十，泥质陶的比例明显增加约占百分之二十五，还有少量的夹砂红陶和泥质褐陶等”。同样也是由李经汉先生对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中对所获陶片的叙述：“以夹砂灰陶为主，夹砂红褐陶次之，还有少量的泥质褐陶和泥质灰陶。”

二是纹饰。围坊三期陶器多饰绳纹，有并列压印和交叉拍印两种，报告发表的陶器标本中，第2层主要是压印绳纹，有少数交叉绳纹，到第1层则都是变为交叉绳纹，张家园上层也大量流行交叉绳纹。纹饰的另一个特征性差别便是上面说到的陶鬲口沿“花边”，围坊三期的泥条堆纹锯齿状花边，到张家园上层一律变为叠唇带状花边，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周人势力的进入，使流行于关中地区的带状花边也随之进入，并且全面替代原先的泥条锯齿状花边。

三是器类。围坊三期的Ⅰ、Ⅱ式鬲均不见于张家园上层类型，而张家园上层类型中与琉璃河西周的相通因素，如袋足鬲、联裆鬲、深腹盆等，自然也见于围坊三期。这类器物数量不多，但却是张家园上层类型区别于围坊三期的年代标志。

四是分布范围。围坊三期文化分布范围从燕山南麓到唐河流域，张家园上层类型的分布范围只见于燕山南麓东部地区，

二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类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大体如此，也是应把二者区分为前后两个考古学文化的原因。但二者毕竟前后承继，遗迹和遗物都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在墓葬方面更是如此。相关墓葬已发现十余处，包括平谷刘家河^①、卢龙阡各庄^②、滦县后迁义^③、遵化西三义村^④、蓟县张家园^⑤、刘家坟^⑥、滦县陈山头^⑦、迁安马哨村^⑧、小山东庄^⑨、房山镇江营^⑩、昌平白浮^⑪等，按年代大致可分为三个组合。

第一组只有平谷刘家河一处，出土有鼎、鬲、甗、爵、卣、甬、盘、盂、甗等商式青铜礼器，共出土具有典型燕山地区土著文化特征的金臂钏、金耳环等器物，表明是一座与商政权有着密切关系的土著族首领墓葬。铜器年代参差不一，报告认为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不晚于殷墟一期，多数学者定为殷墟一期^⑫，但其中爵的造型已接近殷墟二期^⑬，墓地附近有围坊三期文化居住址^⑭，因此可归为围坊三期文化^⑮。

第二组有卢龙阡各庄、滦县后迁义、陈山头、遵化西三义村、蓟县张家园、迁安马哨村、小山东庄七处，葬俗都为东西向，随葬器物除燕山地区常见的斝斧、弓形器、金臂钏以及形制和金臂钏相同的金耳环等器物外，还有以鼎、簋为组合的青铜礼器。小山东庄、后迁义、马哨村更有具围坊三期文化典型特征的鬲、钵等陶器同出，故蒋刚先生等将之归入围坊三期文化^⑯。以鼎、簋为组合的“重食”制度是周人礼俗^⑰，因此这是燕山地区一批接受周人礼俗的土著族首领墓葬。只是此种礼俗和周人相联系，因此有人对张家园墓的性质和年代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张家园、刘家坟以铜鼎、簋为随葬器，据器形、组合和铭文，知为周人墓”。“周人铜器墓在张家园四期遗址里出现，商周陶器在遗址里和土著陶器共生，明白地反映出随着周初分封，土著文化被涵化与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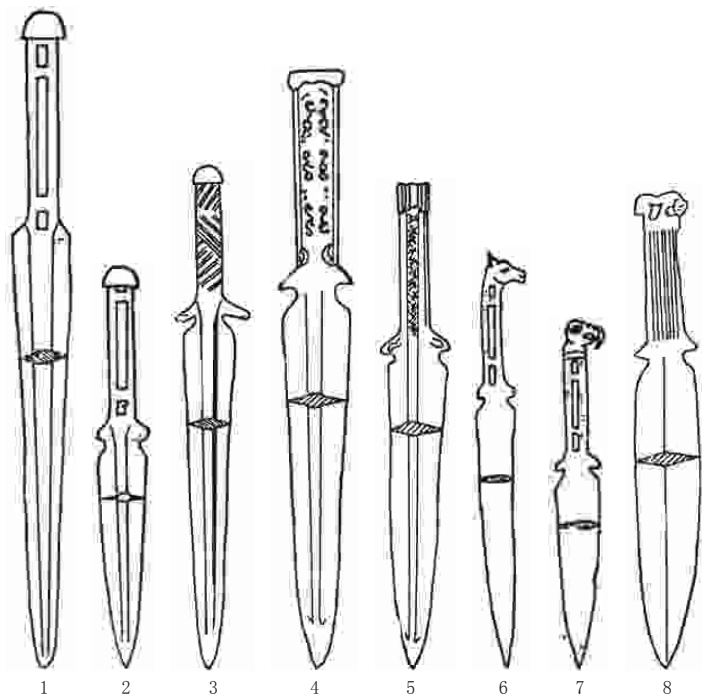
化形成的过程”^⑨，年代“与张家园上层晚段遗存的关系尤为密切”^⑩。然而这些意见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这种礼俗在燕山地区出现是在武王克商以前的商代晚期，与武王克商后分封同姓或异姓诸侯无关。而且这种“重食”墓葬已发现七处之多，表明当时燕山地区必是发生了重大事件，才使这种礼俗一度成风。笔者认为此现象的出现与古籍所记商代末年孤竹君归周事件有关^⑪。

《史记·周本纪》记：“公季修古公遗道，笃於行义，诸侯顺之。”又记：“西伯曰文王，斋遵后稷、公刘之业……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这是周人克商前为争夺民心而展开的政治攻势，结果以周人获胜告终，使燕山地区氏族小国纷纷归周，为后来召公建国铺平道路。《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记孤竹在今滦河下游的卢龙一带，阌各庄墓的地望、年代和文物特征都与之相符，不应是偶然巧合。七处墓地表明当时归周的不应只是孤竹，小东山庄墓所在的迁安、迁西一带是汉令支县地，周代的令支国应在此。令支是孤竹传统盟邦，曾一起参与山戎“病燕”^⑫，墓葬出土物表明商末时也孤竹一起归周。蓟县一带是汉无终县地，周代的“无终子国”在此。无终的历史远早于周代，《列子·汤问》云：“禹之治水也，迷而失涂，谬之一国，滨北海之北，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其国名曰终北。”表明无终约在夏代已经存在。张家园遗址1965年发掘时，在第四层大坨头文化地层内出土有铜刀、耳环等小件铜器，显示出当时可能已是此氏族的聚邑^⑬，商代末年为摆脱商朝暴政，也和孤竹等一起归周^⑭。张家园遗址三期是大坨头文化，四期是张家园上层类型，中间有一段相当于围坊三期文化的间隔，张家园墓属这个时期，在年代上早于张家园上层，绝不能把张家园墓和张家园四期（即张家园上层）相混，墓葬出土

铜器整体早于黄土坡燕国墓^⑮也可说明这一点。张家园上层陶器还表明，虽然该陶器群在周政权影响下渗入了一定的周文化因素，但整体面貌依然基本保持传统特色，并没有被涵化而成为燕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组有镇江营、刘家坟、白浮三处，皆属西周时期，情况彼此有别。镇江营商周遗存三期发现五座墓葬，其中四座为成人墓，皆头向东，有木质葬具，除FZM6发现骨珠项饰外，其余均无随葬品，按葬俗应属土著。可是按地层，此墓葬属镇江营遗址商周遗存三期，其居住址已是被认为和镇江营早期类型是“一码事”的遗存，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只能认为此处燕都郊外的土著村落，入周后被改造而“周化”，但传统习俗的变化滞后于日常生活的变化，因此墓葬仍然保持东西向习俗。

刘家坟发现两座墓葬，皆东西向，随葬鼎、簋为组合的青铜礼器，和张家园四座商周之际的墓葬一脉相承，应也是无终国墓。但刘家坟居住址出土陶器中包含的周文化因素十分突出，与近年发表的蓟县青池西周时期青铜文化遗存基本一致，后者陶器群情况是：“深腹、鼓腹、矮足三种陶鬲以及敞口盆、小口罐、簋、甗、豆等器，见于房山琉璃河早期西周早期文化，是早期燕国文化的常见器物。但数量较多的敛口钵、大口罐、盆等器多见于张家园上层、唐山古冶等张家园上层文化遗存，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征。”^⑯基本上已是和镇江营早期“一码事”的遗存，只是地方特色较为突出。刘家坟遗址距张家园约5公里，墓葬和居住址遗存之间出现此种变化，应是无终国入周后接受子爵封号，继续奉行周人礼制，已被纳入了燕国政权的政治轨道，只是墓葬和镇江营墓一样，传统习俗变化滞后于日常生活变化，因此依然保持着传统特点。可是刘家坟和张家园居住址遗存之间的差别表



图一七 白浮和南山根青铜短剑
1~3、6、7.白浮 4、5、8.南山根

明，无终国首领在把聚邑从山地迁到山前平原的同时，却有一部分氏族成员回到了祖地张家园居住，继续维持着土著文化传统。

昌平白浮的三座墓葬，年代和族属都存在争议。年代方面，主要是西周早期还是中期之争，焦点是2件陶鬲，相似形制在镇江营商周三期都有出土，很难据此作出结论。不过墓葬出土的兵器却可作参考，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原商周式兵器，如Ⅰ式戈、Ⅲ式戈等；第二类是长城地带青铜文化的传统形式，如铃首剑、兽首刀剑等；第三类也具有长城地带青铜文化兵器的特点，但更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同类兵器接近，如带有八字形剑格的韞首、鹰首、马首等刀剑（图一七）。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山戎遗存，约在西周早中期之际或稍后进入燕山南麓“病燕”，导致燕国由早期繁荣走向长期衰萎，白浮墓出土具有夏家店上层文化特征的兵器，应是受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时间在西周早中期之际^⑩。

族属方面，主要是有燕国贵族^⑪、土著族首领、殷遗贵族^⑫等不同看法，前者强调墓葬方向和随葬的青铜礼器、陶器，后者从文献资料追溯其渊源。笔者曾将之定位为𠄎（其）族墓葬^⑬，似乎也只有从此角度，才能解释葬俗和出土遗物中多种因素共存的现象。2、3号墓出土100多片卜甲残片，可辨文字有“𠄎祀”“𠄎尚上下韦馭”等，虽尚不能直接证明此𠄎即是马哨村铜簋上族徽的𠄎，但铜戈和铜戟上的“兀”字无疑是族徽，而兀由长沙出土的战国墓缯书和汉墓帛书皆证明是“其”字的异体^⑭。在顺义牛栏山金牛村还发现一处墓葬^⑮，出土铜器8件，

皆有铭文，其中鼎铭作“𠄎乍妣辛尊彝，亚𠄎父己”。𠄎写作𠄎，是𠄎字多种写法中的一种，始见于殷墟卜辞三期^⑯，它的出现和燕山𠄎族同商朝关系的变化有关。武丁时期商朝曾有一次对燕山𠄎族的征伐，约是当时称𠄎的氏族不止燕山一处，故卜辞把被征伐的𠄎写作𠄎，表示是土方之𠄎以予区别。这次征伐历时约两月，战事深入到燕山山地，最后以𠄎族首领被擒告终。失败后的𠄎族开始臣服于商，𠄎改写为𠄎，由敌对阵容变成了己方阵容。降商后的𠄎族得到商朝信任和重用，𠄎族成员𠄎成为商朝贞人，𠄎和𠄎都被赐亚、侯爵位，世袭而成为氏族徽识。马哨村墓表明，世居燕山的𠄎族在商末已和孤竹等一起归周。在商为官的𠄎族成员，周成王分遣“殷遗”时亦有不少被遣送到燕，许多人成为燕国官员，于是在燕地留下了较多有𠄎、𠄎徽识的铜器，除金牛村外，还见于琉璃河^⑰、喀左北洞村^⑱、卢沟桥^⑲等地。燕山𠄎族先后与商、周王朝产生过如此复杂

的关系，于是墓葬中除出现和氏族传统相联系的北方系青铜兵器外，还有与商人相联系的腰坑，与周人政权相联系的周式青铜器、陶器。从出土器物的主要部分以及南北向葬俗看，这应是一处被“周化”了的原土著族墓葬，归入西周燕文化是适宜的。从殷墟早期的到殷墟后期的，再到商末马哨村墓、西周早期金牛村墓、西周早中期之际的白浮墓，燕山族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也是燕山地区古文化从大坨头文化到围坊三期文化，再到西周时期被涵化成为燕文化的一个缩影。

四、张家园上层类型、琉璃河早期类型和“张家园上层文化”

张家园上层类型从围坊三期文化中独立出来后，还需厘清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及琉璃河早期类型的关系。陈光先生认为：“在燕国大地上，西周燕文化产生之前，当地只确认出一种考古学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分为南北两个类型，南区以镇江营遗址为代表，北区以张家园遗址为代表”。赵福生、刘绪文章在叙说镇江营等遗存和琉璃河早期是“一码事”时，也把张家园遗址列入其中，可见在这一点上双方有着一致的看法，都把张家园上层类型看成是和“张家园上层文化”一样的遗存。然而从前面对张家园上层陶器的分析中可看到，张家园上层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类型，和琉璃河早期、“张家园上层文化”都不一样。

张家园上层类型和琉璃河早期遗存区别明显，主要是各自陶器群的主体部分迥然相异。张家园上层类型虽然含有一定的周、商文化因素，但联裆鬲和袋足鬲只见报道，不见图像，其他如簋、深腹盆、璧形斝等器都数量很少，不居主要地位，属陶器群主体的高领鬲、长颈鬲、大口折肩罐、小口深腹罐、直领罐、折肩钵、浅腹盆等均不见于琉璃河。同样，琉璃河的常见器物 I 式罐（G11H6：17）、

高领瓮（G11H3：14、G11H36：4）、B型小口瓮（G11T2605③A：24）、鼎（G11H33：14、G11H11：4）等也不见于张家园上层，被认为属于土著文化因素的筒腹鬲、小口瓮等器需要具体分析。筒腹鬲前面说过，是围坊三期的鼓腹鬲受长颈鬲影响，并嫁接了关中地区的带状花边，既属土著文化因素，也含周系成分。I 式小口瓮（G11H35：4）的卷沿鼓腹风格和刘李店、青池、大坨头西周灰坑出土的陶罐相同，而和张家园上层的瓮、罐类器有一定差别，未必属土著因素。因此作为琉璃河早期周、商、土著三种成分的一部分，土著因素是较弱的一种。

以张家园上层命名的“张家园上层文化”，文化内涵和面貌特征与张家园上层类型也不一样，以陈光、蒋刚二位先生举为典型遗存的镇江营商周三期为例，张家园上层的基本器类，包括长颈鬲、筒腹鬲、高领鬲、敛口钵、小口深腹罐、折肩罐等，都可在镇江营商周三期见到，较之琉璃河早期要突出得多。但是镇江营商周三期遗存中代表周文化因素的联裆鬲和代表商文化因素的袋足鬲，以及在琉璃河常见到的簋、瓮、盆、甗等周、商系器物，也都居突出地位，例如周文化因素的代表联裆鬲（报告称鼓腹鬲），报告发表的图像有81件，远超土著因素筒腹鬲62件之数，和张家园上层只见报道未见图像、古冶晚期只见1件残片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张家园上层文化”虽以张家园上层称呼，但文化内涵和面貌特征与张家园上层原点有着基本区别，而和镇江营早期更加接近。

不过要说镇江营商周三期和琉璃河早期是“一码事”，尚有许多细节需要解释，最明显的一点是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例如在琉璃河早期发表的资料中，属于土著文化因素的主要是筒腹鬲一种，而镇江营除筒腹鬲外，还有高领鬲和长颈鬲，其他如敛口钵、大口折肩罐等在镇江营应有尽有，系统而全面，可是在琉璃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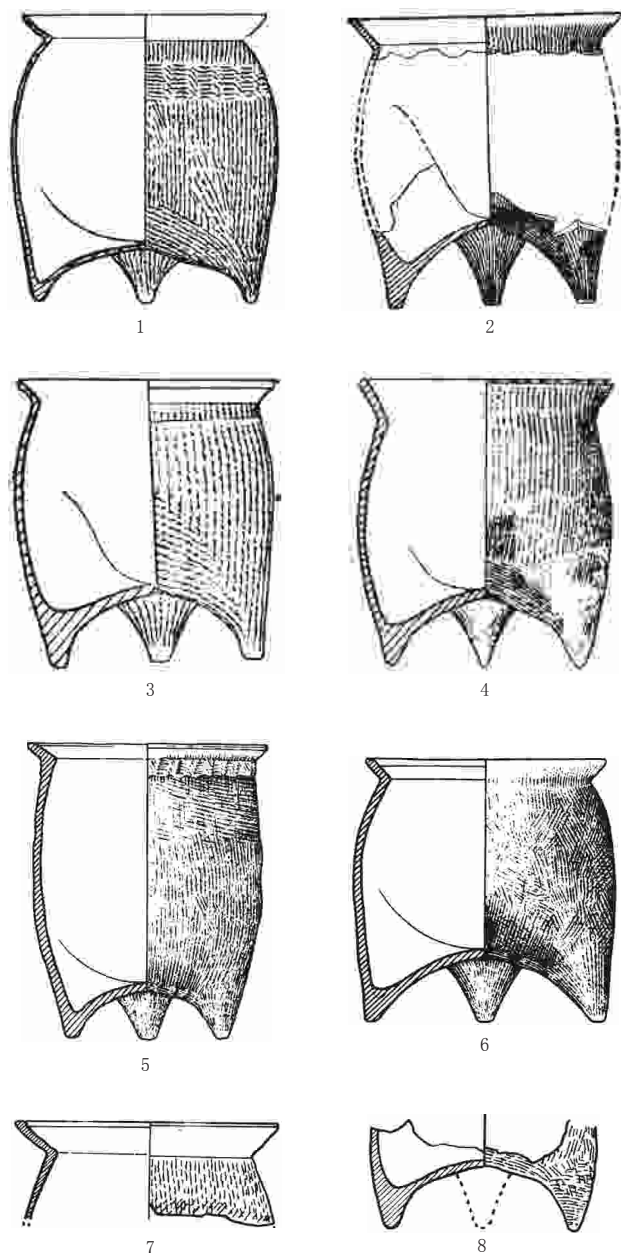
皆不见。也就是说，以镇江营三期为代表的“张家园上层文化”遗存，既和张家园上层文化不同，又和琉璃河早期有一定差别，所以在研究者中对它的文化性质产生了不同看法，陈光先生将其定性为土著文化的代名词“张家园上层文化”^①，赵福生、刘绪二位先生认为其和琉璃河早期是“一码事”，即燕文化^②，殷玮璋先生认为琉璃河都城是周文化，镇江营是燕文化^③。说镇江营商周三期是土著文化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该遗存包含的周商文化因素已远超土著文化因素，和主要由传统文化因素构成的张家园上层类型无法相比，不能不认为它的性质起了变化。但要说它就是西周早期燕文化，则还必须具体考察它和燕文化的关系。

考古学文化遗存是“社会的产品”^④，西周早期燕文化是西周早期周人燕国政权的社会产品，遗存中出现周、商、土著多种因素共存，是因为周人摒弃夏商王朝对其他族群采取排他性做法，容纳不同族群于体制内所致^⑤。周人推行这种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左传》记载的“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杜预注：“索，法也。”从这个角度判断琉璃河早期遗存的性质，说它是姬燕文化或是西周燕文化便完全可以理解。以1996年发掘的H108灰坑为例，作为琉璃河都城居住址遗存的组成部分，出土有属于商文化因素的袋足鬲、土著文化因素的高领鬲（筒腹鬲），同时也有周文化因素的联裆鬲足（H108②：36）等，最可注意的是“成周”等卜甲（G11H108①：14、G11H108①：5、G11H108③：10）的出土，凸显周人王权的存在。其实陈光先生说的“第六等级”也是这样的遗存，因为黄土坡墓地的燕侯、燕侯宗族和异族贵族，他们生前都是董家林古城内的居民，琉璃河居住址自然包含有他们的遗存，其中周文化因素为主导因素是清楚的。但不能将此简单地称为周文化，因为其中还有商文化和土著文化因素，称为姬燕文化或西周燕文化最符合这类遗存的性质。

在琉璃河都城以外不容易见到和周人王权直接关联的遗物，但既然是周人燕国政权下形成的文化遗存，共存的周、商、土著诸因素中，周文化因素的主导作用在遗存中也必然会留下印记。因此全面考察此类遗存的发展演变过程，即可看到周文化在燕地从无到有、强势发展、吞噬其他因素的全过程。要做到这一点，需从召公建国将周文化引入燕地开始做全程剖析。

《史记·周本纪》《汉书·律历志》保存的《武成》片断，都明确记载了武王伐纣西归后即进行“功臣谋士”之封的战略决策，这是因为商朝虽然灭亡，但余孽犹在，各地部落集团也对周王朝怀有警惕之心，形势极不稳定。《尚书大传·牧誓·大战》曰：“纣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反映出当时形势之严峻。为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迅速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周武王采取军事殖民手段，用分封同姓诸侯的办法，在各地建立次一级周人政权以掌控地方。受封者丝毫不敢怠慢，分头到各自封地建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夜亦而行，黎明至国”，略可见紧迫程度。但各地进展情况并不一致，齐、鲁二国都遭到当地土著部落的强烈抵制，只有燕国似乎比较平静，因而在燕史研究者中产生了燕国非召公始建的说法。其实情况正好相反，如前面所说，燕山南麓的土著族在周人的政治攻势下大部在商末已经归周，所以对周人建立新政权不那么抵制，建国较为顺利。文献中所以缺乏燕国建国的信息，是因为燕国在西周早期之末发生了一次严重变故，国史和谱牒尽失，相关史事失载。而建国过程中未发生像鲁、齐那样遭到土著族的强烈抗争，也是史书较少记载的原因之一。

召公在燕地建国的文献依据是《水经》“圣水”和郦注“圣聚”的相关文字^⑥，这个地方能出现以“圣”命名的河流和聚邑，只能和勤政爱民、赢得《甘棠》之咏的召公有关，今董家林古城是召公长子姬克受封后所建，不可能有“圣聚”之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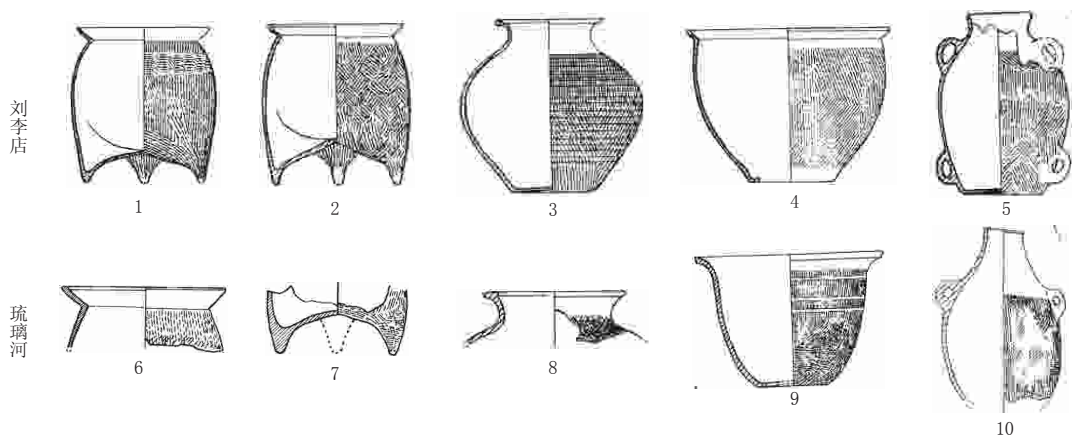
图一八 联裆鬲举例

1.刘李店H78:2 2.壹家堡四期T31③G:4 3.壹家堡二期H25:4 4.张家坡H18:49 5.镇江营FZH503:11 6.镇江营FZH1324:1 7.琉璃河G11T2603⑥:24 8.琉璃河F10T1324⑬:31

由于周武王克商后不久即染病去世，随后又发生管、蔡、武庚之乱，召公需留京辅政，在燕时间不长，但还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线索。1978年刘李店发现的灰坑H1^⑥，出土10余件鬲，2件四系壶，1件甗和4件罐。此陶器群被认为是商文化北上的

一支，年代上限可到商代中晚期，下限到西周中期或更晚。但如果进一步分析此陶器群，可发现甗和四系壶虽见于殷墟，但在要庄、镇江营和琉璃河等周代遗存均有出土。卷沿小口罐造型及其沿缘做成斜面的特征，和琉璃河1995年的I式小口瓮、1996年的B型罐等颇为接近。类似的细节还有刘李店II式鬲（刘78H1:3~刘78H1:5），其口沿有“倒钩”的做法，也广泛见于琉璃河早期的鬲、甗、盆、罐等器。最可注意的是陶鬲造型，相似形式见于千里以外的西安老牛坡^⑦，该墓地出土物被认为“带有明显的二重性，它的主体源于郑州二里岗—殷墟文化，同时融汇若干地方文化因素”，实际上是已经“周化”了的原商文化遗存。和此相似的遗存还见于扶风壹家堡^⑧，被认为“把关中地区弧裆鬲的出现年代提早到了殷墟第一期”，所举的典型器物如二期的H25:4、四期的T31③G:4等，造型和刘李店H1陶鬲尤为相似，和沔西H18:49、96SCMM5:1等西周早期陶鬲也十分接近^⑨（图一八）。因此有理由认为，刘李店78H1是关中地区“周化”了的商裔，作为周人殖民者来到燕地留下的遗存。

刘李店78H1多方面表现出召公建国时期遗存的特质。首先是年代，“联裆鬲除在关中地区可早到商代（即先周文化）之外，在其他地区均属周代”^⑩，而刘李店的联裆鬲却较多保留有关中时的特色。陶器中不见琉璃河早期流行的殷墟晚期式袋足鬲，这种鬲是随周成王分遣“殷遗”才流行于燕地，分遣“殷遗”和周成王大封同时，因此灰坑年代应早于琉璃河都城，相当于召公建国时期。其次是地点，刘李店遗址位于董家林古城旁，这里除发现上述灰坑外，还曾采集到约



图一九 刘李店和琉璃河早期陶器

1.刘H1:2 2.刘H1:3 3.刘H1:9 4.刘H1:9 5.刘H1:7 6.琉G11H33:2 7.琉G11T2603⑥:24
8.琉G11H33:8 9.琉G11H27:7 10.琉G11T2505④:8

当围坊三期时的陶鬲^③，以及形制和塔照FTT3011④:1相近的长颈鬲残片，表明这里即使不是“燕亳”聚邑所在，也应是一个重要居民点，“燕亳”是周人宿敌，《后汉书·西羌传》记：“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召公把封国取名为燕，必是把“燕亳”作为建国基地，“圣聚”必在此一带。刘李店灰坑内出土的陶器，包括联裆鬲、四系壶、卷沿小口鼓腹罐和甗等，都可在琉璃河早期器物中找到相似形式（图一九），显示出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之处是不见殷墟晚期式袋足鬲和土著文化因素的陶器，前者表明早于分遣“殷遗”，后者表明周人殖民者初来燕地，尚未与土著结合，甚至尚处于对立状态。

和刘李店78H1年代相当的还有镇江营商周三期一段，二者相同之处是都有联裆鬲（报告称鼓腹鬲）、四系壶、罐和甗，另外还有簋、瓮等器。联裆鬲是该遗址传统土著文化发生转折的标志，报告称“塔照一期遗存、二期文化中根本见不到这类鬲的祖型”，正好说明是外来因素，造型也正和刘李店78H1陶鬲相近。不过在属于三期一段的10个灰坑和相关地层中，均不见殷墟晚期式袋足鬲，说明和刘李店78H1一样，是属于分遣“殷遗”以前。

到商周三期二段，和殷墟晚期直接

衔接的袋足鬲不仅赫然出现，并且立即居醒目地位，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一方面表明具有丰富管理经验和生产技能的“殷遗”，很快获得周人赏识和重用，同时也表明周人政权获得“殷遗”后，增强了掌控地方的能力，使距琉璃河都城数十里之遙的原土著村落，物质遗存迅速变得和琉璃河都城相似。到商周三期三段，遗存面貌进一步发生变化，“筒腹鬲逐渐减少”，“鼓腹鬲大量增加”，“袋足鬲数量急剧增多”。这些变化意味着商和土著因素均被逐步改造或淘汰，唯有代表周文化因素的联裆鬲（鼓腹鬲）一枝独大。到商周第四期，整个陶器群变得“与琉璃河燕都遗址西周晚期的器物一致”，成为一致公认的“西周时期的燕文化”。

这一变化过程内容丰富，早晚两端分别属于土著文化（塔照二期）和西周燕文化（镇江营商周四期），问题在中间的镇江营商周三期。代表周文化因素的联裆鬲在三期一段出现后，不仅很快成为陶鬲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同时联裆工艺很快影响到其他类型陶鬲的制作，筒腹鬲从塔照二期开始一直是分裆形式，但到三期二段也有部分变成了联裆，报告列举有9例，占筒腹鬲总数近七分之一。鼓腹鬲（联裆鬲）中的一个分支F型，最初在灰坑FZH946中分裆和联裆共存，后来都成为

了联裆。更可注意的是殷墟晚期式袋足鬲，原是传统的分裆鬲，报告载标本图像38例，除A型为“分裆”外，其余都是联裆，即使是AIV、AV二式被归为分裆的陶鬲，裆部弧线也已与联裆无异，充分显示周式联裆鬲在整个陶鬲发展变化中的活力。与此相反，土著文化的筒腹鬲，到三期二段即有部分变为联裆，三期三段时“逐渐减少”，四期时干脆不见。只是对殷墟晚期式袋足鬲的变化需作具体分析，三期二段刚出现时有部分发生由分裆到联裆的变化，可是到三期三段时却“数量急剧增多”，四期时竟成为陶鬲的主体，因此陈光先生把镇江营四期又称为“周、商文化因素合体的文化”。其实这是假象，实际上此时的袋足鬲都已变成了联裆，成为周式联裆鬲的一种，只是造型上仍然保持袋足鬲形式，在诸种陶鬲中以平稳实用、制作简便取胜，要说其谱系，只能说是太行山东麓广泛流行的周式鬲。

上述镇江营商周三期一段到三段的变化，真切地展现了土著文化进入周人燕国政权后被涵化的过程。第一段鼓腹鬲出现，是周人政权掌控此土著族开始的标志。第二段殷墟式袋足鬲出现，面貌特征开始和琉璃河早期基本一致，表明周人政权的掌控取得成功。第三段土著和商文化多被改造和削弱，周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到第四期终于成为单一的燕文化，其他谱系因素都被吞噬。整个过程中周文化自始至终是主角，规定着发展方向，决定文化本质。因此把这类遗存归为琉璃河早期类型应是合适的，尽管尚存在一定差异，但只是原先传统村落留下的印记，基本内涵已趋一致。

西周早期燕文化除琉璃河早期类型外还有另一个文化类型，以满城要庄为代表，主要含周、商两种文化因素，相关遗址有满城要庄^①、唐县南放水^②、任丘哑叭庄^③，以及大厂大坨头遗址的一个西周文化灰坑^④。按照“南有漳（漳）沱、易水”的燕国国境，也应是燕文化，基本文

化面貌和卫、邢等国的西周遗存相似，故可称为要庄类型。这两种西周燕文化类型的产生，是因为在周人到来之前，这个区域内有围坊三期文化和商文化错杂分布，周人势力进入后，围坊三期文化分布范围内便多出现周、商、土著相结合的琉璃河早期类型，商文化分布范围内多出现要庄类型。两个类型一起构成西周早期燕国政权的直接统治范围，是燕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基础，西周早期琉璃河都城能积聚起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依赖于这个基础的存在。

有研究者认为：“北京中南部及其近平原地区都基本上被纳入广义的周文化范围，标志着西周燕文化形成。北京以外易水、滦河流域和天津等地燕文化遗存的构成因素，均与琉璃河、镇江营遗存基本相同，有些墓葬出土两端压扁的金耳环、金臂钏等，表明墓主人可能为土著身份，但已经接受包括青铜礼器、陶器在内的主体的燕文化，没有必要再划出一个张家园上层文化。”^⑤此说有合理的地方，但不能简单化，因为此时燕山南麓的滦河流域等地，还有土著文化张家园上层类型存在，虽然数量较少，却是全面了解西周早期燕国形势的重要依据。正是由于此类遗存的存在，周人燕国政权在强势发展的同时，也遭到孤竹等土著族的强烈抵制，甚至到西周早期以后还发生山戎和孤竹、令支一起“病燕”事件。

“张家园上层文化”这一概念的产生是由于一系列误读。最初是对张家园上层和围坊三期的误读，把应该分为两个文化类型的遗存合二为一，结果既模糊了围坊三期文化的内涵，也使张家园上层类型独立的面貌特征未得彰显。接着是对琉璃河早期遗存的误读，以未见土著文化因素的1962年房山调查资料为基准，把凡是有土著文化因素的遗存都归为“张家园上层文化”，由此张家园上层的概念被异化。

“张家园上层文化”的概念已使用了数十年，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最近张忠

培先生说到齐、燕两国早期考古学文化时，把“张家园上层文化”作为燕国境内的土著文化遗存，与齐国境内的东夷遗存珍珠门文化相对应^⑨，即是受此影响的结果，没有注意到当时燕国境内犹存的土著文化遗存只有偏居燕山南麓东部的张家园上层类型，而不是遍布燕国大部分地区的“张家园上层文化”。

补记：

韩嘉谷先生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以来，一直在天津从事田野考古实践与研究，是天津考古事业重要的开拓者与推动者。多年来，韩嘉谷先生出版了多部京津冀地区考古研究的专著，发表重要学术论文百余万字。1995年《北京文博》创刊以来，韩嘉谷先生先后赐稿十余篇，大力支持编辑部工作。

韩嘉谷先生的逝世，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将在我们心中永远铭记！

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⑪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1979~1989年天津文物考古新收获》，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⑬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⑭ 纪烈敏：《燕山南北青铜文化的类型谱系及其演变》，《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⑮⑯⑰⑱ 刘绪、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文物》1997年第4期。

⑲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⑳⑳ 蒋刚：《商末周初：围坊三期文化与张家园上层文化》，《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蒋刚、王志刚：《关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再认识》，《考古》2010年第5期。

㉑㉒ 陈光：《西周燕国文化初论》，《北京文博》2000年第1期。

㉓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1979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8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第4期。

㉔ 天津博物馆、天津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天津蓟县青池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2期。

㉕㉖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古冶商代遗址》，《考古》1984年第9期。

㉗㉘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涞水渐村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㉙ 谢希恭：《光社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4、5合期。

㉚ 国家文物局等：《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年；马升等：《山西柳林高红发现商代夯土基址》，《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2日。

㉛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①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1977年。

②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8期。

③④⑤⑥ 韩嘉谷：《京津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发展的一点线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⑦ 张忠培、孔哲生、张文军、陈雍：《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⑧⑨ 李伯谦：《张家园上层类型若干问题研究》，《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1998年。

⑩ 赵福生、刘绪：《西周燕文化与张家园上层类型》，《跋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⑪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

- ②⑥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考古实习组等：《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的试掘》，《文物》1988年第6期。
- ②⑦ 田建文：《晋中及陕晋豫地区的陶鬲》，《中国陶鬲谱系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
- ②⑧③③⑥④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涑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 ②⑨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 ③⑩ 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年第10期。
- ③⑪ 韩嘉谷：《花边鬲寻踪》，《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 ③⑫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昌平张营》，文物出版社，2007年。
- ③⑬ 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6期。
- ③⑭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部：《陕西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
- ③⑮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 ③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 ③⑰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 ③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沔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 ④⑰ 韩嘉谷：《昌平雪山H66的年代、文化性质及其它》，《北京文博文丛》2011年第三辑，北京燕山出版社。
- ④⑱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怀来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 ④⑲⑵⑰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平谷县龙坡遗址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
- ④⑳⑵⑱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满城要庄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 ④⑴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
- ④⑵⑵⑶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的商代遗迹》，《文物》1997年第4期。
- ④⑶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 ④⑷ 杨建华：《两种“花边鬲”的辨析》，《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
- ④⑸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发掘简报》，《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报告集》，远方出版社，2001年。
- ④⑹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安塞县西孤渠村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 ④⑺ 马明志：《“西岔文化”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 ④⑻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等：《天津宝坻县牛道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7期。
- ④⑼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卢龙县东阁各庄遗址》，《考古》1985年第11期。
- ④⑽ 李捷民等：《河北卢龙双望乡发现细石器与陶器》，《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 ④⑾⑽⑾ 马洪路：《河北玉田县发现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存》，《考古》1983年第5期。
- ④⑿⑾⑿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调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1992年。
- ④⑿ 李伯谦：《北京房山董家林古城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 ④⑿⑿⑿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④⑿⑿⑿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涑水北封村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0期。
- ④⑿⑿⑿ 保定地区文管所：《河北唐县洪城遗址的调查》，《考古》1996年第5期。
- ④⑿⑿⑿ 韩嘉谷：《从雪山三期陶器看大坨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异同》，《北京文博文丛》2013年第四辑。
- ④⑿⑿⑿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杨建华、赵菊梅：

《朱开沟文化因素的东传》，《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⑥⑧ 王乐文：《朱开沟遗址出土遗存分析》，《北方文物》2004年第3期；王乐文：《论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两类遗存》，《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

⑥⑨ 杨建华、赵菊梅：《晋中地区与晋陕高原及中原文化的关系》，《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蒋刚：《夏商西周文化对晋陕高原、燕山南麓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⑦⑩ 韩嘉谷：《“燕亳”寻踪》，《北京文博》2010年第4期。

⑦⑪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⑦⑫ 陈雍：《天津考古随笔》（续一），《天津史志》1994年第3期；陈雍：《考古的天津》，《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⑦⑬⑭ 蒋刚：《商末周初：围坊三期文化与张家园上层文化》，《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⑦⑮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宝坻县文化馆：《宝坻县歇马台遗址试掘报告》，《天津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⑦⑯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⑦⑰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⑦⑱ 刘震：《河北遵化县发现一座商代墓葬》，《考古》1995年第5期。

⑧⑰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第4期。

⑧⑱ 韩嘉谷等：《蓟县邦均西周时期遗址和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⑧⑲ 孟昭永：《河北滦县出土晚商青铜器》，《考古》1994年第4期。

⑧⑳ 李宗山等：《河北省迁安县出土两件商代铜器》，《文物》1995年第6期；尹小燕：《迁安县发现商代铜器》，《文物春秋》1996年第1期。

⑧㉑ 唐山市文物管理处等：《河北迁安县小山东

庄西周时期墓葬》，《考古》1997年第4期。

⑧㉒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

⑧㉓ 李伯谦：《张家园上层类型若干问题研究》，《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杜金鹏：《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与商代燕国》，《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⑧㉔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文化的初步认识》，《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⑧㉕ 刘绪、赵福生：《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与刘家河M1的属性》，《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韩嘉谷：《谈平谷刘家河青铜文化遗存》，《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⑧㉖ 蒋刚：《商末周初：围坊三期文化与张家园上层文化》，《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2008年；蒋刚、赵明星、李媛：《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时期墓葬遗存的再认识》，《华夏考古》2012年第3期。

⑧㉗ 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李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认识——从甘泉县阎家沟新出青铜器谈起》，《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1期。

⑧㉘ 陈雍：《考古的天津》，《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⑧㉙ 梁宝玲：《谈张家园墓地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

⑧㉚ 韩嘉谷、纪烈敏：《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考古》1993年第4期。

⑧㉛⑧㉜ 韩嘉谷：《论山戎“病燕”》，《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8辑，2004年。

⑧㉝ 韩嘉谷：《试探无终》，《北京文博》2006年第1期。

⑧㉞ 韩嘉谷：《论召公封燕和建国时间》，《首都博物馆丛刊》第25辑，2011年。

⑧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

特约专稿

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北京文物研究所等：《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区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⑩⑩ 天津博物馆、天津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天津蓟县青池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2期。

⑩⑪ 靳枫毅、郁金城：《北京地区出土青铜器概论》，《北京文博》2002年第2期。

⑩⑫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⑩⑬ 韩嘉谷：《论北京地区为“其”国（族）故地》，《北京文博》1995年第1期。

⑩⑭ 安志敏、陈公柔：《长沙战国缯书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63年第9期。

⑩⑮ 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牛栏山出土一组周初带铭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11期。

⑩⑯ 曹定云：《亚其考》，《文物集刊》第2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⑩⑰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⑩⑱ 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⑩⑲ 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

⑩⑳ 殷玮璋发言，载《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⑩㉑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⑩㉒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学术年

会暨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4期。

⑩㉓ 郭仁、田敬东：《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北京史论文集》第一辑，1980年。

⑩㉔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⑩㉕ 北京大学考古系：《陕西扶风壹家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1期。

⑩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沔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⑩㉗ 李伯谦：《北京房山董家林古城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⑩㉘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河北省文物局等：《河北唐县南放水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4期。

⑩㉙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任丘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⑩㉚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

⑩㉛ 韩建业：《试论北京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谱系》，《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

⑩㉜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开幕词》，《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

（作者为天津博物馆研究员）

北京大运河概述

赵福生 蔡 蕃

中国运河初创自春秋时期，有确切文字记载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至今已有2500多年。秦统一六国，开始全国的通航水运大连通，这是中国大运河第一次修建高潮。秦汉运河的目的地是长安，运河把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南端是杭州）与首都连接起来。

隋代再次统一全国，开凿了南北大运河，这是中国大运河第二次修建高潮。这条大运河各段实际都用了几百年才建成。从南到北大体分为：余杭（杭州）到镇江的江南运河，扬州至淮安的淮扬运河，淮安到洛阳的通济渠（汴渠），洛阳到涿郡（幽州，今北京地区）的永济渠，以及洛阳向西到咸阳（今西安）的漕渠。隋唐漕运目的地是首都长安（今西安），运河北通涿郡主要是用于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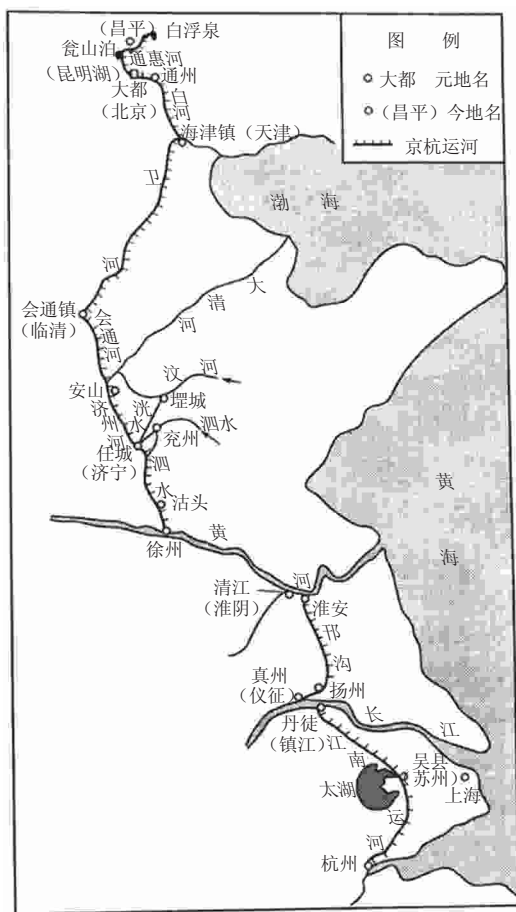
北宋以开封为首都，也是漕运的中心。向南沿汴渠接邗沟通长江，再沿江南运河达杭州；向北沿永济渠仍可以到达北京地区。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对南北大运河各段各自进行了维修利用。

金代以燕京（今北京西南）为中都，作为华北漕运中心，将各地粮饷运到通州。而通州至中都城50余里，先后开凿过漕渠、金口河及闸河，但因水源缺乏和管理不善等原因运河并不通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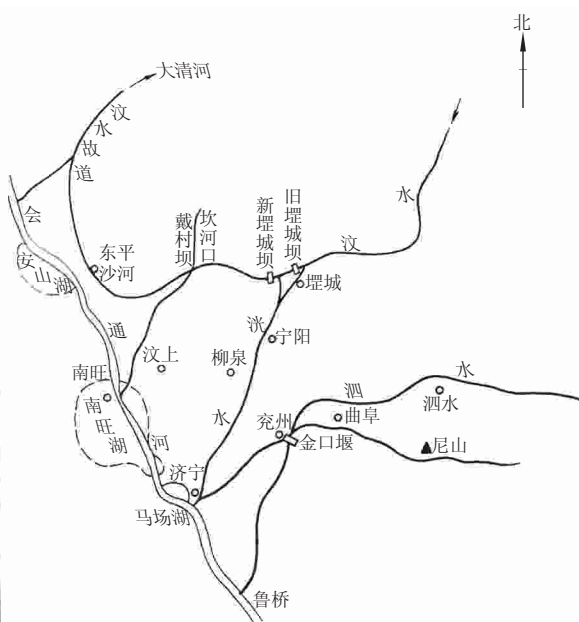
元统一全国，版图空前辽阔，结束了宋辽金等几百年的多政权局面，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中心迁到华北地区。忽必烈建大都城，国家庞大开支和赖以生存的粮食，仍必须仰仗经济发达的南

方各省。这样南北的交通和漕运问题，立即成为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元初内陆运河从南方到北方，要沿隋代的“南北大运河”，向西行很远，而且最后进入大都城一段只有坝河可以运输一小部分，其他主要靠陆运，花费巨大。这样迫切需要对南北大运河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条南北直达的运河。改造工程有两个难点：一是要裁弯取直，不再绕行卫水（御河）上游而开通山东运河；二是开凿通州至大都的运河，使漕船能够驶入大都城内的粮仓。经过元代著名水利家郭守敬的详细考察和规划，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成从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至元三十年（1293），建成了通州至大都的通惠河。至此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江南漕船可以从白河（北运河）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积水潭。这是中国大运河第三次修建的高潮（图一、图二）。

明初以南京为首都，京杭大运河北部停止漕运，河道荒废。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首先要恢复京杭大运河通航。而京杭大运河最困难段依然是山东会通河和北京通惠河。元代会通河因水源困难一年只能承担30万石的漕运任务，大部分要靠海运。明代修建了戴村坝，基本解决了会通河水源问题以后才充分发挥了京杭大运河的作用。而北京地区因元代新开辟的白浮泉水源废弃，又由于皇城的改建阻断城内航道，使通惠河只能通航到东便门外大通桥下，因此又称大通河。明清进一步加强对运河管理，使京杭大运河真正成为南



图一 元代京杭大运河示意图



图二 会通河戴村坝位置示意图



照片一 张家湾通运桥及老城
(传说的萧太后河, 1987年航拍)

北交通的干线、国家漕运的主要通道。明清国家对京杭大运河的依赖远超过前代,直到清末海运和铁路的兴起而停止了京杭大运河漕运。民国时期北京大运河虽然无所建树,但是一些有识之士为了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复航,做出有益探索和规划,可以作为历史的借鉴。新中国成立后的60余年来,北京地区的河道得到彻底治理,在古代运河遗产保护方面做出了成绩。

一、辽金北京地区运河的初步发展

辽在燕京设立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负责处理汉、渤海等各民族事务。传说萧太后为运送军粮开挖了萧太后河,

后成为皇家漕运的重要航道,但是没有当时文献记载,到500多年后的明朝末年才看到传说的文字(照片一)。

金定都燕京后,为了战争和首都的需要,把华北的粮食漕运到中都城,就积极开始运河的建设。《金史·河渠志》记载:“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明确指出金代运河是由高粱河、白莲潭供水的(图三)。

金代修建的运河最早时间,是大定四年(1164)金世宗去密云,走到近郊(中



图三 金代白莲潭水系示意图

都城东北方向），看见一条堙塞的运河。他责备户部侍郎曹望之说：“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一年后开工修建完成，称“漕渠”，大体是元代坝河的路线。但是这条运河不怎么畅通，没几年又筹划修建了金口河来替代它。

到泰和五年（1205）正月，翰林供奉韩玉建议开通州潞水漕渠。金章宗令尚书省发军夫6000多人开凿，重点是中都至通州的运河。这次不但引用白莲潭的清水，还在运河上修建了五六座船闸，因此称作“金闸河”。这条新开运河总的名称是“天津河”。运河竣工，“船运至都”，韩玉官升两阶。金闸河的河道下游，大致是今通惠河的路线。工程虽然浩大，但是还是因为水源不足，运行困难。开河后第三年，通州刺史张行信上奏说：船自通州入闸河，要十余日方至京师，而官方规定是五日转脚之费，现在申请按十日支付，得到批准。看来每座闸前为了等待水满闸平，平均要等两天时间，运河的效率很低。

另外，在金代还在引用永定河水上做出努力。大定十年（1170），有人提出引永定河通漕运的建议，金世宗高兴

地说，真能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孰大焉！大定十二年（1172）派人复查后，即将渠道建成。但是因河道坡度太陡，河水又非常浑浊，不能胜舟，结果以失败告终。后来金世宗还对宰臣说，可惜分引卢沟水为漕渠，竟未能成功，如果能行，南方路诸货皆至京师，则物价一定会便宜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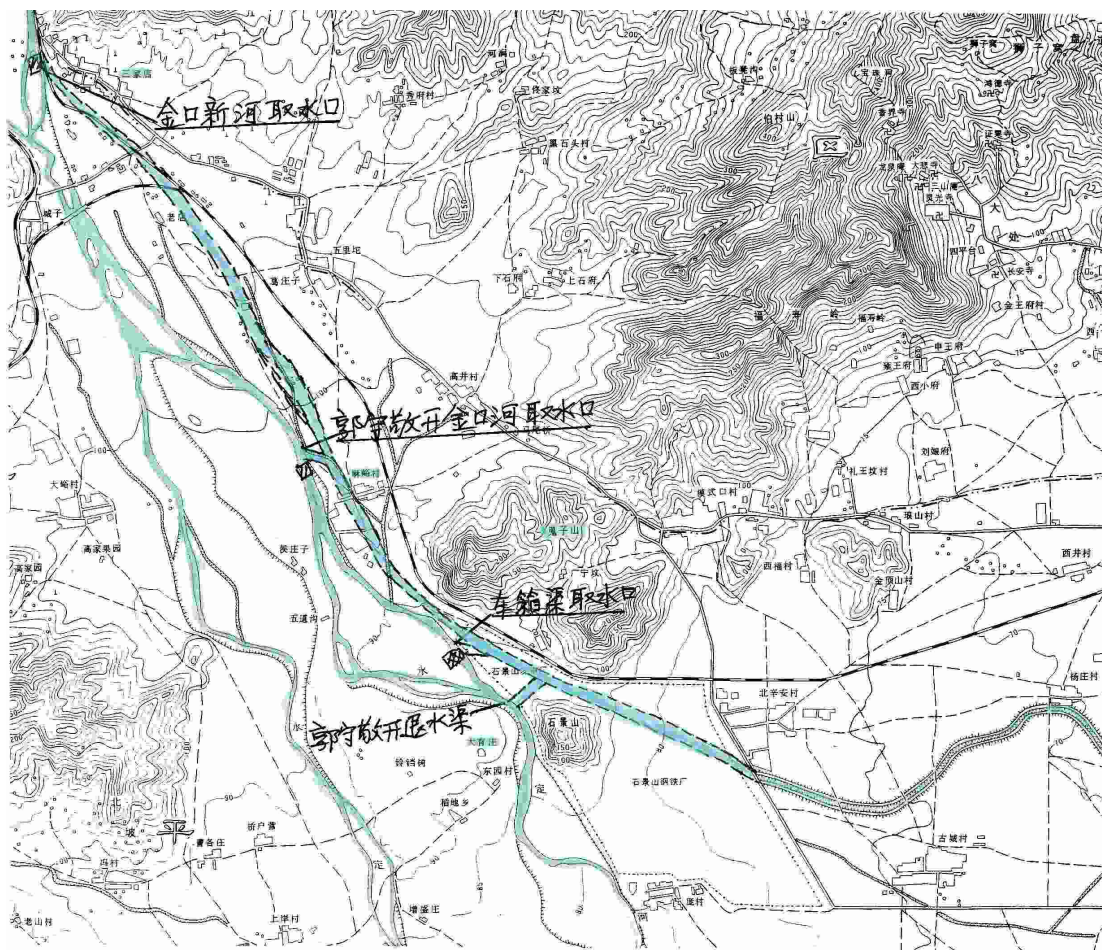
二、元代北京大运河的辉煌成就

忽必烈即位后十分重视都城建设和发展漕运两件大事。在修建了大都新城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寻找城市水源和进行运河建设。按时间顺序主要修建了3条运河。

1. 元代永定河引水通航工程

至元三年（1266），都水少监郭守敬，提出重新打开金口，引导永定河水通漕运计划^①。郭守敬针对金代失败做出科学对策，最关键的是做出最合理的三项防洪安全设计：一是上移取水口，二是增加“退水渠”，三是设置中间调节水库。

首先将永定河取水口上移到金代取水口上游的麻峪村。在取水口左侧向上游筑一段导水堤，经过一两公里长的引渠河水才到达进口闸。当永定河发生大洪水时，首先淹没导水堤，冲毁这段引渠，可以减少洪水流入金口威胁京城。其次，在金口闸前预先开减水口。在减水口后开挖一条“退水渠”（即溢洪道），直接进入永定河。当取水口进入超标洪水，还可以自动沿这条退水渠回流到永定河，不会进入金口，这是第二道防线。第三，在引水渠中间，今玉渊潭附近设置调节水库。其功能不仅可以作为漕运码头，更重要的是可以调蓄上游引进渠道的水量，以保证运河供水的均匀性。金口河下游在李二寺汇入白河（图四）。



图四 永定河引水渠口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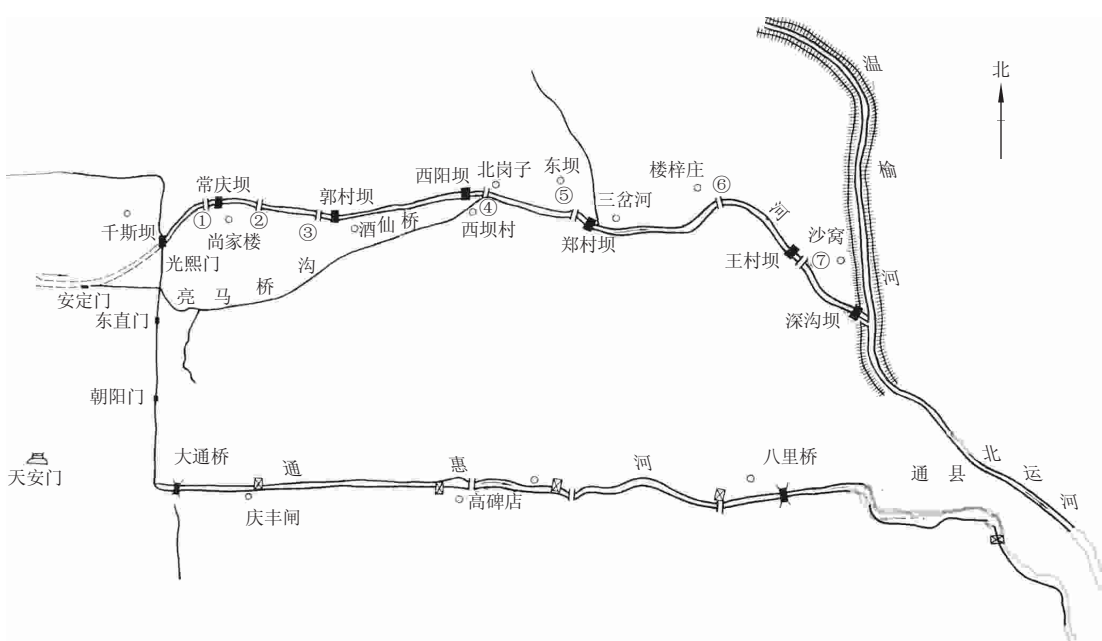
金口河使用30多年之后，大德二年（1298）永定河发大水，大监出于安全考虑，大都路和都水监将金口闸下闭了闸板，金口河完成了引水通漕运的使命。这次引永定河水通漕运虽然只成功使用30余年，但这在永定河引水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元末，至正二年（1342）丞相脱脱等急于事功再开金口河，但是他们完全忽视郭守敬的经验，惨遭失败，导致都水监官被杀。自此以后几百年间，再无人敢言引永定河通漕。直到1956年修建官厅水库后，才修建永定河引水渠，永定河得到彻底控制。但是，永定河的功能也只是城市供水和农业灌溉工程，无法通航运。

元代成功实现永定河引水，使永定河成为北京城市供水的重要水源之一。

2. 元代大都至通州北线运河——玉泉河、坝河以及双塔漕渠

玉泉河。中统三年（1262）八月，郭守敬在上都见到忽必烈时，就提出“开玉泉水以通漕运”规划。“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权以玉泉水引入行舟，岁可省僦车费六万缗。”建议立即得到忽必烈的赞赏和批准^②。于是派一个叫宁玉的人“充河道官，疏浚玉泉河渠”。下游是引入“中都旧漕河”，应该指“金漕渠”，这是金代北线运河的称呼。

坝河。至元十六年（1279）因“舟运甚艰”，发动6000人用50天时间，疏浚大都至通州水路。这是将十几年前郭守敬疏浚的漕河，改造成分段驳运制的坝河。因为此前一两年大都新开了一条金水河，分



图五 坝河七坝示意图（标示①②等为新建闸编号）

引了玉泉水供应大内使用。《元史·王思诚传》记载，这一年“开坝河，设坝夫户八千三百七十有七”，可以看出漕运规模很大。坝河，又称阜通河，河道自积水潭北部出口，沿今北护城河，出大都城光熙门，大致沿今东北郊坝河至通州城北入温榆河（照片二、照片三）。坝河上共设有拦河坝7座，因此又称“阜通七坝”。漕粮越过最东边深沟坝，用船运至上一级王村坝下，如此逐级而上。再越过郑村坝、西阳坝、郭村坝、常庆坝，最后到达最西端光熙门附近的千斯坝，再转运至千斯仓内。这七坝与1976年新建的7座拦河闸位

置有明显对应关系（图五）。

双塔漕渠。元代通州至大都运河还有一条向北直达昌平附近的双塔漕渠，又叫双塔河。发源于昌平区孟村一亩泉，经过双塔村向东，至丰善村入榆河（今温榆河），就是北沙河。今双塔村、丰善村仍然存在，而且中间河道两岸还有东闸村、西闸村。以两村距离推测，应该是当年修建运河时所建的两座船闸，后来河湮闸废而地名保留下来。

3. 元代大都至通州中线运河——通惠河工程

北京地区修建运河有两大困难：一是



照片二 在坝河上修建的楼梓庄闸（1981年拍摄）



照片三 坝河入温榆河口（1981年拍摄）

缺水，二是河道坡降过大。郭守敬通过对北京地区水资源及地形详细勘查，制订了修建通惠河的计划：“自昌平县白浮村开导神山泉，西南转，循山麓，与一亩泉、榆河、玉泉诸水合，自西水门入都，经积水潭为停渊，南出文明门，东过通州至高丽庄入白河。”

兴建通惠河方案重点一是修建白浮瓮山河跨流域引水工程，增加白浮泉等新水源；二是修建瓮山泊及积水潭调蓄水库，最大限度节蓄水源。在合理分配大都城市用水同时，保证运河供水；三是通过缩减运河断面，增设闸堰建筑物，实现人工控制水流，使之充分为行船服务；四是选择最佳运河路线，缩短航程，合理与北运河衔接；五是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以保证漕运畅通。

纵观元代通惠河总长度为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是由两个湖泊串联三段河道组成。这两个湖即瓮山泊（西湖）和积水潭；这三条河的名称从上游起依次是白浮瓮山河、长河、通惠河（这里依历史习惯把后门桥至通州的河道称通惠河）。由于元代文献记载的不一致以及明代以后通惠河自身的变化，导致从明代开始对通惠河的河道就产生了各种称呼。

最上游白浮瓮山河。《元史·河渠志》有“白浮瓮山”章节，明确指出该河是通惠河的上源。到明代这条河已全湮废，有的文献称之为“白浮堰”，有的仍称之为“高粱河”。

第二段——长河，元代也写作高粱河或御河等。这是连接两个湖泊的水道，也是大都至西湖水上交通的要道。这是利用原有河道加以疏浚，是元代通惠河中十分重要的一段。

第三段是从积水潭出口至李二寺入白河的通惠河，其中从澄清闸至东便门一段，由于开始是从皇城外边流过，又有御河（玉河）之名。明代将其圈入皇城中，北京城内不再通船，漕船只到东便门。以后称呼东便门至通州石坝为大通河或通惠

河。下面简要叙述通惠河各段情况。

1) 白浮瓮山河引水工程

要根据大量文献记载和实地勘察相比较，大致确定出《元一统志》记载引用的白浮泉至玉泉十大泉水的位置，其中白浮泉在今白浮村北龙山北麓，至今保存完整。再根据这10个泉的位置，推测出白浮瓮山河的路线。

白浮瓮山河走向大致可分为三段：一是白浮泉至横桥村北，渠道均在今京密引水渠北岸200至300米处，都在海拔50米以上。二是从横桥至冷泉段，渠道在今京密引水渠东侧和北侧。这段地面高程稍低于50米，填方量较多，因而也是最易被山洪冲毁的地段。三是从冷泉至瓮山泊段，渠道在今京密引水渠东侧。经推算，从白浮泉起到瓮山泊止总长约32公里。这条渠线既可多汇集泉水，又避免穿过低洼的沙河和清河河谷，保持了尽可能的高度。

在处理渠道与山溪交叉工程上，结合中国传统水利工程技术，创造性应用在白浮引水工程中，就是专门设置了12个渠道与山溪的平面交叉的“清水口”工程。

“清水口”工程是用荆笆编笼装石建成的“自溃堤”，山溪洪水过大时可将其冲毁，水过后人工很快可以抢修，比都江堰的飞沙堰修复还要容易（照片四、照片五）。

2) 扩建运河水源水库——瓮山泊

瓮山泊，最晚在金代时由玉泉山的泉水“汇为巨浸”。元代将天然湖泊建设成北京历史上第一座水库——西湖（瓮山泊）。水库修筑的具体情况，从元末失于治理的瓮山泊情景看，可知瓮山泊的存在是由湖堤维系的。控制西湖水量有上下两座闸。上闸位于青龙桥下，元代为白浮瓮山河流入瓮山泊的控制闸，明初重修后成为西湖向北排洪入清河的水闸。下闸是瓮山闸，后来移到绣漪桥下。元代皇帝都有专门游西湖的“御舟”。至顺三年（1332）文宗“泛舟于西山高粱河”，泛舟的目的自然是游西湖。明万历十六年



照片四 九龙山白浮泉鸟瞰



照片五 白浮泉九龙口出水情况

(1588) 神宗游西湖，阵容庞大，“经西湖，登龙舟，后妃嫔御皆从”。

3) 输水长河的建设和治理

昆明湖至紫竹院的河道（依现在称呼为长河），大约开凿于辽代。由于长河是城区通往西湖的黄金水道，在修建通惠河所建24座闸中，有6座在积水潭上游，即在长河上，用以控制水流。另外长河上还有麦钟桥、长春桥等著名桥梁。文献中记载，元明清皇帝和大臣们经常乘船经过长河到昆明湖泛舟。

4) 扩建积水潭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码头

积水潭，元代又称作海子。《元一

统志》记载“大都之中旧有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行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中统三年开玉泉水通漕运，先将玉泉水引入积水潭，再经过北支运河至通州。至元十六年大开坝河，积水潭是坝河的最大泊船水域。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开凿通惠河时，对积水潭进行全面改造和治理。积水潭承金代白莲潭北部水域，历明清演变成为今什刹三海。元代积水潭是一个大湖，面积比现代什刹三海大许多。明初改筑北城墙后，将大湖西北部分隔在城外，即后来的太平湖；后来城内的大湖由于上游水源的减少，又考虑德胜门内的交通，中间建德胜门桥将湖再分开。桥西的湖仍称积水潭，桥东的湖泊称作什刹前、后海。

5) 在通航水道的疏浚及闸坝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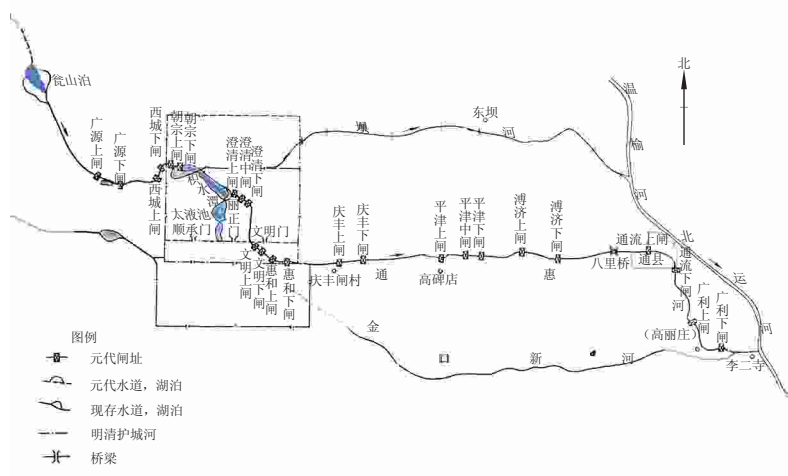
元代开通京杭大运河的北段——通惠河，并且在通航水道上修建24座闸，实现“节水行舟”，可以使运河船只直接驶入大都城内。

在通航水道上共新修建闸门10处，规划每处闸门是上下两座闸，共20座。施工时，其中有两处根据地形需要增建了中闸，加上原来已有的广源闸两座，最后河道上闸门总数为11处24座（图六）。

从上游开始，在长河上设闸4座、积水潭进出口控制闸5座、大都城外至明清北京城内河道设闸4座、大通桥至八里桥河道设闸7座、八里桥至通惠河入北运河处河道上设闸4座。其路线是自积水潭东出口澄清闸流出，经过今东不压桥胡同、北河胡同，向南过南河沿大街、正义路、台基厂二条、船板胡同、北京站东南出大都城。以下是改造金闸河河道（今通惠河）一段，直至通州城南的高丽庄李二寺入白河。回想当年浩浩荡荡的漕船队伍在大都城内驶过的情景，必定十分壮观。

下面以积水潭出口控制闸澄清闸为例，说明通惠河闸坝的演变。

澄清闸共3座（图七），初建时名海子闸，1295年7月改现名。据《析津



图六 元代通惠河24闸位置示意图



图七 元代澄清三闸位置示意图



照片六 20世纪40年代的澄清上闸

照片七 2012年的澄清上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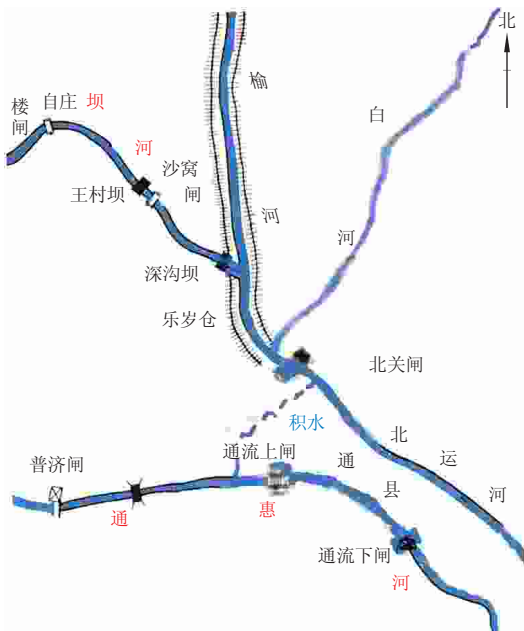
志》记载：“澄清闸三，有记，在都水监东南。”“万宁桥在玄武池东，名澄清闸。至元中建，在海子东。至元后复用石重修。虽更名万宁，人惟以海子桥名之。”万宁桥，又称海子桥，今称地安桥，或后门桥。桥西侧是澄清闸第一座，即上闸。明清仍然不断修治。这座闸一直使用到1953年。2000年在此位置上建成三孔“金锭桥”（照片六、照片七）。

关于澄清中闸，《析津志》记载：“丙寅桥，中闸，有记。”其位置在今东不压桥胡同与平安大街（元代“海子东西道路”）交叉处，桥紧靠道路的北侧。2007年4月中旬至2008年5月上旬，北京市文物部门配合基建工程对万宁桥至地安门东大街之间的填埋河道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出元代通惠河堤岸、明代玉河堤岸及其河道、清代玉河堤岸及其河道、东不压桥及澄清中闸遗址、两座便桥遗址、玉河庵遗址和码头遗址等（照片八）。

关于澄清下闸，见《析津志》记载：“望云桥，在后红门东，今澄清下闸。”后红门即元皇城的“厚载红门”，俗称“后门”。



照片八 澄清下闸发掘现场（2014年拍摄）



图八 坝河与北运河衔接情况示意图

明代将皇城北移，称“北安门”，清代称“地安门”。望云桥在厚载红门东，大约在今北河胡同与水簸箕胡同北口交叉的石桥处。2014年发掘出澄清下闸和桥的准确位置。

需要说明的是，设计时这里只有两座闸，由于地形变化大，施工中改为三座。这是元代京杭大运河进入终点码头积水潭最后一公里上所修建的复闸，这也是现在京杭大运河唯一能够看见的复闸，是中国大运河十分珍贵的遗产。

4. 元代通州地区是运河交汇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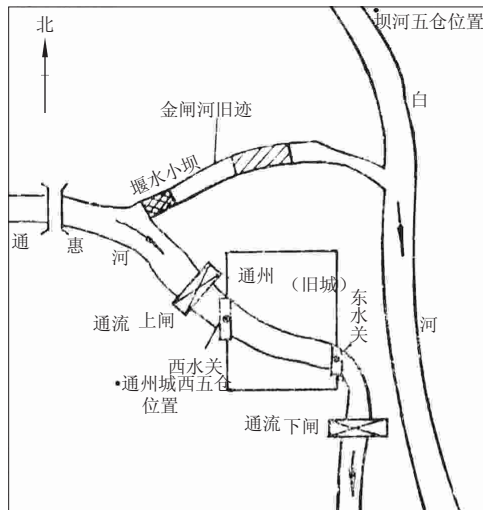
通州唐为潞县，金天德三年（1151）改称通州。大定十年金世宗开凿金口河，

是“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与潞河衔接地点在今通州城北。泰和五年开凿“金闸河”，与潞河衔接地点仍然在通州城北。

元代记载：“通州，唐为潞县。金改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有丰备、通济、太仓以供京师。”所谓“漕运通济”，说明通州漕运转运京师的功能十分重要。而元代大都开凿的运河，都要在通州与北运河衔接。

元坝河和双塔河，都在通州北汇入白河。《元史》记载：“今丈量，自深沟榆河上湾，至吴家庄龙王庙前白河，西南至埂河八百步。”可以确定坝河距离通州城北只有几百步，为此在附近修建了乐岁等五座粮仓（图八）。

而元代建通惠河时，在城北水道上修筑了一座“堰水小坝”，堵塞了金代通州城北的水道，改向东南至高丽庄（李二寺）入白河。其主要目的是要实现漕船的直航。《元史》记载，如果通惠河汛期水大时，洪水仍然可以从这座“堰水小坝”溢流而过，直接泄入北运河。这样便形成了“通州城北通惠河积水”（图九）。到了明代正统十四年（1449），为了保护通州旧城外西边的粮仓，在旧城西扩建了新城。嘉靖年间吴仲大修通惠河时在元代“废土坝基”的基础上，改建成石坝，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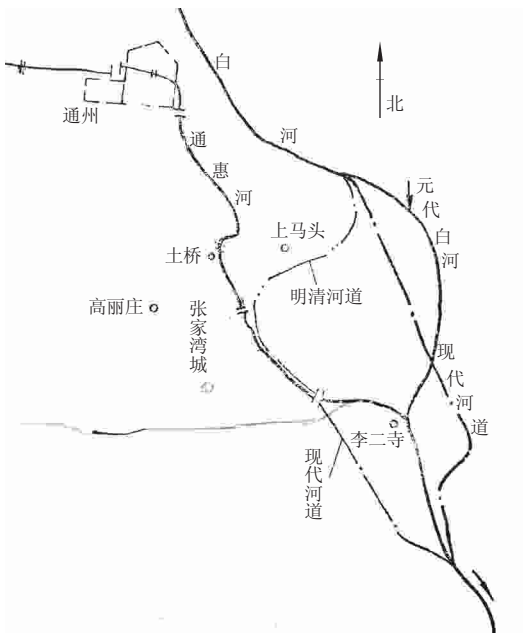
图九 元代通惠河与通州位置示意图

成“五闸二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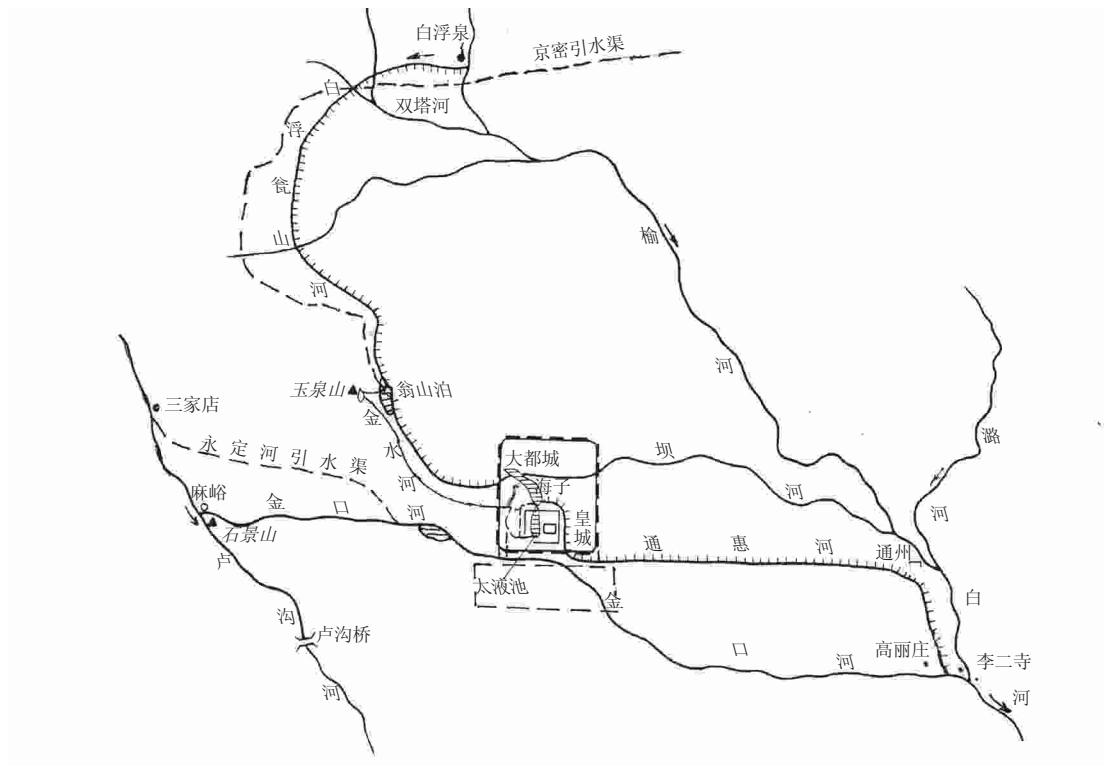
为了实现漕船由北运河直航入京城，解决两条河流的落差，在通州城南到李二寺之间修建了3座闸（即通流下闸、广利上闸、广利下闸），漕船就可以从李二寺河口，直接行驶，也节省了时间，提高了运河的效率。这样也缩短了高丽庄（李二寺）到大都的总航程。从文献上可以知道，元代白河李二寺至通州城的距离是15余公里，而沿通惠河李二寺至通州只有10公里，缩短了三分之一！到清代嘉庆年间北运河发生变化，在1801年9月邹炳泰绘制《运河全图》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变化（图一〇）。

此外，元初郭守敬开金口河及元末至正二年丞相脱脱等所开金口河，也是在李二寺入白河。据《析津志》记载，金口新河自丽正门外的河道路线是“东南至董村、高丽庄、李二寺运粮河口相合”。应该说是当时借用了通惠河入白河的河口。

元代京杭大运河进入大都城先后修建了3条运河（图一一）。



图一〇 通惠河通州至李二寺河道变化示意图



图一一 元代京杭大运河进入大都的三条路线

三、明清北京地区运河的建设与改造

1. 明初通惠河北京城内断航与吴仲对通惠河的改造——五闸二坝的形成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明朝建都南京，北京的漕运停止。朱棣继位准备迁都北京。永乐十五年（1417）朝廷决定重新治理通惠河，曾经派人到昌平县考察。作为通惠河上游的白浮瓮山河，土筑的河堤及荆笆编制的水口工程，近50年失于治理而荒废殆尽。并且因“元人引昌平东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经祖宗山陵，恐于地理不宜。及一亩泉水经过白羊口山沟，雨水冲截，惧难导引”。只能“独引西湖一泉”供应通惠河，从此水源困难。

永乐十七年（1419）建北京内城，将大都城墙向南推移了1公里，原在大都南面的文明、惠和二闸被包入城内。宣德七年（1432）六月，皇上以东安门外缘河百姓居住靠近黄墙，喧嚣之声响彻大内，命令行工部改筑东皇城墙于河东，将南北河沿大街一段通惠河完全包入皇城。从此什刹海以下城内河道已不能行船。正统三年（1438）五月大通桥闸建成，标志着明代通惠河新起点的开始，以后通惠河也因此称

作大通河（照片九）。

嘉靖初年，督漕官吏为运输修建北京宫殿的超大木材，再次建议大规模治理通惠河。嘉靖六年（1527）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经考察确定了筑新坝、修旧闸、浚河道，实行分5段搬运的方案。工程于嘉靖七年（1528）五月底完成。当年漕运获得成功，吴仲又提出管理上的改进方法，使通惠河安全运行了近60年，使用时间与元代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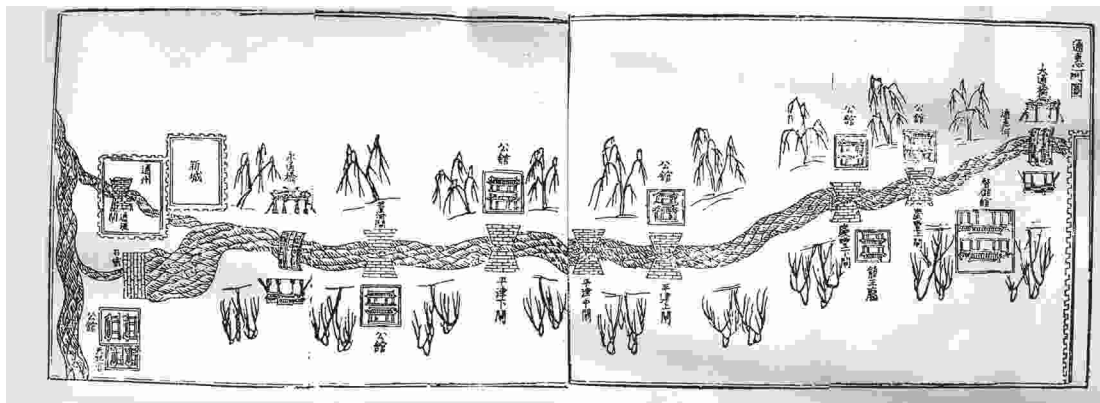
通过这次重修后通惠河漕运格局已成定式，至清不变，驳运与陆运并行（水陆并进）。隆庆元年（1567），北京城河闸坝工程定下3年一修的制度，一直执行到清末（图一二）。

2. 清代对通惠河的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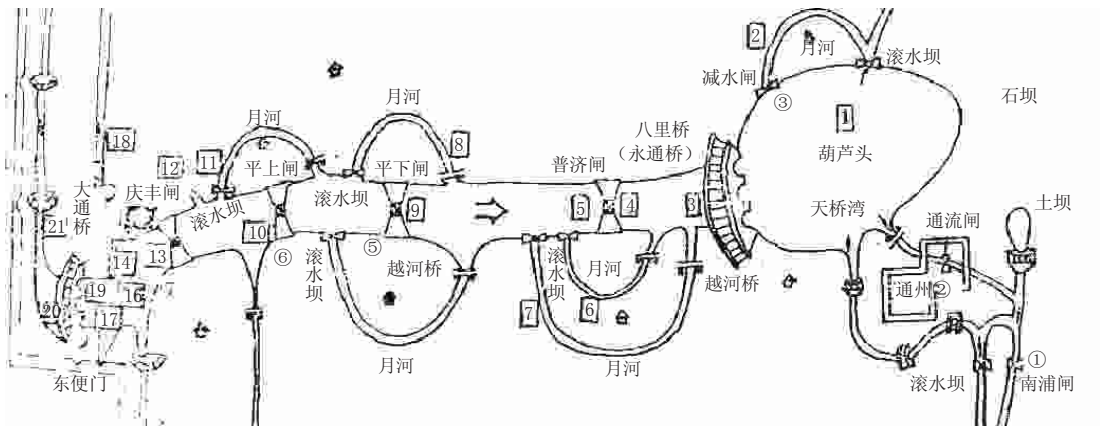
清顺治十四年（1657），给事中雷一龙请修石坝及里河五闸堤工，开始修治明末破败的通惠河。康熙三十五年（1696）全面整治通惠河，疏浚通州至京城五闸河道，加筑堤岸等。为解漕船停泊问题，翌年还全面疏浚了城东的护城河，引大通桥运船达朝阳门、东直门，以更靠近京城东部漕仓，减少陆运距离，节省了可观的运费。这段河道乾隆年间还多次修治，改岁修为集中大修办法，得到批准执行。道光二十九年（1849）大修通惠河，有工部竣工上报朝廷的黄本奏折和竣工图纸，



照片九 1930年大通桥及东南角楼



图一二 明代通惠河图（摘自《通惠河志》，图中上南下北）



图一三 清道光二十九年通惠河岁修竣工图（临摹）^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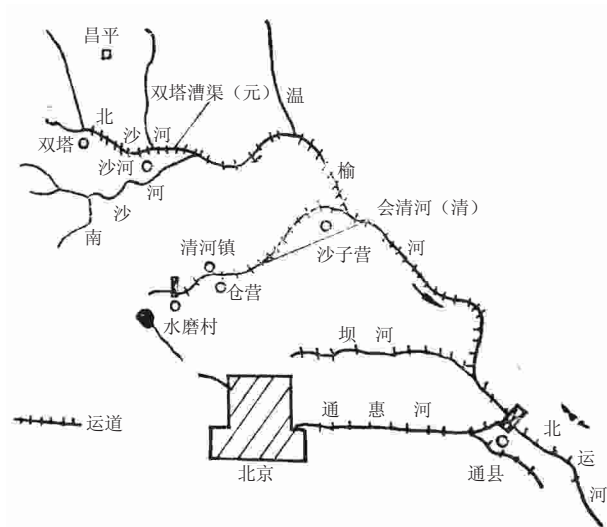
可以清楚了解当年大修所有工程量（图一三）。

由于通惠河水源只有玉泉山一处，乾隆年间进行大规模昆明湖扩湖工程。工程始于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十五年（1750）初已完工。这次扩湖工程效果显著。新湖的形成是将原来的堤防移至今知春亭以东，留下龙王庙孤岛，建十七孔桥相连，南移响水闸于新湖南端绣漪桥下。新湖周岸达15余公里，面积是原来的两倍以上。扩大了湖水面积和容量，并系统修建闸、坝、涵洞，保证了运河用水。同时对北京城市的防洪、灌溉、园林用水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年后，为了增加昆明湖的水源，进行了引导西山泉水至玉泉山的工程。引水上源有两处：“其一出于十方普觉寺旁之水源头，一出于碧云寺内石泉，皆凿石为

槽，以通水道。”^④ 水源头，即樱桃沟之水源，很早便得到开发，这次用石槽引导至广润庙前，分水龙王庙（遗址在今万安公墓站前）。碧云寺泉水有两处：一是寺左水泉院之水，一是寺右之泉。二泉合流，大约沿148米等高线流入香山见心斋，再南流为月河与双清之泉下流合为静翠湖，出香山园墙，利用石槽东流到广润庙内方池。这两条水道至四王府广润庙汇合后，再东行土墙上经普通、香露、妙喜诸寺，然后入静明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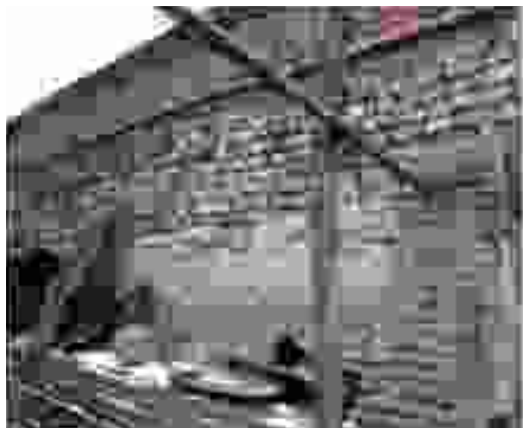
元代起北京修建许多粮仓，储存运河的皇粮（图一四）。元中统年间修建的千斯仓，应该是修复金代的旧仓。到至元十六年大规模开坝河以前，大都已经建有9座粮仓。开坝河后又修建了6座，共计15座。修建通惠河后又陆续兴建漕仓7座，京仓总数达22座。通州粮仓达13座。明清



图一四 温榆河历史上通漕运路线示意图



照片一〇 保存至今的南新仓建筑（2013年拍摄）



照片一一 通州大运西仓墙遗址

时北京城内东部在元代基础上修建的粮仓，至今还有几座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如南新仓（照片一〇）。通州的粮仓被陆续拆掉，只有大运西仓墙的遗址可见（照片一一）。

3. 明清通州以北至沙河和清河的运河

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九年（1411）决

定在昌平北修建陵寝，当时所需要的大量建筑材料和施工人员粮食，需要从通州运输。当时是沿温榆河至元代双塔漕渠到昌平，再通过陆运方便到达十三陵。温榆河在陵寝修筑完毕后还需要运输不少的守陵军，以及运输北部重要边关——南口军队的粮饷，温榆河的水运也一直不会停止。到明中期，温榆河的水运只到达沙河的巩华城。

清军入关后，昌平失去边防意义，沙河漕运衰落。但是清军诸旗驻军多分布在清河镇附近，军队需要的供应依赖通州北上清河水路运输。另外，清初修建三山五园时，需要大量的物质供应，很多时候需要水运。这样，在康熙年间开辟了会清河漕运，直到光绪初年废止。

乾隆《大清会典》记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开会清河，起水磨闸，历沙子营，至通州石坝止。中间建设7座闸，派120名闸夫，运通州米至本裕仓。本裕仓是当年为了收储军粮而新建的粮仓，设仓库30廩，共150间，其位置应在今清河镇东南500米左右的仓营村。

4. 明清两代对北运河的治理

明清两代对北运河治理十分重视。明正德十二年（1517）海河流域北部连续一周大雨，通州、张家湾“弥望皆水，冲坏粮船”，很快修复。4年后张家湾以南滨河地方再次被淹成灾。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北运河全线治理河道，修筑堤防。清康熙十九年（1680），派遣官员疏浚通州至天津的河道。康熙三十三年（1694），修筑通州运河堤827丈。雍正三年（1725）北运河大水，堤岸冲毁多处。第二年，怡贤亲王允祥奏请：北运河一切工程归通永道管辖。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怡贤亲王又奏请：所有工程都有保固年限，北运河工程较永定河稍容易，保固期定为2年，保固期内堤岸冲决，由承修官员赔修。



照片一二 《潞河督运图卷》部分

乾隆十四年四月，修筑张家湾被冲塌河岸460丈，建护岸排桩板工460丈，又建挑水木坝3座。乾隆三十八年（1773），温榆河上游发洪水，河道东移与潮白河汇合，下游河道干涸。原来通州石坝前的水源依赖温榆河下泄水，结果造成停泊困难。嘉庆六年（1801）大水，潮白河偏移下游东岸，西岸淤出岸滩。两年后派大员查勘，议定接着挑挖温榆河下游540丈新淤，这样可以通船到石坝。嘉庆十一年（1806）新挑处又淤并且向下延伸180丈。以后不再挑挖，而是斜挑引河，引潮白河水行舟。

5. 明清通州城扩建与漕运管理

通州城明初洪武元年（1368）修建，俗称旧

城，周长4公里多一些。正统十四年，因当时西南两大粮仓在城西门外，感到不安全，便修建新城包围起来。东边与旧城墙

表一 清代通州里管理外河漕运事务官员一览表

清代设官	人数	地点	说明	备注
总督仓场侍郎 司员 中书主事 巡漕御史 （道光三年裁撤）	满正1人 汉副1人 2人 数人 1人	通州新城南门以东 （今通州医院路北）		
户部坐粮厅厅承	满正1人 汉副1人		下设八科、三班、六役。职掌河道船只，验收粮米，赍征税收，课厘地亩。辖管七十二行业，六十四巡社	
坐粮衙署	数人	新城西门内大小红牌楼间，仓石道西		
大运西仓监督 大运中仓监督	满1人 汉1人 满1人 汉1人	坐粮厅衙署后 旧城南门内	各仓设书办、护卫、置仓花户头、更夫等数人	
漕运通判	1人	漕运厅衙署在东关里河沿大王庙南	管理河道岁修、抢修及一切疏筑工程，包括每年外河挖浅工程	
分辖土坝通州州同 分辖石坝通州州同	1人 1人	原在州署，后驻东关土坝公廨 原在州署，后驻北关石坝公廨	坝官职责：司权量，较盈绌。督运实仓及疏筑所属段内堤坝河道事务	
通流闸官 庆丰闸官	1人 1人	公廨在闸房 公廨在闸房	闸官专司闸务、启闭及堤工、纤道。凡两闸所需麻绳、板片、杂项公费银，于坐粮厅衙门请领	
里河外委把总	2人		专司堤工、纤道	
外河外委千总	2人		专司挖浅	
外河外委把总	6人		专司挖浅	
平家疃外委	1人		同治十三年设	

* 本表据通州梁耀庭整理

表二 清代通州里外河管理漕运事务吏役河兵一览表

吏役河兵种类		人数	地点	说明
坐粮厅八科： 经承 书手		8人 若干人		八科包括：东、西、南、北、 库、税、铜、漕。各有科房。 每科设经承1人，书手若干人。税 科管理经由运河运转的客商粮货 过路税或落地税。漕科管理河道 船只等
坐粮厅三班		若干人		三班：里班、外班、车马班。承 担衙署各科内外传呼、值堂、车 桥马匹、仪仗值役等杂项差役
坐 粮 厅 六 役	头宅			搞门，任承启
	二宅	书办4人		管土坝
	三宅	书办19人 小写4人		管石坝
	社人	数人		验粮官的前驱顶马，管承验米 样，数人轮流值差
	运役： 水脚 船头 车户	军粮水脚104人 五闸共计125人 50人		水脚、船头、车户等运役，负责 盘脚入库之役
	经纪： 军粮经纪 白粮经纪	100人 25人		
闸 夫	通流闸夫	42人		兼管减水、响闸、节水、南浦四 闸启闭、修护
	庆丰闸夫	80人		兼管平津上、平津下、普济三闸 启闭、修护
河 兵	漕运厅管河兵	80人		通流、庆丰、南岸下汛、北岸上 汛共四处
	通州州同管河兵	10人		
	通州州判管河兵	15人		
	通州驻鄆州判管 河兵	20人		
	平家疃外委管河 兵	16人		

* 本表据通州梁耀庭整理

相连接。直到清乾隆三十年（1765）重修通州城时候，才拆去旧城西门，两城合并为一。旧城留有东、北、南三门，新城有西、南两个门。通惠河流到通州分三支：一支自西水关入城，出东水关，折而绕城南流至东南，至南浦闸向南流至张家湾入北运河（这是元代通惠河旧道），旧城东门外有土坝，凡是准备暂存通州粮仓的均由土坝卸船，由此路运至通州仓；一支自旧城西水关向北分流，至北门外葫芦头水域，由石坝北侧滚水坝泄入北运河（这是明代嘉靖年间改造后的路线）；一支自新城西门外南流，作为护城河向东，过新、

旧城南门，出南浦闸，与第一支水汇合，南流至张家湾入北运河。

清初承袭明制，设总督仓场，由户部满、汉侍郎各一员充任，仓场衙门仍在京城内，下设京粮厅；公署后来迁到通州新城南门内，下辖坐粮厅。坐粮厅满、汉各一员，任期2年。其下辖石坝州判一员、土坝州同一员、通济库大使一员、通州税课司大使一员。坐粮厅管理漕粮验收，查验抵坝漕船米数和米色（数量和质量），安排监管重、空粮船，督令经纪车户转运粮米交京、通各仓，以及各闸坝堤岸的修固等事务。乾隆三十年后，由漕运通判专管，并兼抽通州税课，另设巡漕御史一员，监督漕运管理，直至道光三年（1823）裁撤（照片一二）。
清代管理通惠河（里河）和北运河（外河）官吏驻通州情况见表一和表二。

四、民国时期北京地区运河复航的规划

通惠河断航后，成为北京城市重要的排水河道。民国时期北京市内河湖，由于疏于管理而淤垫严重。为了进行治理，曾进行较详细的调查和规划。1929年调查报

告指出,“积水潭、什刹海以东及至李广桥之河渠,尚属齐整,惟河心间有浅垫。自李广桥经恭王府后身至三座桥河身均亟淤垫,系倾倒垃圾煤灰所致”^⑤。

清末民国初期,许多留学欧美学成回国的学者和一些来中国工作的外国水利专家,带来了西方水利科学技术。民国政府初期,对运河进行勘察与规划,做了一些河道整理规划,为北京地区运河的复航做出了努力。尽管由于时局动荡等诸多因素影响,这些规划大部分没能够实施,但是为北京运河复航留下宝贵的参考资料。1918年,成立顺直水利委员会,实测了《北运河横剖面图》;1927年,实测了《通惠河横剖面图》。

1928年7月到1929年9月,曾经留学法国的著名工程专家华南圭担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他着手制订城市水系整治计划,完成了《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计划书》与《北平通航计划之草案》。为了解决玉泉水量不足,还制订了从永定河引水以及河道通航的《北平通航计划之草案》。草案提出永定河三家店至北平、北平至天津的通航路线,并详细说明永定河引水、河道设计、河水沉淀冲刷、清水利用等工程技术各种问题。

1934年9月,由北平市工务局制订了《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等城市建设计划,为北京地区的水利与运河的恢复做出积极努力。可惜因政府财力等原因只停留在规划上,少有实施。

在京杭大运河治理方面,1933年11月聘请汪胡桢为总工程师,编制京杭大运河整理计划。1935年8月公布了《整理运河工程计划》,这是中国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技术勘测

京杭大运河全线,公布北京东便门—杭州拱宸桥—钱塘江岸大运河全线总长度为1768公里,这是最接近历史的长度^⑥。其中关于北平至天津段运河整理计划的初步报告,实测了许多珍贵资料,虽只停留在纸面上,但对运河复航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新中国北京地区的运河治理与保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进入一个新时代。经过60多年的建设,北京地区的河湖水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北京河道治理进入全新时期,尤其是对通惠河、坝河、北运河的系统治理后,河道被改造成环境优美宜人的公园。随着旅游业的大发展,许多河道已经可以通航,相信不久的将来,北京运河复航的梦想会实现。

1. 北京市城市水源的开发——昆明湖的新水源京密引水渠

新建京密引水渠,成为昆明湖最重要最可靠的水源。1990年12月至1991年3月,北京约20万人响应政府号召,在严冬雪天里参加昆明湖的全面清淤工程。该工程是30年来最大的治理,扩大湖面,改善水质,使古老的水利工程更加绚丽多彩。

2. 坝河的治理

1975年坝河开始全面治理,至1978年完成,在坝河上共建7座闸控制排水,与700年前修坝河建7坝数目一样。2011年,



照片一三 2014年的坝河



照片一四 保护后的郑村坝遗址

又对坝河进行大规模治理和景观建设（照片一三、照片一四）。

3. 通惠河的治理

新中国成立后对北京城市河道的综合治理与对水源的保护十分重视。

1998年修整庆丰闸遗址时，新建一座汉白玉雕刻拱桥，北岸墙上刻有壁画和题字。2009年，朝阳区政府以庆丰闸为中心，沿通惠河两岸修建庆丰公园。其西部以绿化景观带为主，水系景观用水全部来

源于通惠河（照片一五）。

4. 通惠河河道与建筑遗存

（1）长河段。即西直门至昆明湖段河道。古代有一条发源于紫竹院公园、注入积水潭一带的河流，称作高粱河。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有广源闸（照片一六）和高粱闸（照片一七）。

（2）老城区段。这段自积水潭东岸澄清闸起至东便门。这段河又称玉河、御河、御沟、闸河等。明永乐年间曾经修治过这段河道。2008年5月恢复了万宁桥和地安门东大街之间河道，发掘出建在东不压桥上游燕翅上的澄清中闸。2014年发掘出澄清下闸和桥的准确位置，并计划恢复部分河道（照片一八）。



照片一五 新建汉白玉雕刻拱桥（桥上游几米处就是原庆丰闸遗址）



照片一六 2008年的广源闸



照片一七 2008年的高粱闸遗址



照片一八 2008年恢复的通惠河市内河道



照片一九 东便门外通惠河（1987年拍摄）



照片二〇 平津上闸（高碑店闸）遗址（1986年拍摄）

(3) 东便门至通州段。根据1981年交通部《全国内河航道普查资料汇编》，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东便门，南至杭州艮山港，全长1747千米，其中第一段北京东便门大通桥至天津屈家店165千米，这个长度与1934年汪胡桢调查数据基本一致，属于不能通航河道。现在整个京杭大运河大约只有1000公里可以通航，约700公里不能通航（照片一九、照片二〇）。

通惠河在城外的河道作为北京城区重要的排水主干渠一直使用着，曾经一段时间污染严重，环境变得较差，经过十几年的治理，通惠河已经开辟为朝阳区的河道公园，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去处。

在高碑店河道南部还有平津上闸遗址保存比较完整，闸的主要建筑都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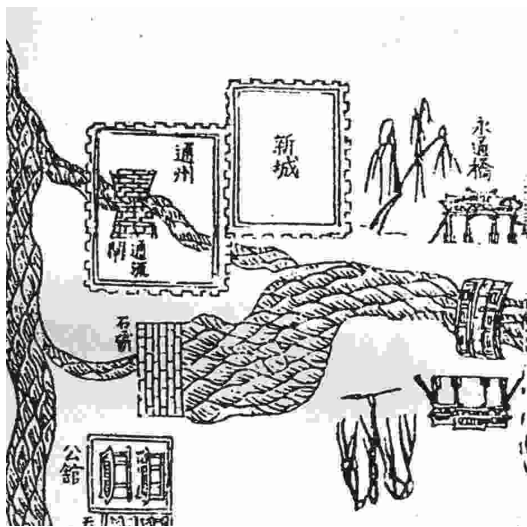
通惠河八里桥以下至卧虎桥北运河口一段河道，历史悠久，变化很大。元以前曾经是金闸河从通州城北入潞水河道。明嘉靖七年吴仲大修通惠河后，漕船又改回通州城北入北运河（通惠河在城西门还分一支入城）。漕船过八里桥后是进入“通州城北的积水”，就是后来称作葫芦头的水域（海拔20米），葫芦头的东端是石坝，也承担泄洪任务。通惠河的船只停泊在这里装卸漕粮，这是当年的主航道。在葫芦头北面有滚水坝和减水闸来分泄洪

水，泄水渠经过卧虎桥进入北运河（海拔16米）。葫芦头与北运河有4米落差。新中国成立后将这段泄水河道变成今天的通惠河“主河道”（图一五～图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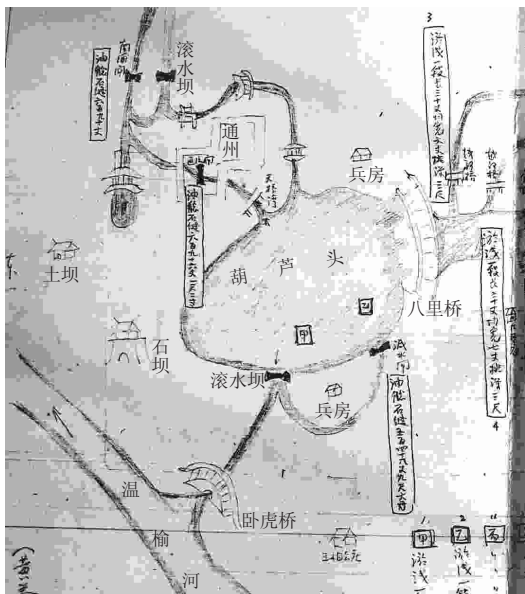
图一六是清张鹏翮康熙四十二年（1703）出版的《治河全书》中的插图，是清初通州与北运河水道关系的写照。可能有些人看到这幅图中通惠河到通州就断掉了，与北运河没有联系，就认为京杭大



图一六 1703年通惠河入北运河路线



图一五 1528年通惠河入北运河路线



图一七 1849年通惠河入北运河路线



图一八 1881年通惠河入北运河路线

运河的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把图一五至图一八系统连接起来，再与1987年航拍的资料对照起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十分清楚了。

另外，由于通惠河、温榆河等古代运河都是北运河的支流，主管这些河流的北京水务局在文件中就有以北运河代表北京运河的说法。如1987年北京水利志编辑委员会编写的《北京水利志稿》第一卷第三章“北运河水系”中写道：“北运河，其主要支流之一通惠河，原为由北运河直达北京的通航河道，现仅负担城区和西郊地区的主要排水任务。北运河作为京杭大运河首段，历史上为解决南粮北调和沟通南北文化、政治交流发挥了显著作用。”从现在管理角度出发，把北京所有运河都看作是北运河水系是没有问题的。

5. 北运河的治理

1949年和1950年连续两年大水，河槽普遍漫溢，河道淤塞，泄洪不畅，通县灾情严重。在水利部领导下，河北省组织通县（今通州区）民工以工代赈，对北运河大堤进行修复。开挖了潮白新河后，潮白河不再入北运河，从此潮白河经过蓟运河单独入海。

1958年，在温榆河支流东沙河上修建了十三陵水库，成为北运河上游最著名的



照片二一 北运河北关闸



照片二二 北运河分洪闸

工程。1972年6月提出《北运河干流治理工程初步设计》，自北关闸至天津市入海口全面治理。北京市分两期完成通县北关闸至牛牧屯河口河段治理。1973年6月完成一期工程，1974年完成二期工程。1978年修复了唐山大地震对运河堤防的损坏部

分。1992年，完成杨坨至牛牧屯左堤加固和部分堤段的裁弯取直。经过多年治理，北运河水系的防洪能力大大提高（照片二一、照片二二）。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申遗获得成功，大运河申遗保护工作翻开新的一页。全国从中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申遗过程中北京市将大运河历史水系和相关遗产保护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和申遗准备工作。结合北京地区运河遗产实际情况，编制了大运河北京段遗产保护规划，并划定了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逐步对大运河及沿线的文物古迹进行保护修复。昌平区白浮泉遗址、海淀区广源闸、西城区万宁桥、东城区东不压桥遗址、朝阳区高碑店闸、通州区燃灯塔、通运桥等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加固。此外，海淀区长河、西城区什刹海、东城区玉河北区、朝阳区通惠河、通州区北运河等均进行了环

境整治工作，建成了庆丰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等，使大运河遗产本体保护状况和环境风貌得到明显改善。

①《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三年十二月丁亥，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今石景山还发现至元三年刻石遗迹。

②《元史·世祖本纪》：“中统三年八月己丑，郭守敬请开玉泉水以通漕运……并从之。”

③ 原图名《清道光二十九年通惠河南北两岸岁修各工图说》，彩绘，带贴黄用方框内数码表示，国图善本部藏。

④（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一〇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72页。

⑤ 北平特别市工务所：《工务特刊》，民国十八年（1929年）。

⑥ 现在媒体流行说法总长度为179里，是一个记者计算出来的，没有依据。

（作者分别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水电部教授级高工）

明代空运与昌平河和潮河川运道

陈喜波

一、明代北京长城沿线军镇与空运

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京师防卫成为国家头等大事，为了备御蒙古，明王朝在北部边境地带的战略要地和交通要冲都修建了城堡，东从山海关起，西至嘉峪关，修筑了长城，称为边墙，其中宣化、大同之南还修筑了内长城，称为次边，这就是今日见到的万里长城。明王朝在长城沿线设置军事重镇，派驻重兵。自明初至中叶，明朝先后设置了九个重镇统领前线军士，统称九边镇。“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①沿长城一线的密云、昌平因地近京师，军事防御尤为重要。密云地处北京通往塞外的古北口大道上，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夫密云西拱京陵，与居庸、紫荆相为犄角，北临古北，东控渔阳，西南则为潞河，万艘并下，国计攸关，此要害之地也”^②。嘉靖年间，俺答从古北口侵入内地，逼进京师。为了加强防卫，明政府“特遣重臣督镇蓟辽，驻节于密，是为蓟镇。其总兵开府兵备专司俱在密治，遂称总镇城”^③。昌平地区位于北京城北，“东为诸口之屏蔽，西为各区之军饷，北为陵寝之护卫，南为京师之屏障，较诸他郡城池，诚重且大焉”^④。嘉靖三十年（1551），分蓟镇置昌镇，“尔时廷议重其地，爰立大将，以总兵都督官镇守之，割黄花、居庸、镇

边三要害，以三参戎严斥堠，定左右中军四营，以四游记选健儿，于是士农工贾，悉于窟宅，迄今称雄镇哉”^⑤。

北京北部的昌平、密云是防卫都城的军事重镇，长城沿线驻扎大量军队，从而产生巨大的粮食需求。明代，通州是漕运的终点，漕粮运至通州卸载，然后分别运入北京仓和通州仓。长城沿线驻军所需粮饷需要从北京城或通州运至长城沿线，或官军至北京仓自行支取。为了方便官军支取漕粮，明廷在长城沿线重要关镇设置边仓，将粮食从北京仓和通州仓运至边仓以供应军需。《明史·食货志》记载：“凡诸仓应输者有定数，其或改拨他镇者水次应兑漕粮，即令坐派镇军领兑者给价，州县官督车户运至远仓，或给军价就令关支者，通谓之空运。”^⑥由此可知，空运即官府差派平民为官军输送粮饷，即漕粮由州县官员组织车户自北京、通州运至昌平、密云等边镇的运输过程称作空运。空运之法，并非仅仅在昌平和密云两个军镇实行，北京东部的蓟州、永平，北京西北的宣府、大同也实行空运。蓟州空运至少始于成化二十年（1484），按《通漕类编》记载，成化二十年，明廷将运往蓟州二十四万石漕粮拨出十万石运往丰润仓，供永平、山海关等地军队就近支取。大同宣府曾于明嘉靖年间实行空运，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河漕·宣大二镇漕河》：“宣府、大同二镇，粮饷运道最苦。嘉靖末年，行空运之法，山谷崎岖，率三十石而致一钟，当事者忧之。”《国朝献徵

录》记载：“（嘉靖）二十二年三月钦依空运京通二仓米二十五万石于怀来，分给宣大，各就彼关支。”^⑦表一为明代万历以前的空运情形。

明代后期，为了把漕粮运抵边境沿线，便于官兵关支漕粮，明廷在北京地区利用众多河流建立了便捷的漕运系统，先后开辟了潮河川、蓟州河、昌平河以及丰润还乡河等几个水运交通线。《明史·河渠志》记载：“由天津达张家湾曰通济河，而总名曰漕河。其逾京师而东若蓟州，西北若昌平，皆尝有河通，转漕饷军”^⑧。

《通粮厅志》说：“国家定鼎燕京，昌平密云东北二重镇也。旧制，实漕米于下以备军需，名曰空运。”^⑨北京北部设有昌平和密云两个军镇，起初每年运往密云镇的军粮有十万石，漕粮从通州沿潮白河溯流而上至顺义牛栏山，然后陆路转运至密云，若遇雨水稀少之年，潮白河水浅不能载舟，漕粮则需从通州陆运至密云，运输过程极其辛苦。据《通粮厅志》记载，万历元年（1573）曹维新首任浚河之役，疏通昌密二镇运河，“自潞河浚而上，合清河以抵沙子安济营，自牛栏山而上合潮白二水以抵密云，二镇便之”^⑩。

万历二年（1574）并两镇军务，在通州旧城东北置督运昌密漕粮户部分司，设户部主事一员，驻扎通州，负责每年空运漕粮事务^⑪。

二、昌平河运道

昌平河即温榆河，“昌平河，运诸陵官军饷道也”。昌平有北沙河、南沙河、东沙河，三条河流在昌平东南汇流，以下河道为温榆河，也称榆河，屈曲东南流，至通州城北入潮白河，合流后为北运河。昌平位于北京西北，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在昌平北天寿山建造陵园，明历朝皇帝皆埋葬于此，朝廷派驻军卫守护陵园。因此，昌平成为边防和陵寝防卫重地，军卫众多。最初，守护陵寝的军卫前往北京仓支取粮食，往返劳顿，疲惫不堪，《河漕通考》记载：“先是，护陵诸军每月就食于京师，往复辄经旬日，后改为陆运，则费且不贲。”^⑫驻守长城沿线的居庸、渤海等卫所官军所需粮饷也需要至京城关支，运输过程极为艰苦，“先是卫军选入营路与边军共资防守者，仍于京仓支粮，甚为繁苦，且多弊窦”^⑬。嘉靖年间，开始陆运部分粮食至边境，但远远不

表一 明代北京地区万历以前的漕粮空运情况表

时间	漕粮空运情况
成化二十年（1484）	题准遮洋支兑30万石除天津等仓6万石外，将蓟州24万石内改拨10万石丰润仓交收，以备山海远卫官军支給
弘治九年（1496）	题准本色10万石赴蓟州仓上纳，折色14万石运送永平库收贮，以便官军月粮
嘉靖二十九年（1550）	命拨漕粮20万6千余石接济密云、昌平兵马
嘉靖三十年（1551）	题准蓟州班军6万7千员名，该行粮13万4千石于漕粮内拨运
嘉靖三十四年（1555）	题准密云主客粮米内量改6万石给昌平支用
嘉靖三十五年（1556）	题准减免密云昌平漕粮5万石
嘉靖三十九年（1560）	题准令运官将运密云镇7万石昌平镇3万石并行粮14万4千3石3斗径运该镇，岁以为常
嘉靖四十四年（1565）	以蓟永分镇，拨蓟镇本色10万石，折色8万4千石；拨永平折色5万6千石
隆庆三年（1569）	除原派蓟镇仓粮船只照旧外，仍将临清各水次应兑漕运坐派昌密二镇，以便北卫所军船就近派兑。工部设厂，户部委官监收，就与领运，以免进仓出仓繁费。其应用脚价盘剥该扣米11 612石，每石5钱，行令有司征银10 806两随起解，以备空运
隆庆四年（1570）	题准空运石匣、古北等远仓者，两镇管粮郎中主事于春谷照地里远近给发脚价，责令该县官督率车户各仓分，或将脚价给军，就彼关支，各从其便

* 资料来源：王在晋撰《通漕类编》卷4《漕运》

能满足要求,《四镇三关志》记载:“原米通运京仓上纳,嘉靖三十三年始派拨三万九千二百七十二石有奇陆运至镇给军。”

《长安客话》载,“沙河东注,与潞河合。每雨季水泛,商船往往从潞河直抵安济桥下贸易,土人便之”^④。该记载说明雨季温榆河能够通航,为供应军粮,明廷开始利用温榆河输送漕粮,以供应守陵官军以及居庸关等城堡关口驻军。按《通粮厅志》记载,昌镇水道“源出塞外,经居庸关南东流,合东山口泉,又东会朝宗河,又东合龙山泉,势若泛滥而支流则漫散,沙碛胶阂,又东至沙子营合小清河入通州潞河,一百八十里”^⑤。温榆河开始作为漕运河道始于隆庆六年(1572),按《河漕通考》记载:“总督侍郎刘应节会巡抚都御史杨兆议于巩华城外安济桥起至通州渡口止,疏通一河,长一百四十五里,内水深成漕,现可行舟者一百余里,散漫淤浅稍费开凿者三十余里。发永、巩二营并募靖军夫三千人治之。”^⑥在《明实录》中也有关于温榆河疏浚通漕的记载:“户部奏请开浚榆河,自巩华城达于通州渡口,运粮四万石给长陵等八卫官军月粮,从之。”^⑦万历元年(1573)二月,神宗“令昌平兵备佥事张廷弼疏浚巩华城外旧河,廷弼原勘河道可省陆运费岁八千金,及运船至而淤塞不前。乞运司官杨可大以为言。户部奏行廷弼速浚之”^⑧。

温榆河疏浚之后,漕船循沙河逆流而上,直抵安济桥下。明廷遂停止护卫陵寝官军在京支取漕粮的制度,“题准长陵等八卫拱护陵寝官军月粮旧在京仓关支,不便。自万历元年为始,岁拨漕粮一十五万石运赴奠靖仓交纳,以便前项官军就近关支”^⑨。总督刘应节因本镇卫军赴京支粮不便,“增发一十五万石抵巩华城奠靖仓收贮,是为京帑云,专给主兵。官运船二百只,水手四百名,挽夫六百名,每船运米四十五石”。漕粮经温榆河运至巩华城,入城内奠靖仓收贮,供应蓟镇永、

巩、昌、标四营及长陵等八卫官军粮饷。万历九年(1581),“题准奠靖仓原拨漕粮十五万石内将二万石自沙子营陆运改拨居庸仓收贮,凑放居庸、黄花、横岭三路官军月粮,以免招商劳费”^⑩。

温榆河含沙量高,从其上游河流东沙河、南沙河、北沙河之名即可知此河特性,因此温榆河河道泥沙易于淤积,形成浅滩,阻碍航行。据《通粮厅志》记载,温榆河有浅滩一百八十一处,“通州至富河浅四处,郭渠浅七处,金盏浅八处,苇沟浅八处,孙后浅五处,花黎坎浅十处,新堡浅四处,沙子营浅四处,古城浅十处,土沟浅十处,鲁滩浅五处,藺沟浅十处,汤山浅十处,上辛浅十八处,枣林浅十三处,小牛房浅十八处,三岔口浅二十处,自三岔口至安济桥,其浅处虽多,大略流沙,故难定耳”。隆庆六年,朝廷疏浚温榆河,“浚通沙子营下流,舟运其上流”,万历六年(1578)浚通温榆河,漕船可从通州直达巩华城安济桥^⑪。同书记载,“按二流沙浅皆旧迹,今经疏导已于重舟无甚碍也”^⑫。《通粮厅志》成书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可知万历六年河道疏浚之后,可以通行漕船了。

三、潮河川运道

潮河川运道即潮白河上游河道,漕船可自通州城北至密云。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汗入塞侵犯北京之后,明廷加强了边境防卫,遂设蓟辽总督,嘉靖三十三年(1554)移驻密云。作为军事重地,密云一带兵将屯结,卫所众多,“岁用漕粮十余万石”^⑬,密云及长城一带广设军粮仓,密云城中有龙庆仓,古北口城中有古北口仓,大水谷有广积仓,贾家集有广有仓,石头岭有广盈仓,白马关有广丰仓,墙子岭有广储仓^⑭。按《四镇三关志》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始派发米十万四千八百一十石,每年自通州漕运至牛栏山,陆运至密云龙庆

仓收贮，专给主兵”。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以前，白河并未经今密云县城西南流，而是在从马头山西经龚庄子、河北村南西流，进入怀柔县境，至顺义县牛栏山与潮河汇合后南流。潮河自古北口入境，流经密云城南，又西南流至顺义县北的牛栏山汇入白河。自牛栏山以下至通州为潮白河，漕粮可循潮白河上溯至牛栏山，再陆路转运至密云龙庆仓。

嘉靖三十四年，为了利于漕运，总督蓟辽保定军务都御史杨博上疏奏请新开密云白河，以便水运漕粮，“于城西杨家庄地方筑塞新口，疏通白河故道与漕河合流，俾通州漕粮直抵密云城下。仍于城西修筑泊岸以防城壙崩塌之患。从之，未果”^⑤。这次开河工程，使白河改道，东流至密云城西，再南流与潮河汇合，但没有达到利用河水输送漕粮的目的。嘉靖四十三年（1564），因漕粮“悉由通州陆运至牛栏山，转输密云，颇称劳费”^⑥，密云总督刘焘疏请疏浚潮白河，得到批准。“至是，总督刘焘发卒疏通潮河川水，达于通州，更驾小舟转粟，直抵该镇，大为便利，且省僦运费什七。”^⑦然而，没有过多久，潮白河复淤浅，通漕不便。

据《明穆宗实录》记载，隆庆六年二月，密云总督侍郎刘应节建议在顺义县城增建仓廩，“先是漕粮输密云者，时遇雨，或有警，不能径达，往往寄顿牛栏山，以待转运，多有损失。于是总督侍郎刘应节议于顺义县城建仓收贮，俾三县人民脱挽运之苦，户部覆请，乃许之”^⑧。按上述文字所述，可知漕粮自牛栏山以上还是利用陆运输送为主，故有“三县人民挽运之苦”。同年七月，刘应节又提出遏潮壮白的建议，拟疏通牛栏山以上至密云的河段，以利于漕运：

塞备以储饷为急，军需以漕挽为便。密云一城，环控白、潮二水，若天开以便漕者。向二水分流至牛栏山始合，故剥船自通州而上者，亦至牛栏山止。若至龙庆仓从陆输挽，军民艰苦之状，水次露积之

虞，难以悉状。今白水徙流西城下，去潮水不二百武，前於城东北业筑三合土堤，障水防城，近又疏渠于上，植坝于下，邀潮入白合为一派，水深漕便，剥船可达密云无疑。^⑨

朝廷批准其建议。于是，明廷阻遏向西南流的潮河，迫使河道在孤山西折而西流，在密云城西南河漕村与白河相汇。二水合流增加了河流水势，漕船可以直行到密云城下。万历元年，在原来运送十万四千八百一十石漕粮基础上，增发米五万石，专给客兵。“共米十五万四千八百一十石。仍本船运至牛栏山，继以剥船运至城下，贮龙庆仓。”牛栏山以上至密云之间，设剥船二百只，水手四百名，挽夫六百名，每船运米四十石^⑩。顺义县有营州左屯卫，最初营州左屯卫官军月粮自通州支取，路远不便。万历十二年（1584），决定利用潮河川运道转运漕粮，每年漕粮到达时，“通州管粮郎中拨发二千五百石，就令昌镇管粮经纪自通州水运至顺义县小东庄，……自小东庄陆运至城”^⑪。

潮白河多泥沙，如从密云到牛栏山之间百余里，“多齿石壅沙下流”，受到泥沙淤积的影响，漕运不畅。据《通粮厅志》记载，通州至牛栏山有沙浅一百五十七处，“通州至五里墩浅三处，双埠头浅五处，李家桥浅十处，后角浅五处，沙浮浅七处，李遂浅六处，河南村浅十二处，东庄浅七处，向阳浅十处，牛栏山二十处”，牛栏山以上河道多石浅，“自山至四季屯石浅水溜十处，全（泉）河屯石浅水溜六处，罗山石浅水溜十处，三间房石浅水溜九处，棘针基石浅水溜十二处，荆栗园石浅水溜十三处，密云县石浅水溜十二处”。自嘉靖四十三年（1564）疏通潮河川后，“隆庆六年导浚行舟，万历六年再浚牛栏山上流，舟行直达密云镇城”^⑫。自隆庆六年，遏潮壮白之后，朝廷加强了对潮河川运道的疏浚工作，使漕运得以畅行。“是后随时浚修，



图一 潮河川运道和温榆河运道图

漕渠加辟，自通至牛栏山一带，粮艘通行，惟自牛栏山以北至密云五十七里地，系山脉走沙善淤，设立官军岁事挑浚，亦堪永赖矣。”^⑤（图一）

四、结论

综上所述，潮白河和温榆河在明代也曾作为漕运河道，是运河漕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北京地区运河漕运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在明代维护京城安全和边境防卫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明代开辟的潮白河和温榆河运道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清代利用温榆河为圆明园八旗输送军粮，潮白河在清代继续作为民间水运通道而存在，便利了南北物资与文化交流，其影响直至近代。虽然温榆河和潮白河作为漕运河道的的时间不长，但却给沿岸留下了深刻的运河文化烙印，至今通州平家疃村民依旧将其村西的中坝河（原潮白河故道）称作“运粮河”。

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5-146页。

④ （明隆庆）《昌平州志》卷三《建置志·城池》。

⑤ （清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五·祠祀上》引《韩四维尤公生祠碑记》。

⑥ 《明史》卷七十九《食货三》。

⑦ （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五十七。

⑧ 《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三》。

⑨ （明）周之翰：《通粮厅志》卷十一《艺文志下》。

⑩ （明）周之翰：《通粮厅志》卷十二《备考志》。

⑪ （明）周之翰：《通粮厅志》卷三《秩官志》、卷六《公署志》。

⑫⑬ （明）黄承玄：《河漕通考》卷下，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地理类》第22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491页。

⑭⑮ 《明神宗实录》卷六，隆庆六年十月己卯。

⑯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四《郊垞杂记·清河沙河》，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8页。

⑰⑱⑲⑳ （明）周之翰：《通粮厅志》卷五《河渠志》。

㉑ 《明神宗实录》卷六，隆庆六年十月己卯。

㉒⑳ （明）王在晋：《通漕类编》卷四《漕运·空运》。

㉓⑳⑳ 《明世宗实录》卷五百三十八，嘉靖四十三年九月癸丑。

㉔ （明万历）《顺天府志》卷二《营建志·公署》。

㉕⑳ （明）黄承玄：《河漕通考》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地理类》第22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489-490页。

㉖ 《明穆宗实录》卷六十六，隆庆六年二月辛丑。

㉗ 《明神宗实录》卷三，隆庆六年七月丁亥。

㉘ （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卷四《粮饷考·蓟镇粮饷》。

㉙ （明）王在晋：《通漕类编》卷四《漕运·空运》。

① 《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

② （清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三·城池》引《刘应节新建重城记略》。

③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七《关镇杂

（作者为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教授）

从通州万亩森林公园谈大运河历史风貌的保护问题

周 良

北京市通州万亩森林公园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通州城的东南，在张家湾镇与潞城镇交界处，夹运河而置。园内大运河长8.6公里，水面宽200米，保留有古代湿地2处，共320亩，河岸林荫最宽550米，最窄也有100米，植有树木200余种，延续或恢复了古代运河风貌。这是北京市与通州区两级政府严格执行国家文物保护方针，保护运河历史景观并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典范，应该列入大运河申遗点。

为什么此处公园内大运河段没有写入申遗报告文件，甚至连后续补增申遗点都没有列入呢？据推测原因或有两个：其一，通州区没有将古代通州大运河段文化内涵和历史风貌完整系统地汇报给北京市政府和文物局及相关部门，使之没有全面彻底地了解通州运河古情；其二，参与申遗的专家学者不得深知通州大运河段文化内涵和历史风貌，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从而导致通州大运河段被落在申遗范围之外。这里不想讲万亩森林公园内大运河段的文化内涵丰厚状况，仅根据历代史料就通州大运河段两岸的历史风貌，简略谈些看法。

一、通州运河两岸多以“林”为名的村庄

在《通州区行政区划地图》上，于大运河边明明白白地标有4座以

“林”“树”为名的村庄，即运河左岸的“儒林”（原名儒家林）、“陈桁”（原名陈家桁）、“萧林”（原名萧家林）和右岸的“榆林庄”。前三村在今西集镇，后一村在今漷县镇。其中“榆林庄”初名也称“某家林”，因此处树林榆树为多，春夏时节是四周穷人够榆钱儿、捋榆叶儿用以充饥的救荒树，远近闻名，故久而久之渐改名为榆林庄了。“陈家桁”，初名也称作“陈家林”，因此处林密，树的主干长得直且匀称，是建房用作檩条的好材料，也是远近闻名，故渐渐改名为陈家桁了。

上述4个村庄，都是古代运河经常冲决堤岸之处，为护漕保运，明朝派官吏于易决口处附近植树造林，以备及时就近满足护岸堵口所用大批木材的需要，并加以防火防盗的管理，渐成一村落，就以负责造林和管理的官吏姓氏为名，称“某家林”。这村名是运河文化的产物和载体，充分见证了通州大运河段两岸还有片片人造树林的史实。

二、古代行政指令中关于通州段大运河两岸植树的记载

辽圣宗统和十五年（997）正月庚辰，“诏诸道劝民种树”^①。当时今通州区称潞县，属南京道幽都府，且处于陪都南京近郊，应该是实施种树诏令的先行者，但只是强调“劝民种树”，具有泛指

性。然而到了金世宗大定时，种树问题就有明确所指了，如授任户部员外郎的刘玘在上疏中就有河边植树建议，世宗览奏后便对宰臣说“玘言河堤种柳树可省每岁堤防之费”，“甚可取”，“卿等议其可者行之”^②，同是大定之时，国史编修官高霖建言：“河堤广树榆柳，数年之后，堤岸既固，埽村亦便，民力渐省。”^③朝廷从之。

延至元代，植树更有明确规定。“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④规定农户中的成年人每年要种活桑、枣树20棵，以便备荒和衣料。若土质不适宜栽桑、枣，就必须按数种活榆、柳树，如果栽其他果树，成年人每年也要栽活10棵，多栽自便。若是地方官员虚报数量情况，就要被治罪。如有盗伐他人林木者，“计赃科断”^⑤。这里规定的植树范围，当然包括通州运河段两畔。

河边植树已形成传统，至明清仍然继承之。清康熙十一年（1672），“开封府属阳武县之磴口寺工险事迫，无柳可用，将民间之桃、李、杏、梨等树进行砍伐堵塞，方保无虞”^⑥，故而接受严重教训，命“濒河种植柳树以备之”^⑦。雍正年间工部侍郎元孚宵上疏建议：“在林尾沟头，篱边屋角等隙地，可栽植桑、枣、梨、桃、杏、榆、柳、椿、杜等堪用树木，则地旷土，而利赖更溥矣。”^⑧

清曾任漕运总督的杨锡绂在《漕运则例纂》中载：“五闸运河，乾隆四年奏准，春初令庆丰等闸官于沿河堤岸率令闸夫种柳，以固堤根。”^⑨“五闸运河”指京通间支运河，则通州大运河段植树未曾提及，可见大运河两岸植树没有问题。

综上所述，说明通州大运河两畔，栽植树木已是优良传统，以保漕护岸而形成的树林景观在古代一直存在，不是现在才始有的运河景观。

三、古代诗句中的通州大运河段的林景

因通州在古代时，不管是人造林还是野生树林，数量都较多，故给诗人墨客留下很深印象，流传下来不少诗句。诸如，南宋诗人汪元量，被元兵所虏，而随宋官降人北来大都途径通州时，赋有《通州道中》一诗，诗中有“北枣红时树若涂”^⑩之句，将红枣挂满枝头的片片枣林的壮观景致，摆在读者眼前。

明代通州人、刑部尚书董方为家乡灤县写有《灤县八景》诗，其在《白河渔舟》一首中写白河（今北运河）“风帆暮急沙鸥起，波影晴涵野树稠”，句中“野树稠”十分清楚地表明在明代运河两岸自然生长的各种树木高大浓密，都映到运河水之中了。

明成化状元谢迁，以老辞归故乡余姚，从通州登船南还时，作有《晓发潞河作》七律一首，其中有“凋零霜叶挂林希”之句，表明在通州大运河段两岸有成片的枫树林。

明弘治进士、吏科给事中许天赐，于正德见奉使至安南（今越南）去封国王，于张家湾码头乘船南行时，赋成《晓发张家湾》七绝一首，其中有“两岸垂杨阴绿苔”之句，表明张家湾运河两岸垂柳成行。

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徐階游览通惠河时，写有《游通惠河》五律一首，其中有“竹密雨声多”^⑪之句，表明京通间之运河两岸，曾有竹林。

明万历进士、稽勋郎中表宏道，第三次从北京回家，从通州登船南还时，作有《过通州》五律一首，其中有“空杨瘦十围”^⑫之句，表明通州大运河段两岸明朝时，生长有主干空洞的粗壮老杨树之林。他还在《潞河舟中和小修别诗次韵》五律诗中，写有“长堤柿叶霜”“千树木奴乡”^⑬之句，“木奴”指果实，表明通州大运河段两条长堤上生长有许多柿子树，上面橙红色的柿子挂满枝头，颇为壮观。

明嘉靖进士、工部尚书吴鹏奉命督理漕河（运河）从通州乘船出发时，写成《潞河发舟》五律一首，其中有“烟笼堤柳密”之句，表明通州大运河段两岸柳树浓密。

清顺治进士、太子太师、户部尚书李蔚，出京途径通州，作有《潞河道中》五律一首，诗中有“故辙识桑田”句。表明通州大运河段两岸在清初尚有片片桑林。

有清一代，运河两岸依然密林成线连片。通州人、同治举人、画家李庆良在《长堤回燕》诗中描写畿燕在“长堤柳絮风”中穿行，“之穿白云去，又入绿烟中”。“长堤”指潞县运河右岸大堤，即北齐长城遗址，堤内的柳树茂密，有如“绿烟”。

清咸丰进士、通政司副使王维珍写有《通州八景》诗，其在《古塔凌云》一首中有“满径槐花感旧游”句，指出自天津至通州的大运河两岸的路上，种有许多槐树。

当然，描述通州大运河两岸林景的古诗还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仅此数首，就足以证明古代通州大运河段林木丰盛，树种繁多，景致非凡。

值得一提的是，通州大运河两岸自古就存在茂盛森林的情况，也可以得到出土文献的佐证。1983年夏，在今张家湾镇北部土桥砖厂取土坑内出土唐代贞元十四年（798）所葬潞县录事孙如玉的墓志铭。志文中在描述孙如玉墓地风水之好时说，东面有潞河（今北运河故道）通到渤海，西面有北齐长城像山一样高峻，南面有朱雀林和林边濒临潞河的戍所，北面有潞县城池（玄武垒）和潞县渡古关，即有“四灵”保佑^⑩。这表明在唐代，今张家湾的潞河两岸就有大片森林。

四、结语

以上，笔者列举说明了通州大运河段两岸的古代林木风貌，而通州万亩森林公园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秀美壮观的传统风貌，再现了大运河的优美景观，对大运河进行了有效保护。当下，合理地利用这种

历史风貌，改善了以往破坏运河生态景观的做法，在运河保护范围和可控制地带中，基本上没有乱搞开发建设，堪称保护和利用运河的典范，其范围内的大运河段实实在在应该列入大运河申遗点。

有人会说，通州大运河段河面被拓宽，改变了历史宽度。笔者另有看法。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朝鲜学者朴趾源随该国为高宗七十寿辰组团拜寿来访时，在《热河日记》中写道：“至河边，河广且清，舟楫之胜可敌长城之雄。”这是他在通州城东大运河东岸等待过浮桥时所看到的运河情景。1998年治理运河时，于河东岸、西岸分别发现沉船各一艘；2003年，在穿河管道时，于东关大桥西端迤南、滨河路西侧打肩井时，发现潞河驿石砌码头；2006年，在现在河东岸的20余米处出土硬合欢皇木一根；2010年，在玉带路大桥西端迤南距现河床10余米处打竖井时，发现一艘载有抛光花板石的沉船，这都表明古代通州大运河段河面很宽，现在的河面宽度还没有达到古代的程度。

① 《辽史》卷十三《圣宗本纪》。

② 《金史》卷九十七《刘玘传》。

③ 《金史》卷九十三《高霖传》。

④ 《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

⑤ 《元史》卷一百三《刑法志》。

⑥ 《东华录》卷一〇，中华书局，1980年，第161页。

⑦ 《东华录》卷一〇，中华书局，1980年，第178页。

⑧ （清）余金：《熙朝新语》卷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42-143页。

⑨ （清）董恂：《江北运程》卷一。

⑩⑪⑫⑬ 高建勋：《通州志》卷一〇《艺文·诗》，光绪九年（1883年）刻本。

⑭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日下访碑录》（通州、大兴、顺义），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第222-224页。

（作者为通州区文物管理所原所长）

“石景山”古遗迹考察报告

吕玮莎

本文是在拙作《历史文献中的“石景山”古迹》整理史料工作的基础上，于2012年5月至2015年5月间，经多次对石景山的人文古迹进行踏察后所作。在踏察期间所见的古迹可分为三种情况：已完成修缮的，正在修缮或未进行修缮的，新发现的。山上古迹的历史错综复杂，其中有些用途明确，而有些尚待查证。

石景山上的古迹依山而建，且多集中在山体南麓，据山上明代《重修净土寺添置田亩碑记》^①所记：“迩来是境尊崇佛道，敬信教法，修斯山灵，营及殿阁，辉煌宏丽……所以置田亩于兹，以为养瞻二家焚修之术……”可知，这里曾是佛、道两家传教之所，即僧道共存于山。从现存古迹的位置来看，与佛教有关的古迹多集中在山体南面的西侧，

呈北高南低的建筑格局；与道教相关的古迹多在山体南面的东侧，随山体走势由东南至西北，逐渐上升。

此外，山上还留有元代等不同时期的摩崖石刻及一些其他遗址（图一）。

一、有关佛教的古迹

佛教的古迹，从南向北、由低到高，依次为金阁寺山门、《重修净土寺添置田亩碑记》石碑一方、孔雀洞、5号无名洞、本来洞、金阁寺双眼古井、功勋阁（原金阁寺塔）、崖葬石窟等。

1. 金阁寺山门

山门坐北向南，建在0.9米高的石台基上，面阔5.41米，进深3.17米，高5.52米，砖石仿木结构，卷棚式单檐歇山顶，

灰筒瓦覆盖，叠涩砖檐，角梁前端雕有兽头，其下挂有铁环，原应安有风铃；门额字迹无存，下开拱券门，门洞高2.66米，宽2.05米，券脸石上无雕刻；山门内砌砖，高3.9米；门前石台阶无存，仅存台阶两侧的一对象眼石及前面的砚窝石；门前可见石头小路崎岖而下。

在山门东侧约0.9米处，有一埋于地下的青石排水孔，露出地面的部分高0.28米，宽0.47米。排水孔通常位于墙根下，说明此处



图一 石景山古遗迹平面标注图（底图来自google卫星图）

应有围墙（图二、图三）。

2. 明万历《重修净土寺添置田亩碑记》石碑

金阁寺山门之北约20米处，有一座仿古碑亭，亭中立一方明代石碑，碑额篆书“重修金阁寺添置碑记”9个字；碑身通高约2米，宽0.95米，厚0.21米，碑文清晰可辨，题为《重修净土寺添置田亩碑记》^②。

碑文主要讲述：明万历时，山上有位叫作真福的僧人，因遭遇饥荒，想变卖寺产去云游，恰巧遇到皇宫内府苏其民愿捐金25两，重修寺庙。真福在其感召之下，继续劝人捐款为善，后来在太监甄进、张

允中、李志义、董实等人的支持下，寺庙终于建成。碑文落款：“万历三十□年岁次□□□□□□肃水后学观光许用宾顿首撰篆并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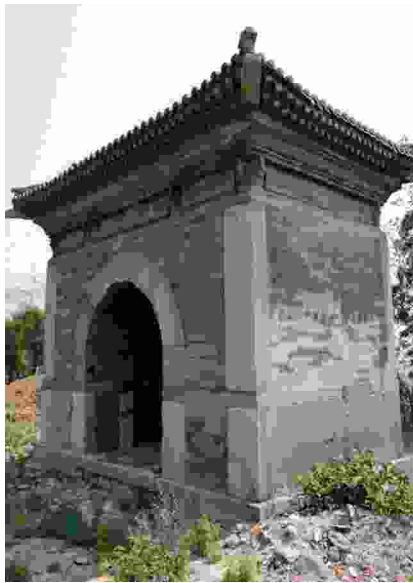
碑座高0.9米，宽1.24米，厚0.5米，图案保存完好，碑阳饰二龙戏珠，碑阴二仙鹤环绕“寿”字，碑侧为奔跑的神兽（图四～图七）。

3. 孔雀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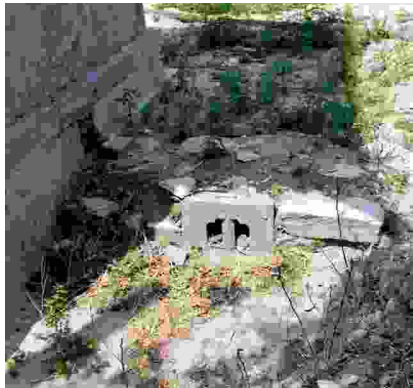
孔雀洞，位于碑亭之北约20多米处，坐北向南，修建年代不详，有上下两层：下层洞室前凸，为人工修建的方形石室——接引洞，上为露天平台；上层洞室在平台之北的崖体内（图八）。

1) 下层洞室

下层洞室坐落在1.25米高的石台基上，外由虎皮墙和方砖搭砌而成，面阔9.49米，进深6.4米，高5.09米；中辟一方形门洞，门洞高1.92米，宽1.12米；门上嵌石匾“孔雀洞”，匾上方两侧各雕一只瑞兽做张口状，实为排水口，其旁峭壁



图二 金阁寺山门



图三 金阁寺山门东侧的排水孔



图四 石碑座阳面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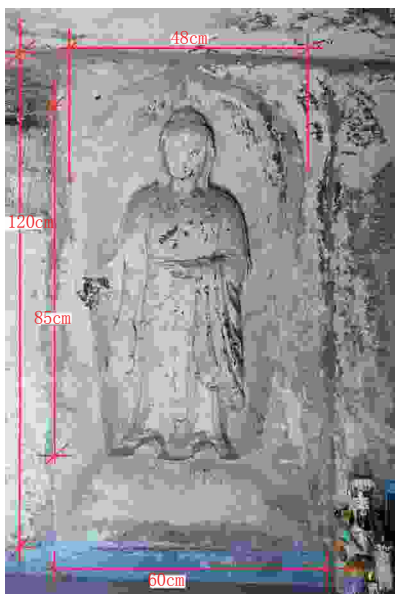
图五 石碑座阴面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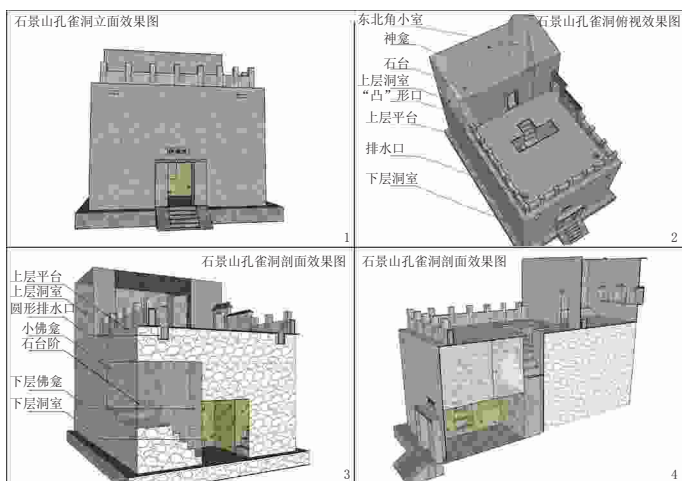
图六 石碑座右侧图案



图七 石碑座左侧图案



图九 孔雀洞内造像（邢鹏拍摄及测绘）



图八 石景山孔雀洞多角度效果图

上各长出一柏树。

洞室内面阔2.1米，进深1.95米，高2.44米，洞顶中央凿有内凹菱形天花板，四壁均已被灯油及燃香熏黑；北壁上凿有一佛龛，龛底距地面约0.89米；龛为壶门式，高1.2米，宽0.6米，内浮雕一立姿阿弥陀佛像，雕琢年代不详，造像通高0.85米，宽0.48米，螺发，肉髻呈圆形凸起，大耳垂肩，面部漫漶；身披袈裟，内着僧祇支；左臂屈肘，手置于腹部，五指并拢，手掌朝上，结禅定印，右手自然下伸，指端下垂，手掌向外，施与愿印；下着长裙，赤足站立于莲花座上（图九）。

在洞室内的东、西两侧各设转角石台阶，其两侧转角处北面的石壁上，约

距地面1.5米处，内嵌小石龛各一，均高0.37米，宽0.3米，进深0.12米，龛内已无神像；从龛旁的台阶而上，可达上层平台，其出口平面呈“凸”字形，长3米，宽2.55米，出口正对上层洞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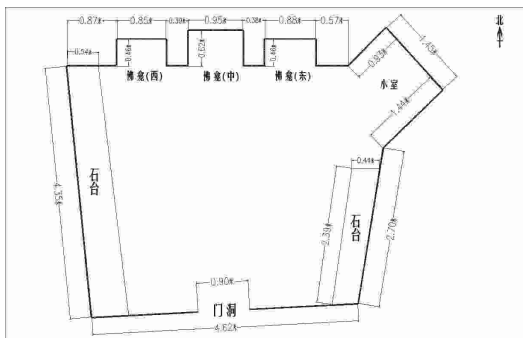
2) 上层洞室

上层露天平台面阔8.63米，进深9.01米，平台中部为凸形出口，其东南与西南两角处各有一圆形排水口，直径均为0.39米，此口应与外壁瑞兽相通，便于排水。

平台之北是上层洞室，弧形洞门，高1.84米，宽0.9米。洞室内可见人工雕琢痕迹，面阔4.62米，进深4.35米，高2.21米，东北角有一不规则小室，用途不详；洞顶及四壁已被灯油及燃香熏黑，顶部中央有一圆形雕刻物^⑧（图一〇），直径0.21米，中间内凹，形似元宝；北壁上并排开凿3座神龛，龛底距地面均约0.97米，龛作壶门式，其外雕有花卉纹饰，中间最高1.1米，两边均高0.95米，三龛内已无神像；东、西两壁砌有长条石台，东石台高0.45米，西石台高0.5米。石台是



图一〇 上层洞室顶的雕刻物（邢鹏拍摄）



图一一 上层洞室平面图（邢鹏测量，吕玮莎绘图）



图一二 本来洞（邢鹏拍摄）

否与神龛有关，其上是否曾放置过造像，以及3座神龛内曾置何种造像，均待考（图一一）。

4.5号无名洞（孔雀洞左上方）

在孔雀洞左上方的崖壁上，有一处人工开凿的石洞，洞名待考。洞门为弧形，高1.86米，宽0.74米；洞内呈方形，面阔3.76米，进深2.91米，高2.15米，四壁规整，有雕琢痕迹，无石龛或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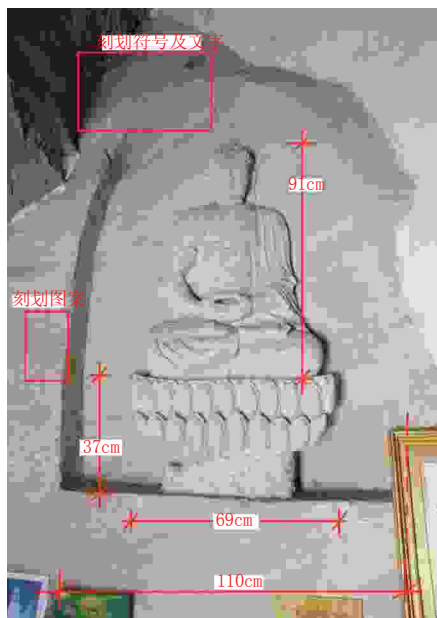
5. 本来洞

孔雀洞的东侧是本来洞，是于2004

年底至2007年间^④被发现及完成清理工作的。清理时，因洞门外有旧石额“本来洞”而知其名（图一二）。

本来洞，坐东向西，人工开凿，弧形洞门；洞门左侧开一方形石窗，边长0.52米，内嵌“方孔圆钱”样式石窗；洞室内面阔4.49米，进深2.55米，高4.19~4.21米；北壁砌长条石台；南壁有火炕和炉坑，其上东、西两侧相对开一方形石龛，均高0.41米，宽0.51米，龛内无神像；东壁凿有上圆下方形佛龛，龛底距地面约1.44米，龛高1.49米，宽1.1米，内浮雕一阿弥陀佛坐像，雕刻年代不详。造像高0.91米，螺发，肉髻微微凸起，肉髻正中饰宝珠，圆脸，细眼弯眉，高鼻阔口，长耳；身披袈裟，袒右肩，袈裟衣角反搭在右肩上，内着僧祇支，露内衣结带，胸前正中刻“卍”纹，双手于腹前，左手置右手之上，结弥陀定印；下着长裙，结跏趺坐于束腰双层仰莲座上，莲座通高0.37米，宽0.69米（图一三）。

此外，洞内还有3处摩崖石刻：一处是在洞顶偏北侧南向的石面上，自西向东横向刻有佛像、人、动物（鱼、老鼠）等7个图案，最东面的两个图案之间，竖刻



图一三 本来洞内造像（邢鹏拍摄及测绘）

“山神土地之”5个字，其西拐角东向的石面上，刻有一朵莲花。这些图案和文字都是单线阴刻法，技艺极简，应是同一时期所刻（图一四）；另一处在东壁佛龕外的右上方（北），从左到右（北向南）刻有3个神位牌和1个似香炉的图案，第一个神位牌下竖刻“神”^⑤等文字，也都是单线阴刻法；第三处在佛龕外右面（北）中下部，阴刻一似“X”形的符号。这3处图案的寓意，有待考证。

6. 金阁寺双眼古井

金阁寺双眼古井，也称“石景山双眼古井”，2004年12月被发现，当时被土石掩埋在废墟之下。

古井在本来洞前约3米处，开凿年代不可考，但井台和井壁保存完好，井内已无水，井口为双眼，南北向，直径均0.27米，属滑车井，井四周的青石栏杆为新建。2007年，考古人员曾对该井进行实探，在井底发现一块明代人工雕刻的石栏杆柱头^⑥。

7. 首钢功勋阁（原金阁寺塔）

如今，石景山上最高的建筑是首钢于

1993年在“金阁寺塔”原址上重新建造的功勋阁^⑦，也是石景山的地标性建筑。

功勋阁，坐落在三层高的四方座上，阁为三层，八角攒尖顶，钢筋混凝土结构，其前左右两侧各建一亭，其后为“U”形环廊。功勋阁的建筑形式与颐和园佛香阁颇为相似（图一五）。

8. 崖葬石窟

崖葬是在崖穴或崖壁上安葬遗体的一种葬俗，也是风葬的一种，包括悬棺葬和崖洞葬。石景山上的崖葬石窟，应属崖洞葬，位于山体西侧，目前已发现5个石窟，均为人工开凿，但因山体陡峭，树柏丛生，又未找到可行的山路，故笔者未能实地考察。据前人考察，“崖（壁）的右下方，有一残塔基，有石刻构件尚存。据此推测，这里原有一塔，可惜已难审其规模了”^⑧。这座塔是否就是当年周肇祥所看到的“石经山净土寺，开山宝光智禅师塔”^⑨呢，今亦不可考。

二、有关道教的古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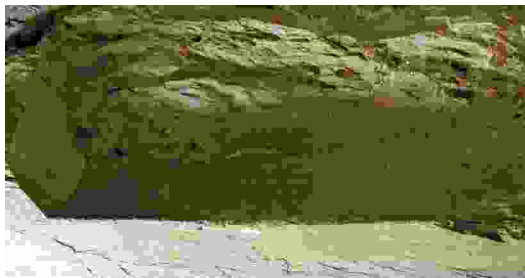
道教的古迹，从东南向西北，依山体走势，逐渐上升，笔者将其分为3个区域介绍，一层碧霞元君庙区，二层玉皇神祠区，三层天主宫区。

1. 碧霞元君庙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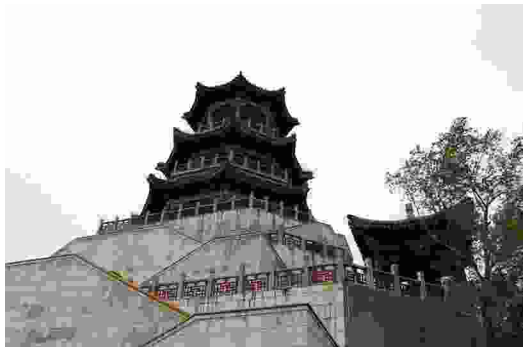
该区东至东天门，西至元君殿，据其建筑的中轴线可分为东、西两路建筑群，从南至北分别是：东路轴线上碧霞元君庙、天空寺，殿宇均南向；西路轴线上戏楼（北向）、元君殿（南向）等。殿宇建筑多为1985年以后修复。

1) 东天门

在石景山东侧古道的山腰上，有座形似过街楼的建筑——东天门，其坐西向东，修建年代不详，坐落在1.2米高的石台基上，面阔6.69米，进深4.75米，高6.85米，砖石结构，虎皮石墙。上层为殿宇式建筑，硬山元宝脊，灰瓦覆盖，面阔三间，木窗从槛墙上直抵屋檐下，北山墙



图一四 本来洞内的一处摩崖



图一五 功勋阁塔（图右为塔前东侧亭子）

偏东侧开一木门^⑥（封闭），南山墙正中开一木窗；下层为城台式建筑，中开拱券门，高2.7米，宽1.86米，洞上嵌石匾，两侧嵌楹联式石刻，上承莲花，下托荷花和草纹，中间下洼，字迹无存；洞内砖券顶，高4.18米，面阔2.18米，门内上方仍有连楹木，下存门枕石（图一六）。

其门内北侧墙壁的一块青石，上刻有6行共16个小字：“六十九/二达子/求明/皂王保/求禄/七十五。”（图一七）

小字总长0.16米，高0.06米，字体虽小，但很工整，分六竖行书写，从内容“求明、求禄”看，可能是香客到此祈福的良愿。

2) 石景山古井

东天门外东北约20米处路西，有一口古井，井台与地面持平，井口为双眼，南北并向，直径均0.25米，属滑车井。据“寺僧传说，该井有300年以上的历史，为一施主出资开凿，井水青绿，水质甘冽”^⑦。



图一六 东天门（东向西拍摄）



图一七 东天门内的题记

现井内已无水，透过光线可见井壁上的绿苔（疑为雨水所致）。古井的开凿年代不可考，1983年，首钢绿化公司修路时发现形迹，1986年发掘。现为保护井口，其四周已围起铁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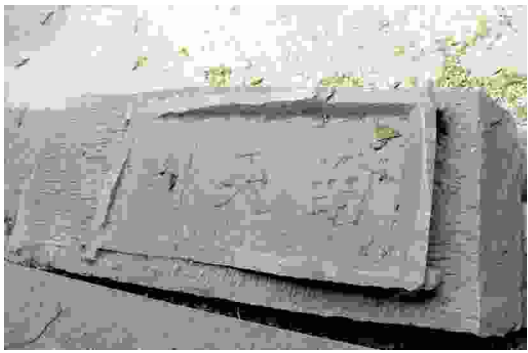
3) 碧霞元君庙

东天门内向西约40米处是碧霞元君庙，南向，一进院落。院门石额上嵌今人手书“碧霞元君庙”，院内正殿3间，硬山顶，灰筒瓦，正脊、垂脊有瑞兽；东、西配殿各3间，其北各接庑房两间，均为卷棚顶，灰筒瓦；院内东北角为一株银杏，西南角有古槐一株。

此外，东厢房前还堆有一些散落的石刻、石雕等，如“南天门”石额（图一八），长0.9米，宽0.43米；碑座长0.84米，宽0.67米，上雕一只在山林中的猛兽（图一九）；等等。

4) 天空寺

碧霞元君庙正殿后面搭砌有“人”字形石台阶，拾级而上，即天空寺，该地现



图一八 “南天门”石额



图一九 碧霞元君庙东厢房前的碑座

为办公区及施工人员的临时住所。

该寺亦南向，方形山门，山门高2.24米，宽3.05米，门额墨书“天空寺”；二进院落，前院正殿3间，硬山顶，灰筒瓦，正脊、垂脊有瑞兽；东、西配殿各1间，其北各接庖房两间，均为卷棚顶，灰筒瓦；院内东侧种一株古槐树。后院是7间后罩房，卷棚顶，“后殿三间，其左右有正客堂各两间。前后两殿之间，有东西两道隔墙，中间开月亮门”^⑫。今隔墙、月亮门无存，后院西侧院墙开一小门，门外为元君殿。

5) 元君殿及四方石碑

天空寺之西是元君殿，也称娘娘殿，坐北向南，面阔5间，进深3间，硬山顶，灰筒瓦；前出月台，长9.33米，宽6.43米，高1.33米，其东、西、南三侧各设7层石台阶。原殿内供奉“五尊神像，中为碧霞元君，右侧为送子、催生娘娘，左侧为天花、眼光娘娘”^⑬。这些神像，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传宗接代、防治天花及明目等的愿望，恰与东天门内题记内容对应。

月台南侧台阶左、右各立一方形制大小相似的石碑，均高1.67米，宽0.72米，厚0.22米，碑座均高0.76米，宽1米，厚0.40米；碑身大部已剥蚀，文字难辨，碑座图案均保存完好。东石碑是清乾隆年间《重修石景山大殿碑记》^⑭，碑额阳、阴均楷书，为“万古流芳”“聿修厥德”；碑座阳面图案为“二龙戏珠”，阴面雕有一匹飞马，碑侧各雕一头牛。西石碑碑额阳、阴均楷书，为“永垂不朽”“公建于后”；碑座阳面图案为“二龙戏珠”，阴面、碑侧均刻卷草纹。这两方石碑应为同一时期所立，且与修建殿宇有关，内容应为歌功颂德，功德主则多是住在附近的商户、善男信女等，如东石碑（阴）刻有：商户有杨家庄村的、天源店的等，善人为王臣、郭威、魏亮、王天海等。

在这两方石碑之南，即元君殿前的甬道两侧，还立有两方形制不同的清代石碑。东石碑高2.35米，宽0.75米，厚0.23

米，碑身脱落严重，依稀可见“清光绪”字样；碑座高0.57米，宽1.07米，厚0.52米，团龙图案保存完好。西石碑高0.62米，宽1.05米，被嵌在一座形似独立影壁的建筑内；碑身字迹工整可辨，竖行书写两首诗文^⑮。第一首字号稍大，分8行，落款字号稍小，分两行写“同治辛未秋九月登石景山/贵池桂本誠题”，同治辛未，即清同治十年(1871)；第二首诗字号小于第一首正文，可能因空间不足，只得紧凑书写，为4行半诗句，落款“光绪壬辰秋季/同邑方汝霖和韵并书丹”。光绪壬辰，即清光绪十八年(1892)。两首诗均无题目，从内容看均是游石景山的抒情感受；两首诗虽相差21年，但不约而同都记录了秋季登山，也可能与重阳节登高的习俗有关。

6) 戏台

元君殿前30多米处是一座方形简易戏台，长10.47米，宽9.94米，高1.02米。戏台北向，与元君殿相对，南有矮墙，其下为悬崖。在戏台东南、西南两处各设石台阶可登台。庙前的戏台多是为敬神、娱神而建，这座戏台应也不例外。

旧时，为庆祝碧霞元君生日——农历四月十八，山上都要举办庙会，即石景山庙会。从农历四月十五前后，山上就开始有各种戏曲表演，小商贩们也出售各种吃食、农具、玩具等日常用品。那时，四面八方的香客、附近的百姓都会来逛庙会，朝拜娘娘，求子求福，堪称京西一大庙会。

2. “玉皇神祠”遗址区

元君殿建筑之北有一块长方形区域（图一绿色框），因年久失修，房屋等早已坍塌，只可见地基、柱础、台阶及一些石料等，该区的后面是一条甬道，可直达三层天主宫区。

这块区域“面积约有1000平方米，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约20米，并排有三座一进院道教庙宇遗址……三清观，有居中的正殿和一东一西的配殿古建筑遗址……

殿宇的基础石料比比皆是，而御路石（该地出土，笔者注）的南面有山门残迹，北面则有三座神台的遗迹……基址上出土过青牛石。疑为唐代玉皇殿原址，供奉玉皇大帝，明代改为供奉三清，故暂名玉皇神祠遗址。三清观西侧为吕祖庙遗址。正殿为八仙殿，现存与正殿等长的佛台……东配殿基址尚存，西侧为还源洞。三清观东侧为药王庙遗址……正殿居中，坐北朝南，东西配殿环护”^⑥。

据上所述，2012年时，该区域内除已修复完的还源洞外，还复建了3座一进院庙宇的主殿，依次为八仙殿、三清殿、药王殿，主殿均坐北向南，面阔3间，进深1间；硬山顶，灰筒瓦。后来，又复建以三清殿为主殿的山门及院墙，定名“老君堂”，其内的东、西配殿分别定名三星殿和真武殿；2015年5月时，正在复建以药王殿、八仙殿为主殿的两座院落，其内的东、西配殿均已基本复建完成，正在修建山门、院墙等。

此外，还源洞之上建有十二生肖殿，再上建有元辰殿，其整体样式很像三层殿宇。这两座大殿，均南向，面阔3间，进深1间；硬山顶，灰筒瓦，都应在2012年之前修建。

1) 还源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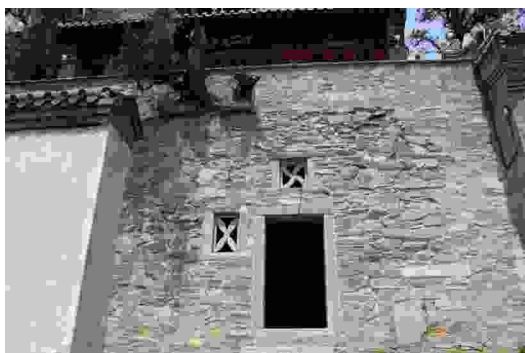
还源洞在该区最西，原已坍塌。在“修缮中，除发现还源洞的残额外，室内还清理出泉池一泓，恰与《还源篇》所记‘金丹之要’，在于神水华池，相符合”^⑦。

该洞坐北向南，洞前西侧有一座挡墙，洞门外左侧立一新修小碑，其上竖刻“还源洞/出土并修复于二〇〇三年九月”；洞门为后修复，其正上方与右侧各开一石窗，窗饰“X”形（图二〇）；洞内面阔约2米，进深约4米，高约3米，弧形顶，且洞顶及东、西壁被用白灰抹平，其东、西二壁上相对开有方形石龕，边长及进深均0.7米左右；北壁和地面为山石，有人工开凿痕迹，北壁较平整，偏下

方有一石刻，似神或人像；地面凹凸不平，中间下凹一长方形，长约0.8米，宽约0.4米，高约0.6米，其北边似人工开凿的引水槽，槽宽约0.2米（图二一）。

2) 4号无名洞（还源洞下方）

还源洞下方有一无名洞，南向，洞口开在面阔约15米的虎皮墙上，西立面是本来洞。无名洞前有石台阶可至上层，洞门高约1.8米，宽约1米，洞内较窄，山石阻路，不可进入，西壁有人工开凿痕迹。



图二〇 还源洞（2012年拍摄）



图二一 还源洞内（邢鹏拍摄）

此洞与西侧孔雀洞格局颇为相似，同为下层前凸，上层是平台和洞门。远外观之，笔者发现它和孔雀洞的整体布局呈倒“凹”字形，中有金阁寺双眼井，两洞似乎是对称的，但该洞是否与孔雀洞为一体，又或是与本来洞相通，有待考证（图二二）。

3) 石景山东侧石洞

在该区最东边的山体崖壁上，有5座石洞，分上下两层，上两下三，均东向。从石洞开凿的位置看，①、②号洞并排；③号与④、⑤号洞呈倒“品”字，貌似一体（图二三）。

这5座石洞现已修复，其中①、②、③号被施工人员使用，又因①、②、⑤号洞门被锁，故笔者只对③、④号洞进行考察。

③号洞门呈弧形，洞内似窑洞，西壁有石台，南、北壁开形状不一的小石龛，可能是古人放置油灯用的；洞前有约1米宽的小路，下为悬崖；其北被石土、垃圾

覆盖。

④号方形洞门（后修复），高1.98米，宽0.75米，上开一方形透气窗，洞内呈弧形，似窑洞，四壁规整，面阔2.49米，进深3.42米，高3.22米；南、西壁上各开一方形石龛，边长均为0.59米，进深0.65米，高0.68米；该洞形制与还源洞相似。

这些石洞的建造年代、修建者均不详，且石洞位置偏僻，不易被发现。这是古人的修炼之所，还是躲避战乱的藏身之处，或是采石工匠的临时住所，再或与山体西侧的崖葬石窟有无关系，均待考。

4) 7号无名洞与井

该洞在通往天主宫区甬道的北侧崖壁上，其西南为元辰殿。无名洞外观呈门状，南向，高约2.5米，宽约1.5米，门额字迹无存，其下开小券洞，高约1米，宽约0.6米，洞内山石堆积，有人工雕琢痕迹，不可入。洞前有一口井，井口直径约0.3米，测得井深约20米。

3. 天主宫区

从二层玉皇神祠区之北的甬道向西就是三层的天主宫区（图一蓝色框），主要建筑有昊天门、西山门、玉皇殿等。

1) 昊天门

昊天门，坐西向东，原洞门顶部已坍塌，仅剩南、北两山墙，因曾在此发现“昊天门”石额而知其名，2014年时已复建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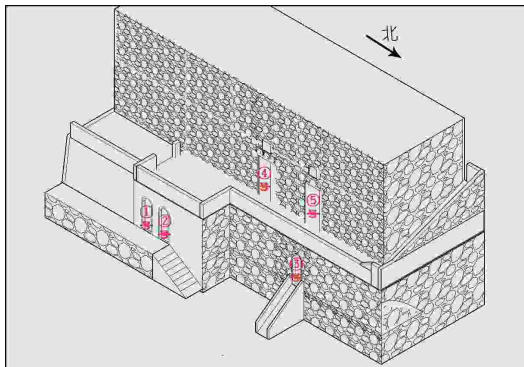
复建后的昊天门，面阔5.39米，进深5.44米，其建筑形制与东天门相同，上为殿宇式，面阔3间，硬山元宝脊，灰瓦覆盖；下为城台式，中开一券门，门高2.63米，宽2米；门内地面靠南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排水槽，槽宽0.07米，水槽向西至天主宫门前消失，东延至昊天门外（图二四、图二五）。

2) 西山门

西山门，与昊天门相对而建，坐东向西，因西面为悬崖，洞门暂用石块封闭。原只剩城台，且城台东立面已坍塌，露出洞内



图二二 孔雀洞与4号无名洞的位置
(红框内，2014年拍摄)



图二三 石景山东侧石洞立体图



图二四 修复前的昊天门（2012年拍摄）



图二五 修复后的昊天门（2014年拍摄）

方形条石，其上可见断痕，故用木柱支撑。按其位置推测该门原应可通崖葬石窟。

2014年已复建完成的西天门，其形制比昊天门小，其下城台券洞高1.93米，宽1.37米；上建一卷棚顶方亭（图二六、图二七）。

3) 天主宫

天主宫，坐北向南，一进院落，院内除一方明代《重修石景山天主宫碑记》石碑外，其余建筑无存，仅剩遗址。

2007年时复建主殿——玉皇殿，面阔



图二六 修复前的西天门（2012年拍摄）



图二七 修复后的西天门（2015年拍摄）



图二八 天主宫门外东侧的夹杆石（2012年拍摄）

3间，进深1间，硬山顶，黄琉璃瓦，内供玉皇大帝神像。2012年时，其东、西配殿仅有基址，从其上柱础看也是面阔3间，进深1间，此外东配殿基址上还散落着几块金砖及其碎片。2014年时，山门、院墙及东、西配殿均已复建完成，两配殿分别被定名为三官殿、财神殿。

在天主宫外墙东侧，有一残缺不全的夹杆石，坐落在1.3米高的石台上，高0.79米，宽0.63米，其上应安置木旗杆（图二八）。

4) 明万历《重修石景山天主宫碑记》石碑一方

该碑立在玉皇殿前左侧（东），通高约3米，碑额篆书“重建石景山天主宫记”9个字，碑文部分已损，但残存的部分仍清晰可辨，亦是明代许用宾所撰写。

碑文主要讲述重修天主宫的过程：“自唐武德初，建有玉皇殿，岁久倾圮……适内府善贤交游兹址，观其古迹，心想重建此殿宇……重建天主宫三间，两配殿，两道房。甲寅岁修葺，乙卯岁告成。”^⑧可知，玉皇殿在唐武德年间（618—626）就已建成，后因年久失修坍塌，到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重修，一年后建成。

三、摩崖石刻

石景山现存的摩崖石刻，多集中在“本来洞与孔雀洞”附近，上文已对东天门和本来洞内的题记等做了介绍，余下还有：

1. 元代石匠题记

在本来洞外的崖壁上（西向），有多处题记、图案，最北边的文字难以分辨，最南边的图案是“一只狮子蹲坐在须弥座上”，其下是本来洞洞门，这可能与洞内的图案有某种联系。在这两处题记中间，还有四则题记。这四则题记的字号大小、字口深浅、边框装饰都不同，按其位置，由北向南依次编号为①至④号（图二九）。从图上看，①号题记刻有边框，虽没有年代，但从内



图二九 元代石匠题记

容及位置来看，应与其他三则题记为同一时期；②号题记无边框，落款年代“至元”；③与④号题记都刻有相同的边框，落款年代也是“至元”，但④号题记的字号最大，且为双钩书写，较为特殊。

此外，四则题记的内容在《北京地区摩崖石刻》^⑨和《石景山文物（第五辑）》^⑩两书中也有介绍，但略有不同，笔者将考察时所见与两书所记列于下表：

由表上来看，这四则题记对应现在的地点应为：①号“齐口路”待考；②号

元代石匠题记内容一览表

笔者的考察						《北京地区摩崖石刻》	《石景山文物（第五辑）》
题记方向	题记编号	题记外框及其他装饰	文字方向	文字行数	笔者所见文字		
北 南	①	单线边框，上部呈弧形，内刻火焰纹图案	竖刻	二	名齐到□此路造石□□	齐中路石匠三名到此造	济南路石匠三名到此造
	②	无边框	竖刻	三	年三南伍名京月至路廿元石六□匠日	南京中路石匠三名至元卅年伍月廿六日	南京路石匠三名至元卅年四月二十六日
	③	方形双边框，框外云水纹装饰	竖刻	五	四至二河丁月元十南□八三四府日年名石记□匠耳	河南府石匠二十四名至元三年四月八日记耳	河南府石匠二十四名至元三年四月八日记耳
	④	方形双边框，框外云水纹装饰	竖刻	三	□石汾□匠州□年	汾州石匠至元三年	汾州石匠至二年

“南京路”，今河南开封汴梁；③号“河南府”，今河南洛阳；④号“汾州”，今山西汾州。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题记中的“至元”应为元代年号，但该年号在元代中曾被使用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元世祖时期（1264—1294），另一次是在元惠宗时期（1335—1340）。依据明《北平考》载：“至元三年十二月，建大安阁于上都。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④可知此时因元代修建宫城，统治者出于引水灌溉、运西山木石等目的，决定重开金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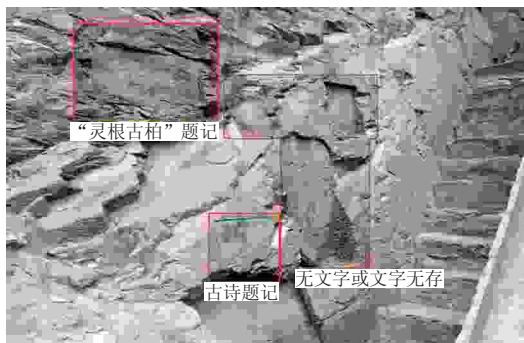
《元史》中记载了郭守敬所言关于重开金口之事：“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视古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⑤由于郭守敬生活在元代初年，故推定题记中的“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所用的“前至元”年号，而这些题记也恰恰印证了这段历史，也许元代的石匠只是信手而书，但却为后人留下了元代在北京地区采石的宝贵文字资料。

2. “灵根古柏”及古柏诗句等题记

在5号洞左下方的崖壁上，有5处被人工磨平的痕迹，其中两处有文字，另3处只有边框或仅有开凿的痕迹（图三〇）。

1) “灵根古柏”与“古柏”诗文的题记

明《枣林杂俎》载：“石经山石壁



图三〇 崖壁上的题记

古柏一，长尺有咫，根无寸土。万历初，上过之，御书‘灵根古柏’。”^⑥明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明神宗朱翊钧于“甲子，幸石景山观浑河”^⑦。由文献来看，这很可能是神宗御书。题记外框高0.20米，宽0.55米，右书“灵根古柏”，四字均高0.14米，宽0.12米，楷体，无款。

在这则题记之下约0.54米处，可见一首有关“古柏”诗文的题记，残存部分高0.16米，宽0.34米。题记所刻年代不详，分8行竖刻，无落款，文字风化严重，诗意^⑧难辨：

古柏□□□行/宫遗树□□□/
不植□□□/□□□□□□/不
□□□□□□/□□□□□□/灵根古□/君
王□□

这两则题记都与古柏有关，观其周围虽有柏树从崖壁中长出，但文献中的那株，难以考证。

2) 其他

在古诗题记东侧约0.23米处，有一圆首碑形框，高0.7米，宽0.44米，其上左角可见方形开凿痕迹，右角刻有方形边框，两处均为0.3米左右，这3处都无文字或文字无存。

四、其他遗址

在元君殿之西，孔雀洞之南的一片区域内发现有残墙、排水孔、排水沟、地基、石甬道等遗迹。2012年时，这部分遗迹大多被土堆掩盖，西侧还建有房屋等；2014年时，土堆和房屋被清理、拆除，其地面才露出这些遗址（图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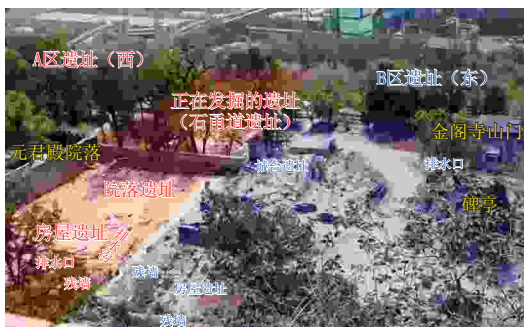
笔者以该区内的两道残墙为界，分为“A区遗址”（西侧，红色所示）、“B区遗址”（东侧，蓝色所示）来介绍（图三二）：

1. A区遗址（西）

该区遗址北为还原洞，西是元君殿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石甬道、院落、房屋、排水沟、排水孔、残墙等遗址。



图三一 元君殿西、孔雀洞南的遗迹（2014年5月拍摄，南向北）



图三二 遗址分区图



图三三 排水沟（A区内，2014年拍摄）

石甬道遗址（调查时正在发掘），在金阁寺山门之东约30米处，现已清理出一条南北向的石甬道，长约4米，宽约2米。其北与房屋、院落等遗址相对，其南虽为山崖，但不远处可见一条小路蜿蜒而下。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山门或楼宇一类的遗址。

石甬道之北为院落遗址，院内用石块铺成，其北为房屋遗址，南或北向，面阔3间，进深1间；其西为残墙，南北向，北面略向西拐，呈“└”形；在房屋遗址与残墙之间，有一段排水沟（图三三），其与该残墙上的西向排水孔（图三四）相通，一部分排水沟应为露天下凹式，且有可能绕经房基下。

2. B区遗址（东）

该区遗址在孔雀洞之南，金阁寺山门之北，东为一段南北向残墙与A区隔开，残墙内偏北为一西向房屋遗址，仅见东、北山墙遗址；该房屋遗址之南，有一座很像过街楼的建筑，其上有房屋遗址，下为城台（图三五），其西立面开一券洞，洞高近2米，宽约1米；东立面被山石垒砌，现洞内堆积杂物。城台北侧为山石，南侧有人为拆毁痕迹；与它相隔不到一米处建有“┐”形建筑，西向，靠南侧垛子下有一块方砖，又因其基座与城台遗址相连，疑为一组建筑，或围墙等，用途不详（图三六）。

3. 围墙遗址

从上述A、B两区遗址看，山上应为两座独立的院落，各有其山门、围墙等，但



图三四 西向排水孔（A区内，2014年拍摄）



图三五 B区“城台遗址”(西向东)



图三六 B区“U”形建筑

今围墙已无存。笔者根据山门、残墙遗迹等，推测出围墙的大致位置。

一处是从东天门到A区遗址，其内多为道教古迹。围墙也由东天门南、北两侧而起，北侧围墙很可能因修路被拆除；南侧因受地形所限（南为悬崖），故其围墙顺东天门南山墙向西延，经戏台至石甬道遗址（A区内），再向北与另一处围墙（下述）相连接。使A区与其西的碧霞元君庙区、其北的玉皇神祠区划规为一组院落，并与元君殿、戏台、三清殿等共为中线，东为碧霞元君庙、天空寺、药王殿等，西为A区遗址、还源洞、八仙殿等，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院落的东、西两侧，各有一甬道可直通到玉皇神祠区。

另外一处是金阁寺山门到遗址B区，其内多为佛教古迹。围墙北起本来洞，向南至城台遗址（B区）之南后，再向西折与金阁寺山门相连，成为一独立院落。由此看，城台遗址很可能是这两座院落之间的通道。

五、待继续查证与研究的问题

石景山上古迹很多，可追溯至唐代，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古迹或踪迹难寻，或缺乏明确记载。大部分古迹仍需要继续研究和论证，如山上四天门^⑥、回香殿及其明碑、普安洞、普观洞^⑦、三元殿、三皇庙、圣母祠^⑧、净土寺钟鼓楼^⑨、开山宝光智禅师塔^⑩等遗址的位置问题等。至今一些专家学者对山上“孔雀洞”的开凿年代、石经的具体位置的判定，也存在一定的争议，都需进一步加以说明。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调查了石景山现存的和修复、复建的主要古迹，以及正在清理和未知的遗迹，根据古迹的位置推测出围墙的大致范围，使读者对石景山上的古迹有一个整体印象，且了解古迹的位置及现状。

①② 碑文参见《净土寺置田碑》，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9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1-32页。

③ 笔者认为，该物可能是用于人们在敬佛时挂燃油灯。

④ 本来洞发现的时间说法不一，《石景山文物》（第四辑）第9页“2005年初发现”，《石景山文物》（第五辑）中第174页“2007年发现”，第348页“2004年发现”。

⑤ 陈康：《唐代石景山刘总刻经考》：“（本来洞）此洞无载，洞中有一尊明代的造像，但近日笔者（陈康）与吴梦麟先生发现在本来洞佛龕的上方有一段被明代人开凿时破坏的题记，题记上有‘神□□年’的年款，历史上北魏有孝明帝神龟（518—520年）、唐代有武则天神功（697年）、中宗神龙（705—707年）的年号。说明石景山上很可能在唐以前就凿有石室。”引自《北京文博》2008年第3期。

⑥ 据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2008年8月27日)——“石景山铁色记忆·龙烟”(纪录片)内容介绍:“2007年,考古人员对该井进行实探,在井底发现一块明代人工雕刻的石栏杆柱头。古井应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泥土已将它掩埋大半,测量深度为27米,推断最初应有70多米深,且井水的高度应与永定河水持平;另外,在接近井口的井壁上,发现一块人工雕琢痕迹的石头,因该石头与四周的井壁都不同,显然是人为镶嵌的,但其下面是否还隐藏着什么秘密,不得而知。”

⑦ 北京市石景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市石景山区志》,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782页。

⑧ 《石景山——石室》,引自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石景山》编委会:《石景山——燕都第一仙山》(内部资料),2005年12月,第63页。

⑨⑩ 周肇祥著,赵珩、海波点校:《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⑪ 该木门外没有台阶,笔者认为东天门北侧应有围墙和台阶,可能因修路将其拆掉,台阶也就消失了。

⑫ 高洪雁等:《石景山文物》(第五辑),2012年(内部资料),第176页。

⑬⑭ 《石景山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石景山区地名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316页。

⑮ 碑文拓片由国家图书馆收藏,名为《娘娘殿碑》,索书号:北京10276。

⑯ 碑文参见《登石景山倡和诗》,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7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⑰ 高洪雁等:《石景山文物》(第五辑),2012年,第183-185页。

⑱ 关续文、李新乐:《石泰到过石景山吗?》,引自《石景山文史资料》(第十二辑),2005年(内部发行),第124页。

⑲ 碑文参见《天主宫碑》,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9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

⑳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

㉑ 高洪雁等:《石景山文物》(第五辑),2012年,第349-350页。

㉒ (明)佚名:《北平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2页。

㉓ 《元史》卷一百六十四《郭守敬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846-3847页。

㉔ (明)谈迁:《枣林杂俎》,中华书局,2006年,第427页。

㉕ (明)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第4587页。

㉖ 关续文曾对诗文进行考证,他认为其大意为:“一棵古柏,依抚在□□宫旁。该树系战国时期艳(燕)昭王培植,此树树冠低垂,干歪斜,枝叶繁茂而苍青,覆盖在石景岩南隅。圣驾驻蹕看了君王(指燕昭王)植的这棵树灵树,信笔留此刻石。”引自关续文:《解读石景山上一方摩崖刻石》,《北京文物报》1998年第10期。

㉗ 清词《菩萨蛮·登石景山天空寺望浑河》中有:“浑河东岸孤峰起,崔巍绝顶浮图峙。陡辟四天门,天空祇树园”的词白。卢兴基:《顾太清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5年,第335页。

㉘ (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726页:“金阁寺今无其名,惟玉皇殿及回香殿明碑各一,皆许用宾撰,勒万历天启年月。山有石经台、普观洞、普安洞、孔雀洞诸胜……”

㉙ (清)张永铨:《石景山记》,引自《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2册《闲存堂文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24页。

㉚ 高洪雁等:《石景山文物》(第五辑),2012年,第385-390页:“净土寺铁钟,藏于八大处六处香界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铸造,捐资者有宫中娘娘、嫔妃、公主、皇太子、太监、锦衣卫、信士信女及寺内僧众等。其铭文载:‘……兹因内府太监聂顺愿舍古刹净土一寺缺少钟鼓楼今乾清宫延侍御官前弩马肆子御马监太监宋稳等持发诚心欲兴修击烛力擎成供奉……’”

(作者为北京奥运博物馆助理馆员)

北京海淀区明代西禅寺碑考证

张文大

一、《敕赐西禅寺碑》残石的重新发现

10多年前，笔者游海淀区四季青小屯村西禅寺，见寺内孤零零立着一通汉白玉石碑，为明正德八年（1513）《西禅寺敕谕碑》（以下简称敕谕碑），不免心生疑窦，有敕谕碑怎么没有建寺碑呢？后来，笔者发现《日下旧闻考》有记，西禅寺明碑二：一为敕谕碑，一为大学士湘源蒋冕撰，皆正德戊寅年立，证实西禅寺曾经有《西禅寺敕谕碑》和《敕赐西禅寺碑》两通石碑^①。按《日下旧闻考》的说法，两碑都是戊寅年立。戊寅即正德十三年（1518）。敕谕碑风化严重，字迹漫漶，但末行“大明正德八年九月十九日”的字迹非常清晰。正德八年是癸酉，不是戊寅，可见《日下旧闻考》记载敕谕碑的年代有误。寺中的敕赐碑为何不见了昵？

1989年出版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记：西禅寺在海淀区四季青乡小屯村东，明正德八年建。原名褒贤寺，为明正德年间太监秦安的祠堂。……今仅存敕谕碑。……寺前原有石虎一对，“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毁^②。《北京名胜古迹辞典》没有提及蒋冕所撰碑文，成书时碑肯定不在了，推测该碑在“文化大革命”中和石虎遭遇相同，被毁掉了。

今年初，山友刘玉河告诉我，他家附近有一块残碑，没有记载年月。近日春暖花开，便约老刘带我去看。他家住玉泉山下北坞嘉园西里，出西里走到北旱河路东的玉泉168大门内，门南侧有一块残碑和一个毁坏严重的碑座（图一）。残碑汉白玉石质，宽110厘米，高100厘米，厚23厘米，是碑身的下半部（图二）。残碑顶部有不规则断碴，底部残存插入碑座的凸榫，两侧基本保存



图一 《敕赐西禅寺碑》残件及一残碑座



图二 《敕赐西禅寺碑》残件

原貌。从碑面中心到右上角，有一道机械损伤痕迹，损毁了八九个字，其余字迹清晰，保存约232个字。首行存“湘源蒋冕撰”5个字，文中有“翠岩”和记述殿宇規制语句，可知是否某寺记碑。翠岩寺在西山万安山，明朝正德三年（1508）太监秦文建。小屯西禅寺也是秦文建，残碑会不会是西禅寺的敕赐碑？带着疑虑笔者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碑帖拓片，果不其然，北坞嘉园残碑文字和《敕赐西禅寺碑》拓片底部文字一模一样。西禅寺的两通碑虽残断不一，总还是为后人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实物，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两碑拓片为我们了解西禅寺提供了方便。

二、关于《西禅寺敕谕碑》

抄录现存《西禅寺敕谕碑》文字如下（原格式竖排改横排，不可辨认文字用“□”表示）。碑额篆书“敕谕”二字。

皇帝敕谕官员军民□□：朕君临天下，子育臣民於一視同仁之中，有篤近舉遠之義，至若□□□□有佐理勤慎禮宜優待者，則又褒嘉獎勵，期垂於久遠而不替，是乃出自特□，非但泛然施之而已也。司禮監太監秦文曆事累朝，□□中外，老成持重，朕所素知。邇年以來，簡參機□，□勤□□□□□□□□隆恩禮宜厚。其昔年，於西山弘教寺之傍，別創佛庵，□□□□□□□□□□□□□□□□賜庵額曰翠岩禪寺，今又賜祠額曰褒賢。□□內□□軍民溫□□□□□□□□畝八分，用供香火及修理之費。則□□□□□官及住持僧□□□□□□□□買到□□村軍民侯奉等地一十三段，共計三頃八十一畝，專為修理費□。□□則令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秦安等，子孫相承管業前後地共一十四段，通計八頃六畝八分，各有四至，明白俱止。令出納糧草，一應雜泛差徭，均與優免除。改賜本寺護敕外，仍別

賜祠堂護敕一道，通行禁約。曉諭，日後附近官員僧俗人等，敢有故違敕旨，在於祠地內外欺凌作踐侵佔者，定行治罪不宥。故諭。

大明正德八年九月十九日。^③

全碑楷体纵书14行，每行满行36字，全篇382个字。《西禅寺敕谕碑》虽有不少字剥蚀，但通读碑文后可知是正德皇帝下令保护西山翠岩寺和褒贤祠的敕谕。

《宛署杂记》记：翠岩寺在西山，正德三年太监秦文建，请于朝，赐今名^④。正德三年，司礼监太监秦文在西山弘教寺旁创建了一座佛庵，请皇帝赐名，于是正德皇帝赐佛庵额为翠岩禅寺。后来又建了一座祠堂，正德八年皇帝又赐祠堂额为褒贤。皇帝下令免除翠岩禅寺的出纳粮草公差徭役，购买土地八顷六亩八分给翠岩禅寺作香火地和修理寺庙费用，并颁发翠岩禅寺和褒贤祠护敕各一道。按理，这通《西禅寺敕谕碑》应该立在西山翠岩寺和褒贤祠，为什么现在立在小屯村西禅寺？可能是秦文利用这通《西禅寺敕谕碑》作“虎皮”来保护西禅寺。褒贤祠在万安山，不在小屯村，小屯村的西禅寺前身不是褒贤祠。《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误以为褒贤祠是西禅寺的原名，并称褒贤祠是太监秦安的祠堂。褒贤祠祭祀的是先贤，不会是祭祀建祠人秦文，更不是秦安。秦安是锦衣卫带俸指挥同知，并不是太监，褒贤祠也不是秦安建。《北京名胜古迹辞典》还把《西禅寺敕谕碑》立碑时间正德八年作为西禅寺始建时间，其作者以为立在西禅寺的《西禅寺敕谕碑》，当然是给西禅寺的，其实不然。短短一段话，出现几处错误，说明该书作者没有仔细读懂碑文，误导了读者。

《西禅寺敕谕碑》虽然立在西禅寺，但可以肯定与西禅寺无关，要弄清西禅寺历史只能寄希望于《敕赐西禅寺碑》。北坞嘉园残碑出现，可被证实就是《敕赐西禅寺碑》，西禅寺的本来面目终于被揭开。

三、《敕赐西禅寺碑》及其相关明代政治人物

《敕赐西禅寺碑》碑额为“敕赐西禅寺记”篆字，纵书两行，碑身全文如下：

敕赐西禅寺记

榮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國史官、湘源蔣冕撰。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新寧伯奉敕提督十二團營軍務、兼提督五軍營總兵官、掌後軍都督府事、侍經筵、滁陽譚祐書並篆。

西禪寺在都城西之小屯村，司禮太監秦公所修，以請於朝，得賜茲額。公嘗營壽藏於村西五里萬安山，其前有祠，曰褒賢；其旁有寺，曰翠岩。皆朝廷所賜名。及今寺額，凡三錫，蓋異數也。公即以屬大學士、故少師、西涯李文正公，與今少師石齋楊公記之，以侈上恩昭榮遇。既而買地六頃有奇於茲村，以為護守壽域之資。命猶子、錦衣指揮使安等主也。公以暇日往遊其間，得古寺遺址於村東，慨然修復。乃正德十年三月興工，至明年九月竣事。中為佛殿，翼以兩廊，左右為伽藍、祖師二堂。前為天王殿、鐘鼓樓，又前為大門。後為法堂、丈室。參禪有廬，會食有舍，與凡倉庾庖湢之所，靡一不具。莊嚴像設、金碧輝映。又買寺旁地二頃有奇，以贍徒眾。命翠岩僧覺淨，領祠部劉，來為住持。寺之形勝，視翠岩雖微有間，而規制略等。公謂不可無所記述，以示永久。乃序其始末，遣使以屬於予。予與公同出廣西，又濫竽內閣，數以政事同議論，誼不得辭。惟今都城西，佛事之宮，相望於遠近，穹門廣殿、長廊傑閣、土木之功，窮極侈麗。如茲寺者，蓋不為少。獨茲寺以西禪名，豈不以佛氏禪學來自西域故邪？禪學在吾儒所不道，今且未暇深論，獨西禪之教，傳入中國，則實自佛氏始。佛氏既西產，又始傳西方之教於中國，故其所居在中國者，往往以西名

之，無足怪也。況西於四時為秋，于五行為金，于五音為商，於五氣為殺。殺也者，非佛氏之所忍也。故其說一，於好生惡殺。每欲以此願力濟度群迷。雖其說空虛，誕幻茫乎，不可致詰，然其本意，則一以慈悲惠愛為主。公日侍天子，左右為腹心重臣，使今朝廷仁恩誕敷，德意旁洽。坐今四海九州，無一人不歸仁壽之域。豈非公之至願，又豈不謂佛氏西來設教之本意，與今日亦將有合哉。然則，公之惓惓崇奉象教，化宿莽為寶林。初非為身謀而徼求福田利益於一己者。然也，其意蓋有在矣。惡可以不記。公廣西平樂府賀縣人，自天順癸未，入禁庭曆事三朝，及我今上皇帝，幾六十年。今在司禮參預機務、慎密小心，夙夜匪懈，忠愛之誠，老而益篤，方為上所寵眷，賜蟒衣、玉帶。在內府，許乘馬及坐肩輿，金帛珍異之齎，月無虛旬，每歲祿米加至一百三十二石。壽登七十，猶精力過人，其福祿蓋未艾云。

大明正德戊寅秋八月之吉。^⑤

《敕赐西禅寺碑》碑文满行52个字，共23行，全篇847个字。北坞嘉园残碑存留的232个字（其中2个字不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拓片底部文字相同、笔迹一样。碑文由大学士蒋冕撰写，书丹篆额的是新宁伯谭祐。文中提及秦公属“西涯李公”和“石斋杨公”记录下皇帝赐额，西涯李公即李东阳，石斋杨公即杨廷和。李东阳、杨廷和、蒋冕三人有类似的经历：幼年才华初露，青年步入仕途，壮年进入内阁，是皇帝一人之下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核心人物。三人都是大学士，都曾在正德一朝内阁供职，三人终职都是内阁首辅。三人品格相近，为官清正，直言疏谏，铲除邪恶，维护国家利益。在和皇帝抗争无奈时，都选择了辞官离开朝廷，都活了70岁上下。他们三人传递内阁首辅一职，在《明史》中都有传记载。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他天资聪慧，4岁能写尺方大字，被视为神童。18

岁中进士，20岁已是从六品官，33岁任乡试考官，51岁已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性温多谋，辅佐明孝宗治国，很受器重。武宗荒淫无度，搜刮民财，宠用宦官，乱政废政。李东阳上疏极陈“嬉游废政”之弊。刘瑾擅权，残害忠良，李东阳不与刘瑾同流合污，挺身力救。武宗调边军入卫，京军戍边，李东阳等极力反对，武宗坚持要办，李东阳等终不奉诏。武宗拒谏，照旧纵游淫乐。“东阳以老疾乞休，连上数章，至是始许”^⑥，并“赏银五十两文绮四袭荫其侄兆廷为中书舍人”^⑦，4年后（1516），70岁病死，葬西郊畏吾村（今海淀区魏公村），柄国18年，后人称李阁老。接替李东阳首辅一职的是杨廷和。

杨廷和，字介夫，号西斋。1459年生于新都（今属四川省），12岁乡试中举，19岁中进士，进京编修《宪宗实录》《会典》，侍太子讲读、充日讲官，48岁入东阁专典诰敕，又调南京任户部尚书。不久召回北京，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刘瑾专权，朝臣遭害，杨廷和利用贼党矛盾，拿下刘瑾有功，进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以杨廷和主张镇压农民起义成功，特加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辞官，杨廷和继任内阁首辅。武宗出游不理朝政，杨廷和多次劝谏，不听。武宗依江彬出的主意，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边兵进京，威胁着京师的安全。武宗一死，杨廷和立即以武宗“遗诏”调动军队，重赉遣散四镇边兵各回原镇。杨廷和革除武宗建立的皇店、豹房，遣散番僧、乐工、各地进献的女子，停止不急工程，宣府行宫金宝收归国库，逮捕奸佞江彬。武宗荒淫无度无子，武宗一死，立嗣是当务之急。杨廷和和蒋冕力主立兴献王长子朱厚熜，让朱厚熜以孝宗从子的名义入继大统。世宗未进京前，杨廷和独理朝政近40天。世宗平稳继位后，杨廷和开始经济改革，裁汰冗员、减免税负，粮储大增。世宗执意立生

父为皇帝，杨廷和据理规劝，不成。杨廷和遭排挤，于嘉靖三年（1524）二月辞官回原籍，5年后去世，享年71。杨廷和离开内阁，蒋冕升任首辅。

蒋冕，字敬之，一字敬所，号湘皋，湘源籍，即今广西全州。蒋冕15岁乡试第一，25岁和哥哥同进进士，成为明弘治、正德和嘉靖前期的重臣，官职大学士。正德十一年（1516）二月，蒋冕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跨进权力的中心。正德皇帝“嬉游废政”，蒋冕尽力扭转败政。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后，蒋冕与杨廷和等一起立兴献王长子朱厚熜为嘉靖帝。嘉靖登基后“议大礼”，非立生父为皇帝不可，遭到首辅杨廷和和大学士蒋冕等大臣的坚决反对，反对“议大礼”的官员遭革除排挤，杨廷和被准辞官回乡。杨廷和走后，蒋冕遂升首辅。蒋冕依旧反对嘉靖皇帝立生父为皇帝的做法，多次疏请辞官归田，让嘉靖帝非常恼火，很快遭罢官。蒋冕在首辅位仅两个多月即被罢免。4年后世宗仍不罢休，敕定杨廷和为罪魁祸首，革杨廷和、蒋冕职，降为民。1532年，蒋冕70岁去世。世宗死后，穆宗给杨廷和、蒋冕平反、复官，杨廷和追赠太保，谥文忠，蒋冕追赠少师，谥文定。此时，杨廷和已离世37年，蒋冕已离世35年。

《敕赐西禅寺碑》由谭祐书丹并篆额。谭祐是明代随朱棣征战功勋卓著立祠岁祭的崇安侯谭渊之曾孙、新宁伯谭忠之孙、谭璟之子。谭门是军人世家，世袭新宁伯。正德十三年（1518）时，谭祐有虚衔光禄大夫、柱国、太傅兼太子太傅、侍经筵，实职是提督十二团营军务、兼提督五军营总兵官、掌后军都督府事。历事成化、弘治、正德，几次受遣任祭祀官，祭天地山川宗庙等，提督泰陵及卢沟修堤工程。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退休。谭祐生于正统丙寅（1446），卒于嘉靖乙酉（1525），享年80岁。葬在永定河东岸石景山区黑头山东麓的新宁伯家族墓地。1986年，墓地出土了谭祐及吴、柳夫人墓志

铭。新宁伯谭祐虽是武将，书法却颇见功夫，秦文请他书写了蒋冕撰《敕赐西禅寺碑》碑文。

《敕赐西禅寺碑》记西禅寺是司礼监太监秦文建。秦文执掌司礼监，是皇帝身边权重位显的人物。秦文是明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太监，在皇帝身边当传话筒，特别受武宗赏识，武宗又是赐额，又给护敕，使翠岩寺、褒贤寺在西山的地位显赫。嘉靖登基后，秦文曾奉命去湖北安陆（今钟祥）迎接圣母进京。《明世宗实录》记：“正德十六年七月丁卯，以奉迎圣母敕谕太监秦安等，令以长行船数及夫役多寡，所过有司如数为备。内外官随侍者，皆宜安静。行事供应，悉从简约，勿生事扰民。”^⑧秦文供事朝廷，与李东阳、杨廷和多有交往，秦文为报恩武宗3次赐额，“属大学士故少师西涯李公与今少师石斋杨公记之”^⑨。李东阳，正德元年（1506）加少师职。蒋冕撰写碑文的正德十三年八月，李东阳已辞官离职6年，去世已两年，故称“故少师”。杨廷和，正德七年（1512），征讨河北刘六、刘七和河南赵燧有功，“特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⑩。正德十三年立碑时，杨氏已获少师衔，故称“今少师石斋杨公”。秦文在朝廷六十年，历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五朝，谨慎忠诚，参与机务，为皇帝宠眷，赏赉有加。年过七旬，精力过人，福禄未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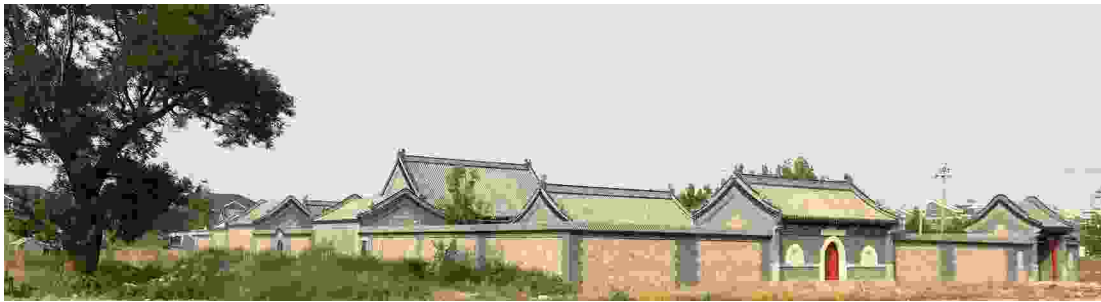
四、翠岩寺与褒贤祠

《敕赐西禅寺碑》云：公尝营寿藏于村西五里万安山，其前有祠曰褒贤，其旁有寺曰“翠岩”^⑪。秦文于正德三年（1508）在小屯村西的万安山自营坟墓，坟前是褒贤祠，旁边是翠岩寺。万安山在香山以南，山麓有元明两代的弘教禅林，清代改法海寺。因模式口蟠龙山有明代以壁画著称的法海寺，位于南，万安山法海寺位于北，所以称万安山法海寺为北法海

寺。今北法海寺西端巨石上刻有“弘教禅林”4个大字。在弘教寺西北角灰绿色岩石上，有大震翁题刻的“翠屏”二字，翠屏石西北有残垣等建筑遗迹，或许就是翠岩寺旧址。翠岩寺可能因建在如翠的巨石旁得名。在翠屏石的西北有一石，上刻“大震超地禅师寿藏”，大震超地禅师、大震翁似是一人。“大震超地禅师寿藏”位置与《敕赐西禅寺碑》中秦文寿藏位置相仿，怀疑两者是一码事，大震超地禅师是秦文还是翠岩寺兼西禅寺住持觉净，有待进一步考证。寿藏的正前方、右前方有残垣、础石等建筑遗存，大概就是褒贤祠和翠岩寺旧址。

五、关于西禅寺的规模、规制

《敕赐西禅寺碑》记载了小屯村西禅寺的规制。西禅寺中轴线有三进殿宇，一进依次有山门、钟鼓二楼和天王殿。二进正殿供佛，正殿左右两廊连接东西配殿，东殿为伽蓝堂，西殿为祖师堂。三进为法堂和方丈。轴线两侧还有参禅的庐舍、储粮的仓库、餐饮的厨房、洗浴的温室等。西禅寺与西山翠岩寺规制等同，与西山诸寺远近相望，穹门广殿，长廊杰阁，土木之功，穷极侈丽。西禅寺以佛教禅学自西域传入中国而命名，它始建于正德十年（1515）三月，第二年九月竣工。西禅寺建成后，武宗皇帝赐了寺额。1936年，西禅寺有不动产土地9亩余，房屋53间。庙内法物有泥像148位，礼器158件，法器16件，佛龕9个，石碑3座，曾是警察驻所和村办学校^⑫。2016年，文物部门对西禅寺存留的第二进正殿进行了维修，恢复了山门、天王殿、三进正殿及配殿、回廊等（图三、图四）。山门石匾镌刻“重修古刹西禅关帝禅林”，由此得知西禅寺自建成后曾重修过，并增加供奉关帝。1928年，寺庙登记“西禅关帝禅林坐落西郊五分署小屯村一号，明正德八年五月敕赐，清光绪三年重修”^⑬。因此，推断门额当是清光绪重修时



图三 西禅寺山门



图四 修缮中的西禅寺正殿

之物件。

六、余论

关于西禅寺建成年代,《敕赐西禅寺碑》记西禅寺“正德十年三月兴工,至明年九月竣事”。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西禅寺建成后,等待皇帝敕赐,得到敕赐后立碑,已是正德戊寅(即正德十三年)秋八月。1928年寺庙登记为正德八年五月敕赐,那时是给褒贤祠的敕赐,并非给西禅寺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也记明正德八年建,和1928年寺庙登记一样,都把《敕谕碑》立碑时间错误地当作了西禅寺建成时间。正德八年西禅寺尚未动工,也没建成,更没得到敕赐。《敕赐西禅寺碑》碑文订正了文献关于西禅寺建成年代的谬误。

小屯村《西禅寺敕谕碑》和《敕赐西禅寺碑》文字不多,却包含许多历史文化信息,依据碑文可以勘察出文献记载的谬误,是难得的重要文物。尤其蒋冕撰的

《敕赐西禅寺碑》在消失了近50年后,以残断之躯再次面世,实属幸运。碑身和碑座怎么从小屯到了旱河东岸?碑上机械性损伤的痕迹什么时间形成的?碑身的上半段又去了哪里?仍然是个谜。

①(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05页。

②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第276页。

③《西禅寺敕谕碑》,国家图书馆藏金石拓片,北京6133、6134。

④(明)沈榜:《宛署杂记》第十九卷,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6页。

⑤⑨⑪(明)蒋冕:《敕赐西禅寺碑》,国家图书馆藏金石拓片,北京6067、6068。

⑥《明史》卷一百八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4820页。

⑦《明世宗实录》卷九十五,“正德七年十二月”。

⑧《明武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

⑩《明史》卷一九〇《杨廷和传》。

⑫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寺庙历史资料》,“西禅寺”,档号:J2-8-1209,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618-619页。

⑬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寺庙历史资料》,“西禅关帝禅林”,档号:J181-15-703,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358页。

(作者为北京广播电视大学退休教师)

北京绩溪会馆遗存刻石略考

李 巍

近日笔者在研究绩溪会馆刻石间隙到安徽绩溪做了考察。绩溪因水而得名,据县志记载,“县北有乳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并流,离而复合,有如绩焉,故名绩溪”。绩溪不仅风光秀丽,历史悠久;更是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之地。北宋初年,绩溪县所建的桂枝书院,就是安徽省见诸记载的最早书院。据史料记载,绩溪号称“东南邹鲁”之地,“邑小士多”“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①。

绩溪古属新安郡,在汉代称华阳镇。南朝梁大同元年(535)设良安县。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改新安郡为歙州。唐永徽二年(651)始置绩溪县。

一、北京绩溪会馆最早建于明代

明清两代,各地的会馆在北京城如雨后天春笋般地兴建起来。绩溪县于明万历年间在北京就建有会馆。关于会馆设立的初衷,一些碑刻记载里尽显端倪。

清乾隆十年(1745)的《休宁县会馆碑》记载:“京师为万方辐辏之地,风雨和会,车书翕至,飘纓纓组之士于焉云集景从,遇乡会试期,则鼓篋桥门,计偕南省,恒数千计。而投牒选部需次待除者,月乘岁积。于是寄庑僦舍,迁徙靡常,炊珠薪桂之叹,盖伊昔已然矣。时则有置室宇,以招徕其乡人者,大或合省,小或郡

邑,区之曰会馆”。

清道光十九年(1839)的《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载:“明时乡贡士及庠士之优者,皆令居太学学舍,不能尽容,多馆于其乡在朝者之邸第,未闻立馆以萃试士者。自举人不隶太学,而乡贡额加广,于是朝官各辟一馆,以止居其乡人,始有省馆。既而扩以郡分,以邑筑室几遍都市,是不徒夸科目之盛,竞闾里之荣,特虑就试之士,离群废学,有以聚而振之也。”

可见,建设会馆的目的不外乎几种:为本乡官员公务之用;士子进京求学之所;商贾舟车来往、工程承办接洽、在籍人等游历赴京提供食宿之所。

根据明万历年间绩溪人葛应秋^②撰写的《建绩溪会馆序》记述,“皆公车每不乏人,以及盐、胄、卿、造、椽史岁时鳞集磨至”;又苦于逢拜会的访客、互道庆贺士子、同乡小聚没有接纳的场所;更有“解装道旁昏暮靡投者往往而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绩溪县人氏余任卿、曹华宇、葛应秋及其三叔等人,联合在京的绩溪同乡捐资助建,选址琉璃厂附近,创建梁安会馆并制定规约。

二、绩溪会馆和义园的创建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现存的两件刻石分别为绩溪义冢碑和绩溪义园碑。

《绩溪义冢碑记》刻石,高33厘米,宽80厘米,厚8.5厘米。青石质。清乾隆六十年(1795)镌刻。刻石残断为两截。

据发现者刘焕清先生介绍，这块刻石是在1997年夏天发现的。当时他在家门前的沙石坑里捡砖头，发现有一石块上刻有“乾隆”字样，觉得是文物，就把它搬回家，用塑料布裹着放在院角里，准备等机会献给国家。他家门沙石坑里的渣土都是从西琉璃厂的拆迁工地运来的，绩溪义冢碑极有可能是被夹杂在渣土中抛掷于沙石坑。兹将该碑记录文于下：

吾□舊有梁安會館，久經圯毀，並其基址亦無可考詢。乾隆丁巳，同鄉諸耆長購地，立績溪義塚於三義庵。歲時會集省奠事。各就緒，乃謀複建會館，眾議咸協。于壬戌春，展墓之次，再申前議，遂捐輸得數百金，立今會館。其首事者，戴君啟良、汪君永明、程君尔玉、畢君尔亮、李君君實，今諸人俱先後謝世，而其肇興之工不可沒。胡先生舜遊、暨予再叔旭初，懼諸人之泯滅無聞也，歎誌之以垂諸後。會予適入都，屬筆述其崖略，礪諸廡噫，後之覽者因名以思其人，其油然篤桑梓之誼者，舉於是乎。在則書名之，所繫誠重。而吾鄉之擔簦聚族於京者，其亦可同志合力，以維持此館於勿替也已。

乾隆己卯歲菊月楠坪汪立燦拜撰。

計開捐輸姓氏於後（略）

根据这篇碑文的记载，绩溪县在明代就于北京建有会馆，并且沿用唐代对绩溪县称谓，称为梁安会馆。明末清初会馆圯毁，基址已不可考了。“良安”是绩溪最早的县名。根据考古发掘，治位就在今天的绩溪县城华阳镇东0.5公里。南朝梁大同元年，设置良安县，属新安郡。民间又写作“梁安”。清乾隆《绩溪县志》载，唐武德七年（624）废良安县，仍归歙县。义冢碑还有一个内容，绩溪义冢建于绩溪会馆之前，是先有义冢后有会馆。乾隆丁巳（1737）同乡合力修筑义冢，诸耆长购地立绩溪义冢于三义庵，襄助人共61位，合计筹措银两数百金。岁时人云集省奠事各就绪，众人开始商议谋划建立本县会馆之事，乾隆壬戌（1742）春，祭

奠之后又提到修建会馆的事情。捐助人首事戴启良、汪永明、程尔玉、毕尔亮、李君实等人在创议之始就参与筹措选址、督工、备料等工程事宜，功不可没。根据碑文，这是一篇补记文，会馆兴建于乾隆七年（1742）。乾隆己卯岁（1759），适逢汪立燦进京，受胡舜游及汪立燦二叔汪旭初嘱托撰文纪念那些首倡者和捐助者，使其善举永垂诸于后，使后来者油然笃桑梓之谊，聚于京者慷慨解囊合力维护会馆的日常运转，因而嘱托汪立燦^⑤为文以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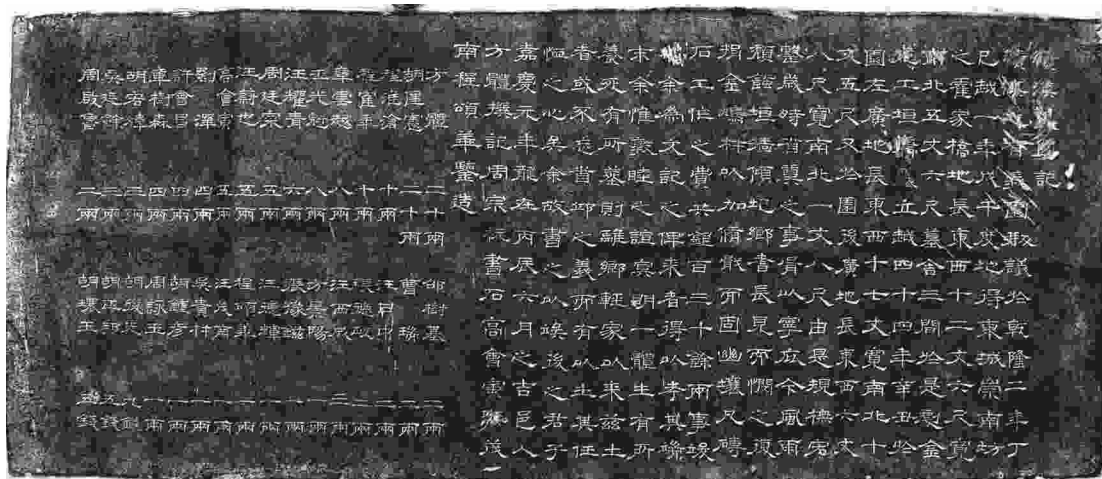
这篇碑文名“绩溪义冢碑记”，实则是记述绩溪会馆建设因由，由于先有义地，同乡人等才得以岁时会集产生谋划建立会馆的设想。

梁安会馆原址在琉璃厂中间桥东，乾隆初年重建会馆时，将旧馆变卖，重新另觅新址。《顺天府志》：“椿树上头条胡同有绩溪会馆。”^④从《绩溪会馆碑记》和《绩溪义冢碑记》综合来看，建立绩溪会馆的设想在乾隆七年，会馆的真正竣工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后，嘉庆十二年（1807）、道光七年（1827）和九年（1829）、光绪二年（1876）和七年（1881），该会馆都有大规模的改建和翻修。

三、绩溪会馆与义园的最初发展

《绩溪义园记》刻石，高35厘米，宽87厘米，厚13厘米，于嘉庆元年（1796）镌刻，1999年2月征集于宣武区西琉璃厂东椿树胡同6号院拆迁工地。椿树胡同明代属宣北坊；清代分椿树胡同头条、二条、三条，沿用至今；民国年间将椿树胡同改为东椿树胡同。东椿树胡同西口至西椿树胡同东口为椿树上二条，西椿树胡同西口到永光西街东口为椿树下头条。现将该园记内容逐录于下：

績溪之有義園，創議於乾隆二年丁巳。越一年戊午，度地得東城崇南坊之霍



《绩溪义园记》刻石拓片

家橋。地長東西十二丈六尺，寬南北五丈六尺，墓舍三間，於是處金庀工垣墉矗立。越四十四年辛丑，于園左廣地，長東西十七丈，寬南北十丈五尺。又於園後廣地，長東西六丈八尺，寬南北一丈八尺。由是規模宏整，歲時省奠之事，肯以寧庇。今風雨頹蝕，垣牆傾圮。鄉耆長見而憫之，復捐金鳩材，以加修葺而固幽壤。凡碑石工作之費，共銀百三十餘兩。事竣，□余為文記之，俾來者得以考其端末。餘惟敦睦之誼，冥明一體，生有所養，死有所葬，則離鄉輕家以來茲土者，或不忘首卹之義，而有以生其任恤之心。吳餘故書之，以俟後之君子。

嘉慶元年龍在丙辰六月之吉邑人方體撰記，周宗杭書石，高會寅、□茂南、程頌華監造。

捐資人名（略）

撰文人方體，字道坤，一字茶山。安徽績溪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由刑部郎中出任九江知府。他為官清廉正直，捐資築桑落洲堤，更正九江關船尺。調任鳳陽知府，後擢蘇松常鎮道。任滿，調江寧鹽巡道，疏浚秦淮支河3.6公里。升任湖北按察使、布政使。後因病歸鄉，捐資修建揚溪源山道。著有《儀禮今古文考証》《儀禮古文考誤》《綠雨山房集》^⑤。

刻石記載，乾隆二年（1737），眾

會眾集資在東城崇南坊霍家橋购地建立义地。义地东西长十二丈六尺，南北宽五丈六尺，墓舍3间。占地约合700平方米。根据程莘卿^⑥《绩溪会馆录》的记载，乾隆己卯馆记碑阴内载，一买刘姓东城崇南坊地，……东至西老墙根，通长十二丈六尺，西边北至南墙根十二丈六尺，瓦房三间。……定价四十五两。乾隆四十四年（1779），于义园左购地，东西长十七丈，南北宽十丈五尺，又于园后购地，东西长六丈八尺，南北宽一丈八尺。共计约2100多平方米的面积。嘉庆元年，历经50多年的义地因风雨颓蚀，垣墙倾圮。乡耆长组织资助捐款，又聚集人力加以修葺，以尽乡谊敦睦之情，使得远离家乡的人死后能归葬，使后继离乡或能考取功名之人或能飞黄腾达之人不忘首卹之义而继续给在京同乡以帮助和资助。这也是设立会馆和义园的初衷使然。

根据程莘卿在清光绪年间撰写的《绩溪会馆录》的记载：“园四边皆有围墙，墙外皆存有余地。东至官路，西及南至民地，北至民房。园形，西边自中以北地较赢其丈尺……园之南为左安门，园之西北有寺曰法塔寺^⑦。自西来者，以塔为识园……”直至咸丰八年（1858）按市价又购买一高姓人净地一块。同治八年

(1869)，在正红旗蒙古瑞姓人手里购得东至官街北至糖房计长九丈九尺。

到清朝末年，无论是会馆还是义园都有了相当的规模。1947年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对各省在京会馆进行了一次调查。根据《1947年各省会馆总登记表》记录，绩溪会馆产业包括椿树上头条1号至5号、北椿树胡同14号共6所，计房屋98间。绩溪义园地三段内房屋6间^⑧。而就1952年调查的义园情况，绩溪义园占地6.3亩^⑨。而在1954年的《安徽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房地产移交清册》上的登记是未包括上头条一号，共有房屋104间，占地4.2亩^⑩。

“在京的各大会馆中，均有义地一项，这些义地大多集中在城南，诸如西便门、左安门、广渠门等。”^⑪“东始左安门内大街，西至铁路，北起龙潭路，南至龙潭湖。只有一个门牌。因在霍家桥南侧谐音得名。火桥南里在民国时称绩溪义园，其东部是沈家园，西部是广东义地。1949年改名火桥南里，1965年沈家园并入。广东义地为广东人客居北京死后寄埋之处。为了区分广渠门内余家馆的广东义园，故称广东新义园。”^⑫“自广渠门大街而南以达于左安门，均为荒凉寂寞之区，蔬圃麦畦，颓垣废冢，一望皆是。其有名称可记者，惟二三寺庙而已。广渠门大街以北有地曰南里，自是而南曰夕照寺……再南曰三义庙，曰甘露寺，广东新义园。其东曰东火桥，有袁督师庙。”^⑬崇南坊霍家桥，位于崇文区东南部。即今天的崇文区（已经并入东城区）龙潭街道管辖。

“崇南坊，在新城广渠门、左安门东南角。”^⑭有地藏寺、法藏寺、妙音寺、宝应寺、崇教寺、安化寺、吉祥寺。未提及三义庙。《日下旧闻考》中“地藏寺、法藏寺、妙音寺俱存，余无考。”《京师坊巷志稿》中有法藏寺、三义庙。《日下旧闻考》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撰写，《京师坊巷志稿》是清代朱一新作于光绪十一年（1885）。可以推断三义庙或为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所建，乾隆六十年

汪立烁撰写碑文，把义地近旁的三义庙作为参考坐标写到了碑文里。

四、清中期以降绩溪会馆的变迁与消亡

嘉庆十九年（1814），会馆经管人葛雨田、竹村等人用累年盈余及乡人捐资又把义园的房屋翻建一新，会馆大厅匾额易名更新，制定规约十几条粉刷于大堂墙壁上。道光六年（1826），因王照、舒国安侵占会馆租钱一事^⑮，经理诸人在旧规的基础上，斟酌增损，共同核议新的规约。除会馆管事的职责、出租房屋租息用途、日常开支、来馆居住者限制、年节支用致祭、修理房屋等规定外，会馆规条对义园也有一些具体的规定：“义园须择诚实小心者看守……其园内树木亦责令护守，勿得损伤……”“义园须按号埋葬，馆内设立号簿一本，同乡有病故者，先到值年处取具编号印票一张，看园长班凭印票收埋，俟清明七月十五值年到园时，将新添几冢报明查验，倘有无印票而收埋者，查出即将长班送官究治，以防私盗寄埋等弊。”“同乡有在都病死无力敛埋者，馆内给棺安葬。”^⑯

科举停止后，会馆由旅京同乡士商继续维持。民国以后，绩溪会馆由绩溪旅京同乡会负责管理。民国七年（1918），胡适先生正值在北京大学任教，于是被推举为经理。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汪姓人代管。《绩溪会馆总登记表》记录，最后一次会务人员改选在民国二十五年底，选举董事一人，又选举副董事两人，分别由曹孔修^⑰和胡成之（胡适之的堂弟）担任。

绩溪义园在20世纪50年代初营建龙潭湖公园时被征购。1997年，椿树地区拆迁，绩溪会馆从京城版图上永远地消失了，其原址新建了椿树园小区和庄胜崇光购物中心。

五、小结

会馆最早出现在明永乐年间，是各省为本邑参加应试的书生提供的便利之所。入清以后，由于流官制度的实行及经济的繁荣，会馆之设再趋兴盛。清代以降，许多同乡士商合建会馆的同时，还都力行善举，有的甚至在建馆之前就建有义冢等。对病歿于京无力安葬的同乡人施以棺木，埋入义冢。“义园之与会馆同为舌，他乡处略地者之急务。然会馆以居生人，去住无常，浮踪萍寄耳。若义园，则客死无依永埋于兹而不得反。”^①

关于绩溪会馆现存的历史文献资料极少，但是从这两件刻石和程莘卿先生《绩溪会馆录》的记载中，也能简略地梳理出绩溪会馆的历史沿革。万历四十七年，绩溪县人氏余任卿、曹华宇、葛应秋及其三叔等人，联合在京的绩溪同乡捐资助建，选址琉璃厂附近，创建梁安会馆并制定规约。清乾隆二年，在崇文门火桥南里购地建义园。从乾隆七年开始，将梁安会馆旧址变卖后另觅新址，建立绩溪会馆。经过历朝历年的购置土地、扩建、改建、翻建，逐渐积累成民国时期的规模，房产6所，房屋98间；另，义园占地6亩。直至民国时期，一直由本乡人管理。

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会馆的职能来看，会馆为本邑来京人员提供固定处所，义园也只为本邑人员提供安葬之地，而且本邑在京者触犯条规，重者发回原籍着由地方监督等，这对于社会秩序的安定有积极的作用。会馆义园的设立是民间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与文化、经济、政治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起着一定的作用，是认识北京城市历史发展的实证之一。

仁和县丞，善诗赋，尤精切韵，著有《韵学》。应秋美髯白皙，被称为“璧人”，参加县童考试，作文使县令称奇。读书自六经、子、史以逮百家，无不精研成诵。万历二十八年(1600)中举人，任浙江遂昌县教谕。台使冯某深知其贤才，称赞说：“倜傥可当国士，吟哦又是书生。”应秋文薮理窟，穷研深钩，总出之自然。其为文为人，海南传颂。著作有《石文斋文集》《师韦斋初刻》《时义二刻》和《石丈斋三刻》，流传久远。董其昌称其著作“气骨神理，众美皆臻”。参见故宫博物院：《安徽府州县志》第七册《绩溪县志》，海南出版社，2001年。

③ 汪立烁，字质堂，号南墀。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副贡生。精研“三礼”，为江永所推崇。著有《吹剑集》《箴闻剩语》。戎毓明主编：《安徽人物大辞典》，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年，第183页。

④ 陈宗藩：《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31页。

⑤ 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绩溪县志》，方志出版社，2011年，第1435页。

⑥ 程鹿鸣，字莘卿，绩溪人，实授直隶省大名府知府，于光绪六年(1880年)继任绩溪会馆经理人。

⑦ 法塔寺又名法藏寺，建于金大定年，原名弥陀寺，俗称法塔寺。《宸垣识略》载：“法藏寺在霍家桥，俗称白塔寺。”《天咫偶闻》载：“法藏寺已毁尽，惟浮图仅存，而往者如故。”

⑧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893页。

⑨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162页。

⑩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760页。

⑪ 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6页。

⑫ 王彬、徐秀珊：《北京地名典》，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275页。

⑬ 陈宗藩：《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48页。

⑭ (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衢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⑮ 道光六年，王照、舒国安朋比为奸居占会馆，侵蚀租钱各有八百余吊之多，复勾通租房余姓捏造借据从中取利。举人张四维、拔贡石炳文等人共同

① (清康熙)《绩溪县志续编》卷三《硕行》。

② 葛应秋：字万说，城内人。父懋学，任浙江

举发巡视北城察院，批断，即令两人搬移会馆，核查账目侵吞、冒籍滋生事端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⑩ 道光六年的《绩溪会馆规条》，北京市档案馆：《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84页。

⑪ 曹孔修（1897—1977）系安徽绩溪人，自幼在老胡开文杭州分店学徒，精通笔墨发展历史及制造

工艺。1920年，他调入上海总店工作，1924年任天津分店经理，从1930年起任北京分店经理，自此便在北京定居。1956年被推选为市工商联委员。参见《北京青年报》2011年12月21日，曹立先文。

⑫ 《修绩溪义园记》，载程莘卿《绩溪会馆录》。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国子监与国立历史博物馆

王琳琳

北京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最高学府和国家教育管理机构。清朝末年，旧有教育制度弊端早已显现，在教育改革的呼声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废除科举制度，11月设立学部，兴办现代学堂，随之，撤销国子监，归并学部，国子监至此失去原有职能。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7月“教育部就前国子监官舍设立历史博物馆筹办处”^①，这就是今天天安门广场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办处”。1918年，教育部将该馆迁往故宫午门、端门，国子监57127件文物^②也随同迁走。国学旧存作为历史博物馆的重要藏品在午门城楼上的陈列室中展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物，始有堪称“壮举”的“文物南迁”，国子监文物中的珍品也参与了南迁……

一、国子监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中华民国成立伊始，教育部以“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③为宗旨，着手筹建博物馆。“查文庙及国子监两处，自民国元年间本部接管，当以国子监一处所有辟雍等建筑，在前清时迭经儒臣考订，宏此规模，关系于历史学者甚巨，于历史博物馆性质甚为合宜”^④，“国子监旧署，毗连孔庙，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处建筑，皆于典制学问有关，又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学所用器具等，亦均足为稽

古之资，实于历史博物馆性质相近”^⑤。

由于国子监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历史博物馆性质契合，故将国子监作为历史博物馆的馆址。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参与了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选址、征集文物等工作。在《鲁迅日记》中有：

“（1912年）6月25日，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多剥落，其一曾剜以为臼。”^⑥经“国务会议议定改国子监为历史博物馆”^⑦，1912年7月9日正式在国子监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由胡玉缙担任筹备处主任。国子监的孔庙也一并归教育部管理，由筹备处暂行兼管^⑧。

筹备处成立之初，藏品大部分来源于国子监旧有文物。“是时所有物品，半系国学故物。”^⑨这一阶段，筹备处还对国子监文物进行登记清查和陈列展览，“国子监之法器等物业已清查整理陈列”^⑩。1914年5月至8月在德国莱比锡举行“万国书业雕刻及他种专艺赛会”，筹备处提供了11种藏品远赴莱比锡参展，其中包括国子监乾隆玉刻十三经序文和“表章经学之宝”等器物。这是国子监的珍贵文物第一次走出国门。

（民国）二年（1913）三月，准外交部来函准德国哈公使节略开德国一九一四年来伯叙（莱比锡）城举行“万国书业雕刻及他种专艺赛会”。同年九月，据该会旅京委员米博士和伯到部面称拟假（借）用历史博物馆内物品数件转送到会陈列。嗣又函送拟假物品计十一种清单，

并声明所假各物陈列时均拟罩玻璃箱匣以示珍护且标明北京历史博物馆之物品以彰中华珍品。当经复以拟假各件系贵重公物，须由该国公使作一介绍书送部方可照办。十一月，准外交部公函德国哈使来函德国来布其城“万国书业雕刻及他种专艺赛会”旅京委员米博士和伯拟借历史博物馆物品转送该会陈列，请为代恳本大臣应如其请……兹将来函录送请查核办理等因到部，当即令行该馆照米博士单开各件计十一种检送到部，面交米博士领讫，并附送一说明书以使陈列时择要标明，使阅览者有所参考。现在此项物品尚未由该会办事处交还，拟俟战事稍平，再请该国公使转催从速寄还以重公物。^⑪

此事在《鲁迅日记》中也有相关记录。鲁迅当时负责调集展品工作，他在1913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历史博物馆送藏品十三种至部，借德人米和伯持至利俾瑟雕刻展览会^⑫者也，以其珍重，当守护，回寓取毯二枚，宿于部中。”第二天“上午米和伯来部取藏品去。”^⑬

二、国子监文物^⑭搬迁

1918年，“因原有馆址地处偏僻，房舍狭隘”，教育部决定将该馆迁往故宫午门、端门，国子监57127件文物^⑮也随同迁走。这些文物主要是10件周代彝器、国学石刻、讲学祭孔御用器物、匾联及书版等。

1. 周代彝器

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皇帝钦颁内府所藏周代十器：“乾隆三十四年，高宗纯皇帝钦颁内府所藏周器十。曰周康侯鼎、曰牺尊、曰内言卣、曰牺首鬯、曰雷纹壶、曰召仲簠、曰盟簠、曰雷纹觚、曰子爵、曰素洗。命陈设大成殿，并镌名座底以示征信。乾隆四十四年复颁十种彝器图册，藏御书楼。”^⑯1920年移运至历史博物馆^⑰。“每年春秋丁祭仍送孔庙陈列，祭毕运还。”^⑱从1915年《东方杂志》第



图一 《东方杂志》刊登的《京师文庙内陈列清帝所颁商周铜器》照片

十二卷第三期中《京师文庙内陈列清帝所颁商周铜器》的照片（图一）我们可以了解到10件彝器祭孔时的摆放位置。从右至左依次为：内言卣、康侯鼎、子爵、雷纹壶、盟簠、召仲簠、牺首鬯、素洗、牺尊、雷纹觚。

台湾张临生先生曾考证，此10件彝器并非皆为周代器物，其中盟簠、召仲簠、内言卣、雷纹壶、雷纹觚为后世仿品，子爵为商代器物，素洗为汉代器物，康侯鼎、牺尊、牺首鬯为周代器物^⑲。

周康侯鼎“高八寸四分，横六寸六分，纵四寸三分。耳高一寸八分，足高三寸五分。四面铸饕餮纹，有铭”^⑳。内壁有铭文“康侯丰作宝尊”（图二）。康侯丰指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姬封。因其初封于康，故称康侯或康叔。《易·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高亨注：“康侯，周武王之弟，名封，故称康侯或康叔。”此鼎为康叔所做，可知其为西周初年青铜器，价值非凡。

2. 国学石刻

1918年，历史博物馆迁往故宫午门，国子监珍贵石刻作为馆藏文物一并带走。下表为1928年6月国立历史



图二 周康侯鼎铭文拓片

博物馆陈列室物品目录中有关国子监石刻部分。

国立历史博物馆所藏国子监石刻统计表

文物序号	文物名称	朝代	件数	备注
189	老彭观井图(刻石)	宋	1	第三陈列室刻石(原国子监文物)
190	古文孝经(刻石、明蔡毅中集注)	明	2	同上
191	争坐位帖(刻石、赵孟頫临本)		2	同上
192	石鼓文(盛氏)(刻石)		10	同上
193	丁香花诗(并序)(刻石)		1	同上
194	兰亭序(赵孟頫临定武本) 赵孟頫临本《乐毅论帖》(在《兰亭》背)		1	同上
195	乐毅论(金特赫临)(刻石)		1	同上
196	清仁宗喜雨山房(刻石、铁保书)		2	同上
197	八旗箴(清)石	清	1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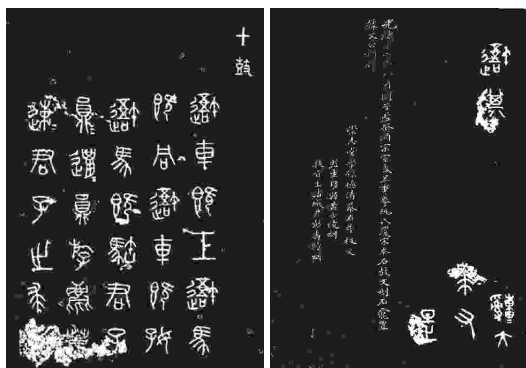
《北平学术机关指南》记载了历史博物馆各种石刻拓本出版及售价，其中有关国子监石刻拓本有：“老彭观井图（宋，靖铭，明万历五年刻石，旧在国子监东厢后堂壁间）、丁香花诗并序（康熙五十七年谢履忠集圣教序与福寺二碑字刻石，旧在国子监御书楼下）、清仁宗御制喜雨山房记（嘉庆十八年铁保奉敕书，旧在国子监）、乐毅论（嘉庆十八年金特赫临，刻石，旧在国子监）、石鼓文（光绪十二年，重摹阮氏覆宋本，旧在国子监韩文公祠壁间）、石刻彝器图、木刻彝器图、彝器铭、唐支氏小娘子墓志（陈书撰，大中十年五月，旧在国子监）、宋郭文庆妻刘氏墓志（刻石，嘉祐八年十月，旧在国子监）；兰亭序（赵孟頫定武本，旧在国子监御书楼下，后失，在光绪中期于敬一亭下土中掘出）；乐毅论（赵孟頫临本，刻在兰亭石背）；争坐位帖（赵孟頫临本，旧在国子监御书楼下）；古文孝经（明蔡毅中集注，天启三年刻石，旧在国子监西

厢正堂壁间）。”^②其中唐支氏小娘子墓志和宋郭文庆妻刘氏墓志是否为国子监旧有石刻有待考察。

历史博物馆收藏孔庙国子监21方石刻皆为珍品，其中尤以《兰亭》石刻最为珍贵，它是《兰亭》单本石刻中唯一流传至今的刻石，弥足珍贵。“关于国学《兰亭》石刻的评价，前人颇有赞美之词：‘佳刻’（《万历野获编》）。‘精神意度奕奕动人’（《竹云题跋》。‘字法遒劲，气味深厚，宋人诸家所临远不及之’（孙泽卿：《庚子消夏记》）。‘校读一过，然后知此本之足珍也’（劬园老人：《题国学兰亭乾隆拓本》）。”^③该石原立于国子监御书楼，故称之为“国学《兰亭》石刻”或“监本《兰亭》石刻”。

“国学《兰亭》刻于细润的青石，横幅，纵35厘米、横90厘米、厚7.5厘米，重71.5公斤。字竖行，共28行324字，边有界局，行有丝栏未署刻石年月亦无题跋。石背面刻小楷《乐毅论》，文末署有‘孟頫’二字及‘赵子昂氏’方印。”^④关于此碑的时代、版本、流传经历，历来众说纷纭。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认为：“此石一云明初出天师庵土中，一云元顺帝北还……弃之于路，徐中山取置国学。”“疑是定州薛师正翻刻本，或薛绍彭所刻本。”^⑤道光版《钦定国子监》采用孙承泽的说法，只说“兰亭序系前代摹勒”^⑥。因石碑背面为赵孟頫的《乐毅论》，“清王澐便认为是赵孟頫的临本上石”^⑦。在国立历史博物馆陈列室物品目录中标注《兰亭序》为“赵孟頫临定武本”。张振新、杨文和二位学者认为原立于国子监御书楼的《兰亭》石刻摹刻于宋代^⑧。

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第一古物”的周秦石鼓是国子监最重要的石刻文物，立于孔庙大成门内。光绪十二年（1886）国子监祭酒、宗室盛昱依石鼓宋拓本刻石立于国子监土地祠内壁间（韩文公祠）。石鼓上的文字由崇志堂学录蔡右年校对，监



图三 黄士陵、尹彭寿摹刻石鼓拓片

生黄士陵和拔贡生尹彭寿刻（图三）。在石鼓后有 小楷跋：“光绪十二年八月，国子监祭酒、宗室盛昱重摹阮氏覆宋本石鼓文，刻石龛置韩文公祠壁。崇志堂学录德清蔡右年校文，监生黟县黄士陵刻，拔贡生诸城尹彭寿续刻。”

3. 讲学祭孔御用器物

被历史博物馆作为藏品带走的还有清帝临雍讲学和祭孔的御用物品，有“御座、御案、围屏、炉鼎、笔墨、表章经学之宝以及祀孔所用玉铜、锡竹各项礼器，国子监图等，共计一百七十一件”^⑧。

国子监辟雍建成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是专为乾隆皇帝登基50年“临雍讲学”而建。辟雍内陈设了一些供讲学之用的器具：宝座、五峰屏、御案、“表章经学之宝”玉玺、玉版册页、兰亭石砚、御笔、笔架、朱墨、水注、仪扇、珮琅仙鹿、珮琅鼎、珮琅香炉、铜鼎等。这些珍贵文物都被历史博物馆收藏。

清帝祭孔的珍贵祭器也成为历史博物馆重要藏品，“鎏金银爵一，鎏金铜爵一，银勺一，鎏金铜炉一，鎏金香靠一，锡香盒一”^⑨等。

4. 匾联及书版等

孔庙国子监大成殿辟雍中的御书匾额楹联此次也被历史博物馆作为藏品带走，后部分归还。在1928年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的《国立历史博物馆陈列室物品目录》中记载，在第五陈列室陈列着大成殿对联（木）4件，也就是乾隆皇帝御书的

两幅联：“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譬之宫墙。”由于目前没有见到国立历史博物馆带走孔庙国子监所有藏品的清单，无法断定具体带走了哪些匾联，但推断应该不只大成殿这两副对联。

历史博物馆共带走国子监文物57127件，书版在这批文物中占绝大多数，初步估计约有56000片左右。国子监御书楼曾保存大量书籍和雕版，科举时代“监本”书籍是学子必读之书。书版被带走后存放于端门内东朝房中。

三、国子监文物在午门展出

1918年，历史博物馆搬至午门、端门，“将午门城楼及两翼亭楼辟为陈列室，精选藏品，依类陈列，开放10余个陈列室供观众参观”^⑩，国子监大量文物参与展出。

在傅斯年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中详细记述了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上的陈列情况（图四、图五）。国子监文物陈列情况如下：

第三室各种石刻砖附……其性质可分为五种：……4、国学旧存石刻 国学旧存各项石刻中移归历史博物馆保管的有《老彭观井图》（宋陈靖铭明刻）、《兰亭序》（赵孟頫临定武本）、《乐毅论》（赵孟頫临本刻在兰亭序背）、《争座位帖》（赵孟頫临本）、《古文孝经》（明蔡毅中集注）、《丁香花诗并序》（康熙五十七年谢履忠集《圣教序》《兴福寺》二碑字刻石）、清仁宗御制《喜雨山房记》（铁保书）、《乐毅论》（金特赫临）、石鼓文（光绪十二年长白盛氏据阮氏旧藏宋本重刻石）等十种，共计刻石二十一方。^⑪

第五室 本室分为东中西三部。东



图四 国立历史博物馆第三陈列室陈列的国学石刻

部明清档案殿试策官印，中部周代彝器国学旧有器物，西部明器及各种史地模型图标。……东部……清代官印 国子监印，国子丞印……中部 1、周代彝器 召仲簋、康侯鼎、内言卣、素洗、雷纹壶、牺首罍、子爵、盟簋、牺尊、雷纹觚，共二件，原为故宫藏品，清乾隆三十四年移送国学，本馆成立接收保管。2、国学旧存器物 清高宗临雍所用器物，悉陈于此，计有御座、御案、围屏、炉鼎、笔墨、表章经学之宝以及祀孔所用玉铜、锡竹各项礼器，国子监图等，共计一百七十一件。西部……国子监移馆之大成殿七楹模型、九楹模型……^②

以上各室陈列物品，共计二千九百五十八件，其中贵重之件如周代彝器……^③

从国子监文物展出数量、陈列位置（国子监文物大部分陈列在午门中间的第五展室）可见，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之初国子监旧有文物是其重要藏品。



图五 国立历史博物馆第五陈列室中部陈列的周代彝器

四、国子监文物南迁

1931年，日本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华北岌岌可危，为保护华夏文物，始有文物南迁之计划。历史博物馆将一部分重要文物装箱南迁，其中国子监一些珍贵文物也参与南迁。

1. 周代彝器

1933年3月15日，10件周代彝器分装两个木箱，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参加第三批古物南迁。其中牺首罍、雷纹壶、雷纹觚、子爵、素洗装一箱，盟簋、召仲簋、牺尊、康侯鼎、内言卣装一箱^④。

清颂铜器交由故宫博物院同第三批古物南运……清颂铜器已由历史博物馆于本月十五日付古物专车南运。清颂国子监古铜器共计十件，自民国元年以来即归本馆妥慎保管，现因世局不靖，已于本月十五日分装两木箱，交由运输故宫古物专车南运。^⑤

2. 其他南迁文物

除周代彝器外，国子监的“表章经学之宝”“铜鼎国子监旧存贰座”^⑥（疑为辟雍前铜鼎）也参与了文物南迁。

五、国子监文物现状

民国时期，国家动荡，战乱频仍，作为历史博物馆藏品的国子监文物也四处颠簸，命运各异，散落各处。1949年之后，国家稳定，国子监文物收藏在各个博物馆，默默诉说着自己的前世今生。

1. 周代彝器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迁文物陆续运回南京。1946年9月12日，7000余箱文物全部转移到重庆，再由重庆陆续运回南京。1948年国民党战场节节失利，国民政府行政院向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等单位下达紧急命令，要求将珍贵文物分批运往台湾。精品文物先后分三批运往台湾。

“1949年1月27日，第三批154箱文物运往

台湾。这些文物中包含原藏于历史博物馆的一些珍品，如周代的10件彝器……”^⑪

对日抗战期间，甫成立的中央博物院在四川作藏品登记的工作。民国三十三年，国子监十件铜器皆正式编目登录，典藏号分别为J·W·一一九一—三三至J·W·一二〇〇—三三。民国三十五年，胜利还都，民国三十七年，古物再登旅途，播迁来台。^⑫

10件周代彝器到达台湾后，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至今。

2. 书版

5万余件国子监书版被带走后最初收藏于历史博物馆端门内东朝房中。1950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并对馆内藏品进行了一次清查，“在二十三、四万件的文物中，清代的书版（木刻的印刷板子）就占了十九万件”^⑬。19万件书版大部分是原故宫武英殿收藏的《大藏经》，其中也包括国子监明清书版。“据历史博物馆的老同志回忆，这19万块书版是以经书书版为主，但其中也包括不少其他殿版书的书版，如《国子监志》等。”^⑭储存保管如此庞大数量的书版，对历史博物馆无疑是一种压力和负担。1950年5月27日，北京历史博物馆给文化部文物局呈报（文件号为“历字第一二三号”）：“拟将清代殿本书版拨交故宫博物院保管，以便东朝房作为筹设中国原始共产社会陈列室需用。”文物局于1950年6月5日给北京历史博物馆做了批示同意殿本书版拨交故宫博物院。根据这一批示，历史博物馆于1950年7月27日正式将经书版片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并办理了移交手续^⑮。

原国子监御书楼储存的约56 000片明清书版，先由历史博物馆收藏，新中国成立后移交给故宫博物院保存。

3. 匾联

1918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搬迁至午门时，从国子监带走数方匾额楹联。

1935年孔庙大成殿经修缮后，管理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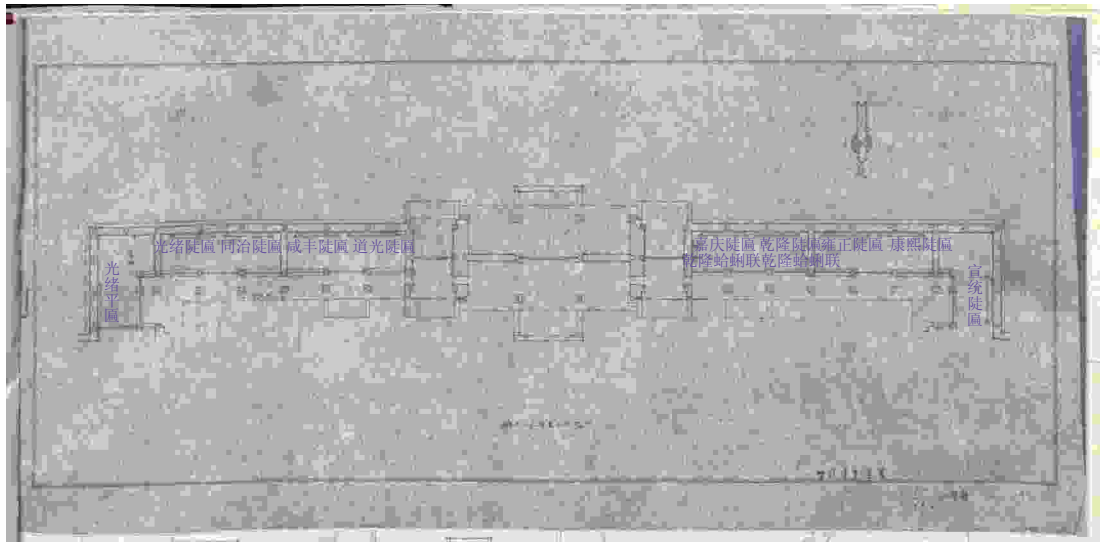
庙事务所准备将祭孔礼乐祭器及一切陈设恢复陈列。曾呈报当时的北平市政府，请求国立历史博物馆将所存匾联送回悬挂。同年9月23日北平市政府函呈内政部，请予协调处理。1936年内政部复函“……准此，查历史博物馆并非隶属本部，相应复请贵市政府就近向该馆接洽办理”^⑯。市政府于1936年11月23日训令转发内政部复函，令管理坛庙事务所协同办理。

1938年9月6日，历史博物馆向管理坛庙事务所发函：“查本馆保存孔庙匾联核与贵所单列名称相符，现仍在本馆保存陈列……”^⑰并附大成殿匾联名单：“清代孔庙大成殿悬联曰：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又 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譬之宫墙。匾九块：万世师表（康熙二十三年），生民未有（雍正五年），与天地参（乾隆二年），圣集大成（嘉庆四年），圣协时中（道光元年），德齐畴载（咸丰元年），圣神天纵（同治元年），斯文在兹（光绪元年），中和位于（宣统元年）。”^⑱

1938年9月8日，北京特别市公署指令准教育部“函复孔庙大成殿内匾联已令历史博物馆检交建设总署运回”^⑲。至此，孔庙大成殿两副楹联、九方御匾由国立历史博物馆归还孔庙。

根据民国三十二年（1943）国子监修缮工程图——太学门及两廊平面图（图六）上所示，国子监太学门廊房由西至东依次悬挂：光绪平匾、光绪陡匾、同治陡匾、咸丰陡匾、道光陡匾、嘉庆陡匾、乾隆陡匾、乾隆蛤蜊联、雍正陡匾、康熙陡匾、宣统陡匾。由此推断，历史博物馆归还的匾联在民国年间悬挂在国子监太学门两侧廊房内。

历史博物馆归还的这些匾联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都按原位悬挂。民国六年（1917）黎元洪效仿旧制亲笔题写了“道洽大同”匾，悬挂在大成殿内孔子牌位上方



图六 民国三十二年（1943）国子监修缮工程图——太学门及两廊平面图

正对大门处，也就是大成殿内正中“万世师表”匾原悬挂的位置。1979年，首都博物馆在北京孔庙成立，1983年，首都博物馆准备恢复大成殿原貌，对外开放。清代其他8位皇帝御匾都按照原位悬挂，只有康熙“万世师表”匾不知如何安放：如果放回原处，黎元洪“道洽大同”匾就没有位置；黎元洪“道洽大同”匾悬挂于民国初年，见证了那段历史，摘掉也不符合历史。经过专家的商议，最后决定：黎元洪“道洽大同”匾不动，康熙“万世师表”匾移至大成殿外前檐高悬。

4. 《古文孝经》石刻和《老彭观井图铭》石刻

1918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带走国子监珍贵石刻21方。而其中明天启年间的《古文孝经》石刻和明万历年间的《老彭观井图铭》石刻现收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国子监《古文孝经》石刻共两方，“均高57厘米，宽180厘米，厚16厘米。……二石石面均有多处风化漫漶，第二石左上角残缺，下部泐甚”^⑥。关于此石刻，《明代北京国子监〈古文孝经〉刻石考》^⑦一文做过详细的考证。文中对此石刻赞誉极高：“石上文字系集虞世南书迹

而成，观之字体平和清雅，沉稳秀健，亦不失为了一件石刻书法艺术的佳品。”^⑧关于《古文孝经》石刻，《国子监志》有如下记载：“古文孝经石刻，凡二石。前云：‘明左春坊谕德、掌国子监司业事蔡毅中集注。’后云：‘唐著作郎、太子中舍人虞世南书。’疑取石经摹勒而别书集注于各章之下也。末云：‘天启三年，岁在癸丑，孟冬之吉，国子监丞金维基，博士张凤奇、徐牧、门洞开，助教董天允、姚士儒、孙世格、党修吉，学正顾民晷、蒋尚茂，典簿王象艮、典籍陈列全勒石。礼部儒士吴郡吴尚端集镌。’在西厢正堂，嵌置壁间。”^⑨

《老彭观井图铭》石刻（图七、图八）“高128厘米，宽64厘米，厚13厘米。……石刻为《彭祖观井图》线刻画，画左上方镌陈靖撰写的铭文。铭文5行，满行30字，正书”^⑩。在《国子监志》中也有此石刻的记载：“《老彭观井图铭》石刻，图作老彭观井，以绳系身树间，童子随后扶持，寓临深履薄意也。有宋陈靖四言铭一章，隶书。万历丁丑刻石。在东厢后堂壁间，南向。”^⑪

1918年，《古文孝经》石刻和《老彭观井图铭》石刻与国子监其他文物一起



图七 《老彭观井图铭》石刻



图八 《老彭观井图铭》石刻拓片

艺——中国明清家具珍品”中展出。国学旧存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向世人展示着国子监的历史和沧桑。

六、结语

“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建并直接管理的国家博物馆。”^①国子监作为历史博物馆最初馆址，国子监文物作为历史博物馆馆藏基础，开启了中国新式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的大门。历史竟然也会留下伏笔，近百年后的2008年，在昔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之地成立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新世纪，孔庙和国子监真真切切地要以博物馆的姿态展现给世人。



图九 乾隆临雍讲学所用紫檀御案

迁至午门、端门。“九一八”事变后，历史博物馆一些重要文物参与了南迁，而这两种石刻可能没能南迁，一直存放在天安门、午门、端门一带。2000年3月30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从天安门管委西廊仓库处征集到该两种石刻，并保存至今^②。

5.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国学旧存

除了10件周代彝器、明清书版、匾联及《古文孝经》石刻、《老彭观井图铭》石刻外，其余被筹备处带走的国子监文物，现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原国子监辟雍殿内乾隆临雍讲学所用紫檀御案（图九）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花木

①⑨⑩③①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②⑮⑰⑳㉑㉒㉓ 李守义：《民国时期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品概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

③ 《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规程》（1927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83页。

④⑦⑧ 《教育总长请拨国子监筹设历史博物馆呈并大总统批》（1914年6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4页。

⑤⑪ 《历史博物馆》，《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民国卷·法规资料汇编（三）》，十洲古籍书画社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

⑥ 《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册，第3页。

⑫ 即万国书业雕刻及他种专艺赛会。

⑬ 《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册，第87页。

⑭ 文中“国子监文物”专指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国子监文物。

⑮ (清)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23页。

⑯ 《馆藏周代彝器记》,《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1926年第1册。

⑰⑱ 张临生:《真赝相参的国子监周范十器》,《故宫文物月刊》1989年4月第七卷第一期。

⑲ (清)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12页。

⑳ 李文诒:《北平学术机关指南》,北平图书馆协会,1933年,第117-120页。

㉑⑲⑳ 张振新、杨文和:《谈国学〈兰亭〉石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4年第6期。

㉒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87页。

㉓ (清)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37页。

㉔ 王连起:《〈兰亭序〉重要传本简说》,《紫禁城》2011年第9期。

㉕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㉖ (清)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87页。

㉗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4-98页。

㉘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

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

㉙ 《国子监孔庙周石鼓等件南运》,1933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 057-001-01032。

㉚⑳㉛ 李之檀:《满文〈大藏经〉经版今安在》,《紫禁城》2001年第4期。

㉜ 《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关于历史博物馆所存孔庙大成殿匾联给市政府的呈及市政府的训令》,1936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57-001-00456。

㉝⑳㉞ 《孔庙存礼乐祭器在大成殿陈列需派守护及物品清册》,1938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 057-001-01010。

㉟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石刻拓片编目提要》,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506页。

㊱⑳ 张云燕:《明代北京国子监〈古文孝经〉刻石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4期。

㊲ (清)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43页。

㊳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石刻拓片编目提要》,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563页。

㊴ (清)文庆、李宗昉等:《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42页。

㊵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石刻拓片编目提要》,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506、56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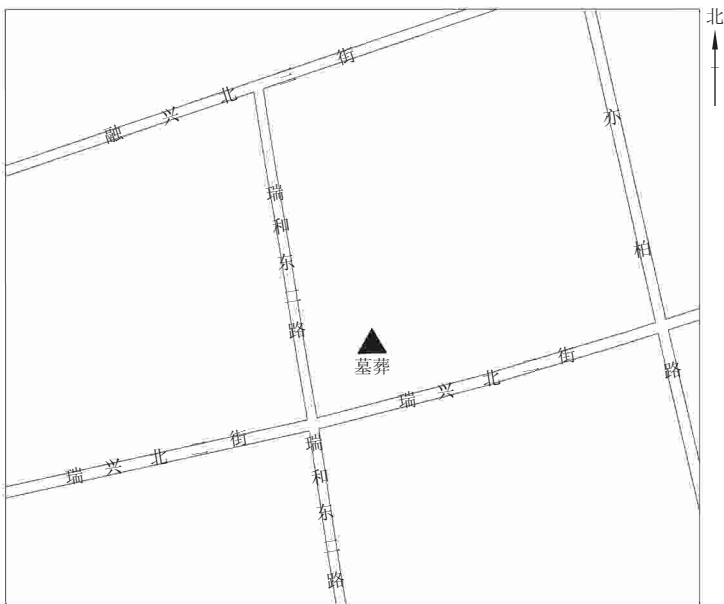
(作者为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十二平方公里项目南区N14地块 汉、唐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十二平方公里项目南区N14地块墓葬发掘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太和庄东村东南部，东为亦柏路，西邻瑞和东二路，南邻瑞兴北二街，北为融兴北三街（图一）。为配合十二平方公里项目南区N14地块工程建设，2015年10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项目占地范围所发现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座，其中汉代墓葬5座，编号为M1~M5；唐代墓葬1座，编号为M6（图二）。现将此次发掘墓葬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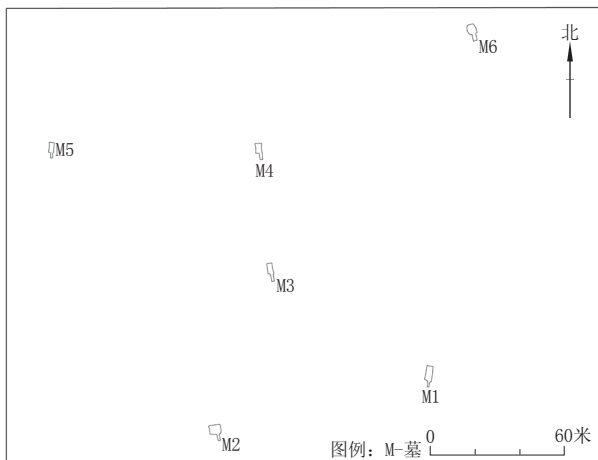


图一 墓葬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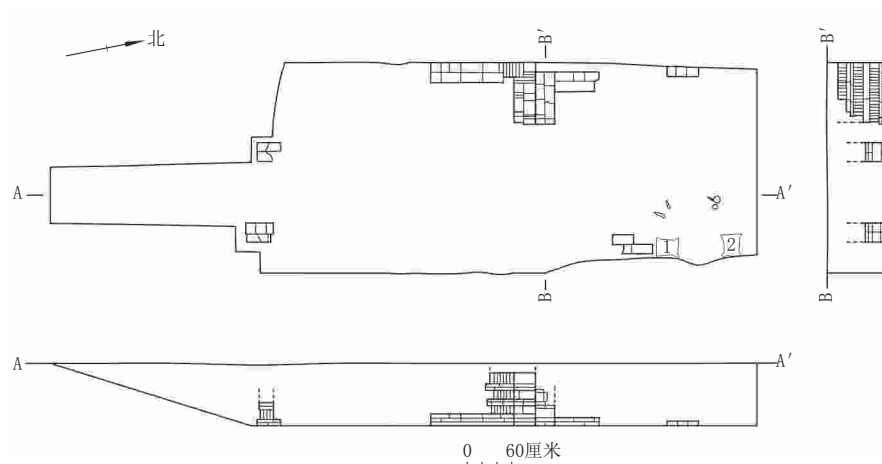
一、汉代墓葬

M1 位于发掘区东南部，南北向，方向 190° 。平面呈刀形，竖穴土圹砖室墓。由于破坏严重，券顶已不存。墓圹南北长9.5米，东西宽0.75~2.83米，深0.84米。由墓道、墓门、前室、后室四部分组成（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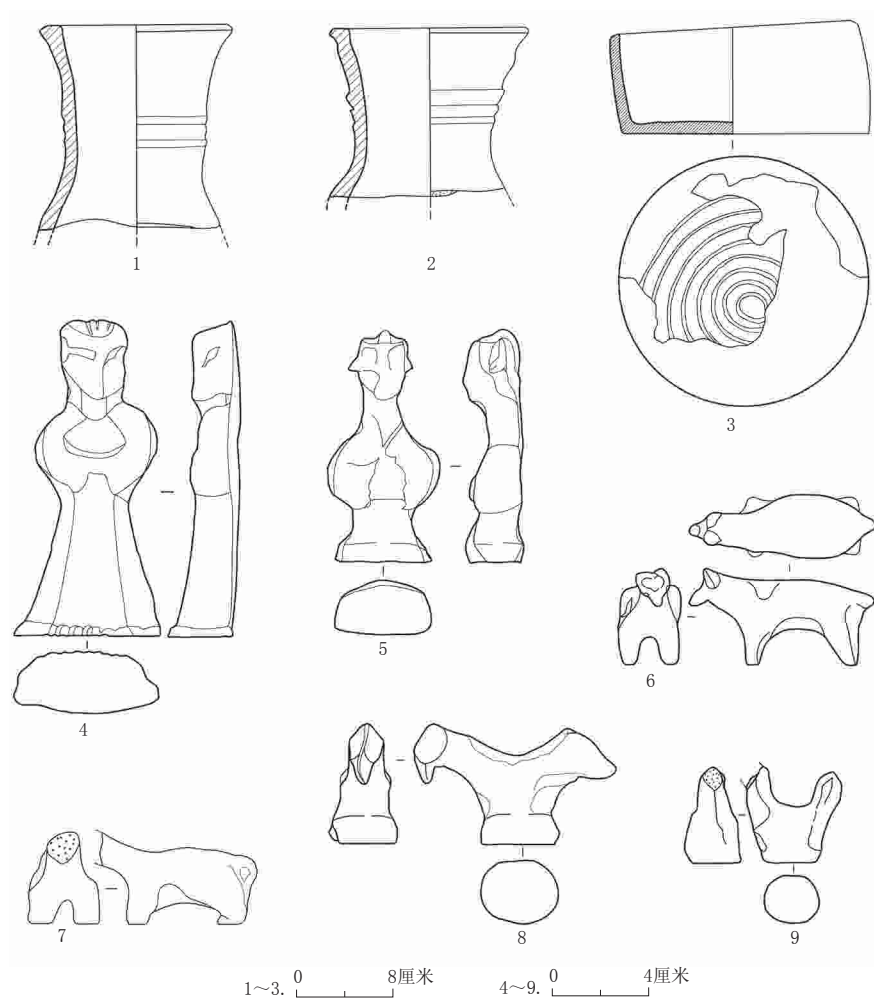
墓道：位于墓门南部。平面呈梯形，南北长2.7米，东西宽0.75~0.87米，两壁垂直平整。墓道呈斜坡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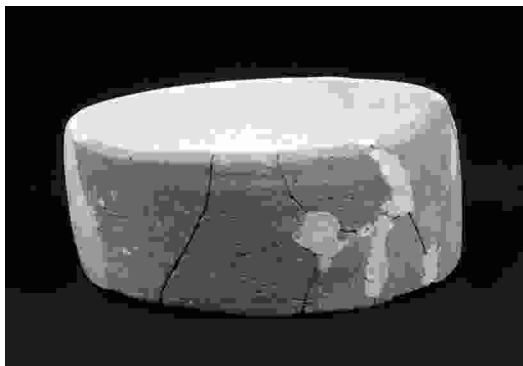
图二 墓葬发掘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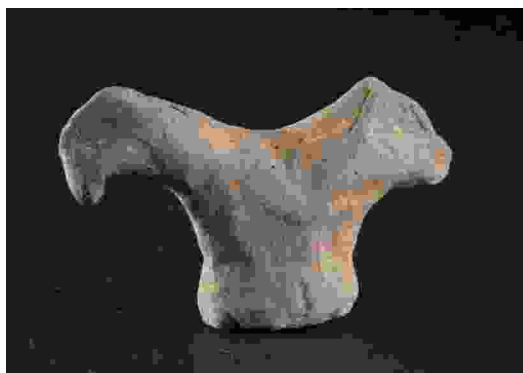
图三 M1平、剖面图
1、2.陶壶



图四 出土陶器
1、2.陶壶 (M1:1、M1:2) 3.陶奩 (M2:1) 4、5.陶俑 (M2:2、M2:3) 6、7.陶狗 (M2:4、M2:5) 8、9.陶鸡 (M2:6、M2:7)



照片一 陶奩 (M2:1)



照片四 陶鸡 (M2:6)



照片二 陶俑 (M2:2)



照片三 陶狗 (M2:4)

坡度 17° ，坡长2.8米，深0.84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

墓门：位于前室南部。东西宽0.82

米，南北进深0.37米，残高0.31米。两壁残墙为青砖两卧一磬向上砌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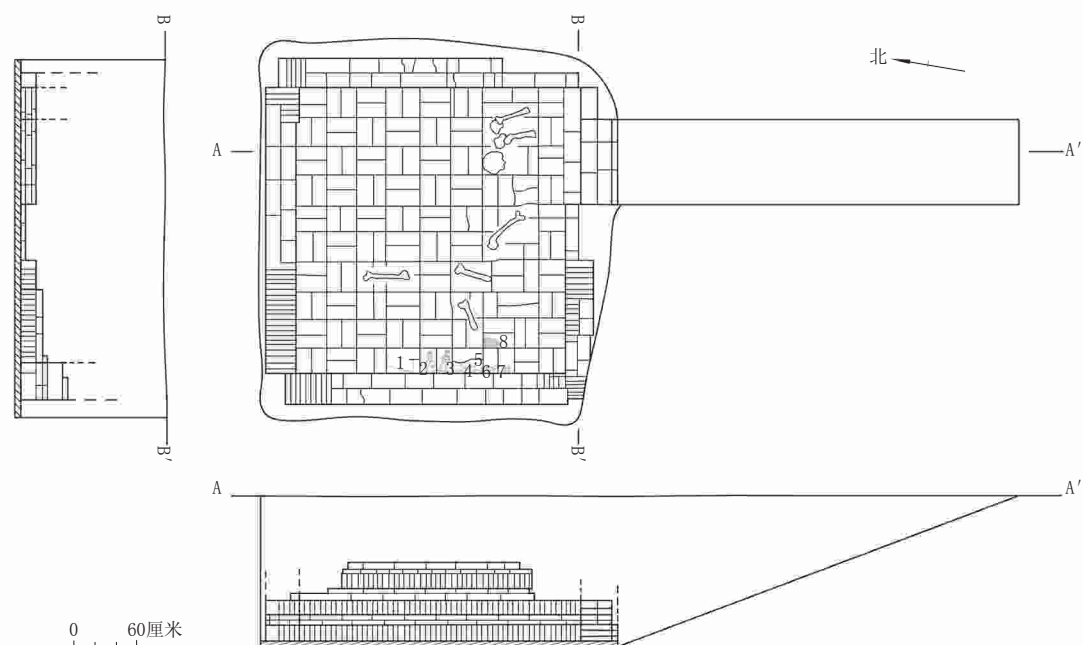
前室：位于墓门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82米，东西宽2.82米，现深0.71米。顶部拱券结构已毁，现存墓室西、北两壁残墙，用长0.32、宽0.16、厚0.05米青砖两卧一磬向上砌筑。北墙残长0.83米，西墙残长1.41米，残高0.16~0.71米，墙厚0.32米。

后室：位于前室北部。平面呈梯形，南北长2.97米，东西宽2.5~2.82米，现深0.71米。现存墓室西、南两壁残墙，用青砖两卧两立一卧向上砌筑。南墙残长0.7米，西墙残长0.85米，残高0.11~0.49米，墙厚0.32米。室内东北部仅存零散碎骨，葬式、性别不明。室内东北部出土陶壶2件。

陶壶 2件。泥质灰陶。盘口，平沿，尖圆唇，长束颈，颈部饰两周凸弦纹，下体残。轮制。M1:1，口径16厘米，残高16.8厘米（图四，1）。M1:2，口径16.8厘米，残高14厘米（图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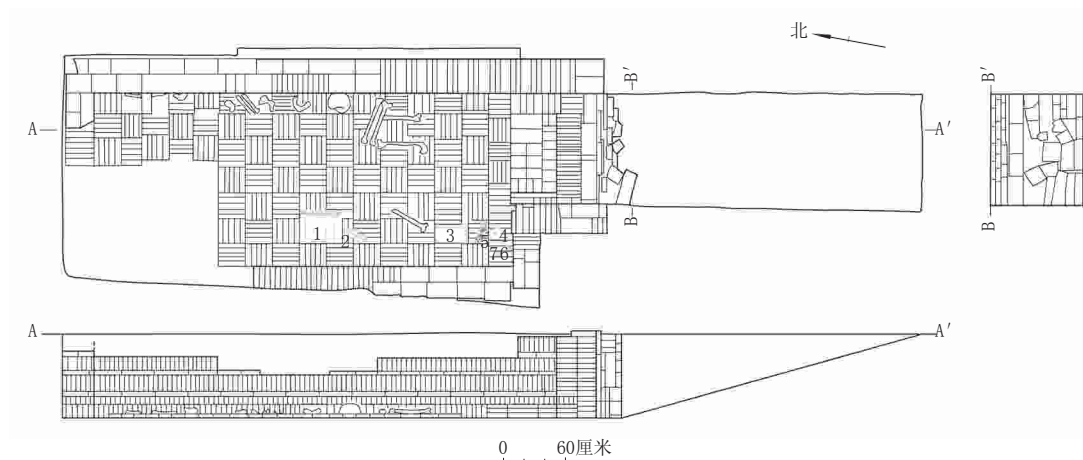
M2 位于发掘区西南部，南北向，方向 190° 。平面呈刀形，竖穴土圹砖室墓。由于破坏严重，券顶已不存。墓圹南北长7.24米，东西宽0.81~3.64米，深1.43米。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图五）。

墓道：位于墓门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8米，东西宽0.81米，两壁



图五 M2平、剖面图

1.陶奁 2、3.陶俑 4、5.陶狗 6、7.陶鸡 8.铜钱



图六 M3平、剖面图

1.陶房 2.陶狗 3.石圭 4.铜扣 5.铅俑 6.料饰 7.铜钱

垂直平整。墓道呈斜坡状，坡度 21° ，坡长4.1米，深1.43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

墓门：位于墓室南部。东西宽0.81米，南北进深0.35米。封门仅存三层，用卧砖向上砌筑，残高0.16米。

墓室：位于墓门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3米，南北宽3.36米，现深0.39~0.75米。顶部拱券结构已毁，现

存墓室残墙，四壁用长0.31、宽0.15、厚0.05米青砖在铺地砖上一牚一卧、一牚两卧向上砌筑。四墙残高0.39~0.75米，厚0.3米。室内中南部残存头骨及零散肢骨，葬式、性别不明。室内靠西壁墙出土陶奁1件，陶俑、陶狗、陶鸡各2件，铜钱18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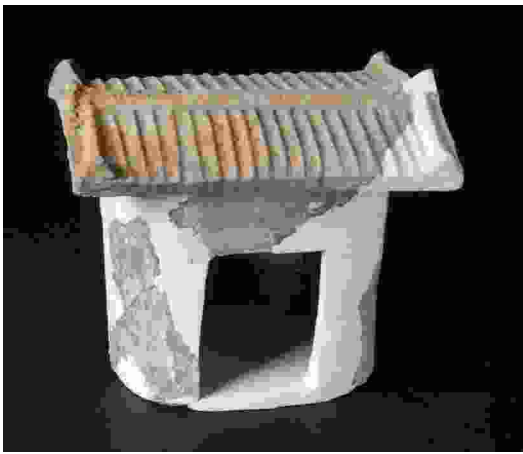
陶奁 1件。M2：1，泥质灰陶。直口，斜平沿，圆唇，斜弧腹，平底，底部



照片五 M3

压印数周绳纹。轮制。口径21厘米，腹径21.6厘米，底径21厘米，高8.4~9.4厘米（图四，3；照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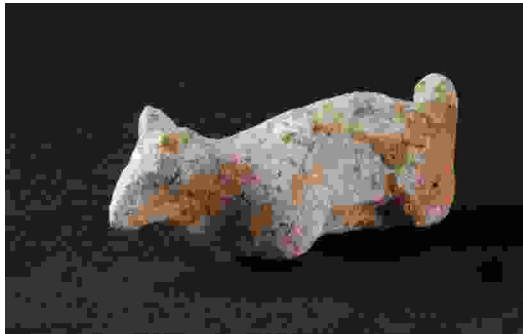
陶俑 2件。手、模兼制。M2：2，泥质灰陶。站立状，头戴官帽，斜坡状顶，身穿束腰官袍，垂于足上，双手拢袖，环抱于胸前，椭圆形底座。高13.1厘米（图四，4；照片二）。M2：3，站立状，头戴官帽，面部向前，身穿抵领官袍，束腰，双手拢袖，环抱于胸前，椭圆形底座。高9.6厘米（图四，5）。



照片六 陶房（M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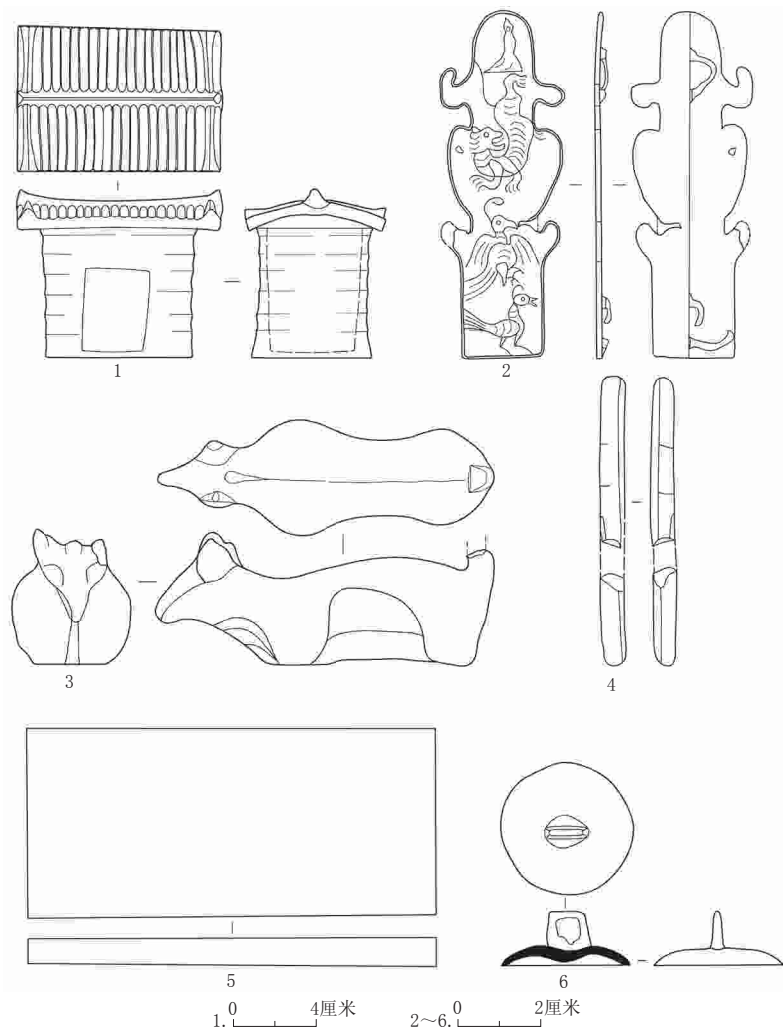
陶狗 2件。手、模兼制。M2：4，泥质灰陶。直立状，竖耳尖嘴，颈部前伸，前、后双腿叉开，后腿强健有力，身体上弓，筒状肋，短尾，肩部遗有手捏痕。长7.8厘米，高4厘米（图四，6；照片三）。M2：5，头残，卷尾向下，腹部有手捏痕。残长6.5厘米，残高3.8厘米（图四，7）。

陶鸡 2件。手、模兼制。M2：6，泥质灰陶。直立状，长颈前伸，头部低垂，尖喙，椭圆形双眼，长尾下卷，椭圆形座。长8.5厘米，高5厘米（图四，8；照片四）。M2：7，头残，作卧状，昂首，长尾上翘，椭圆形座。残长4厘米，残高4厘米（图四，9）。



照片七 陶狗（M3：2）

五铢 18枚。平钱，圆形，方穿，正背面郭缘较窄，正面篆书“五铢”二字，顺读。“五”字两股交笔弯曲，上下两横笔对称齐平。“铢”字金旁上部三角形，下部四点竖笔较短，朱字上下均圆折，中部竖笔细长齐平，横笔略粗。M2：8-1，钱径2.54厘米，穿径0.9厘米，郭厚0.13厘米（图一四，1）。M2：8-2，钱径2.57



图七 出土器物

- 1.陶房 (M3:1) 2.铅俑 (M3:5) 3.陶狗 (M3:2) 4.料饰 (M3:6)
5.石圭 (M3:3) 6.铜扣 (M3:4)

厘米，穿径0.93厘米，郭厚0.14厘米（图一四，2）。

M3 位于发掘区中南部，南北向，方向 191° 。平面呈刀形，竖穴土圻砖室墓。由于破坏严重，券顶已不存。墓圻南北长8.3米，东西宽1.13~2.14米，深0.81米。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图六；照片五）。

墓道：位于墓门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9米，东西宽1.13米，东西两壁垂直平整。墓道呈斜坡状，坡度 16° ，坡长3.01米，深0.81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

墓门：位于墓室南部。东西宽1.06米，南北进深0.59米，残高0.84米。封门用青砖两立两卧、三立三卧向上砌筑。

墓室：位于墓门北部。平面呈梯形，南北长5.19米，东西宽1.68~2.51米，现深0.84米。顶部拱券结构已毁，现存墓室残墙，四壁用长0.32、宽0.16、厚0.05米青砖在铺地砖上一骹一卧向上砌筑，墙残高0.41~0.84米，厚0.33米。铺地砖用立砖一纵一横无序平铺。室内靠近东壁残存头骨及零散肢骨，葬式、性别不明。室内西南部出土陶房、陶狗、石圭、铅俑、铜扣、料饰各1件，铜钱1枚。

陶房 1件。

M3:1，泥质灰陶。悬山式顶，两坡饰对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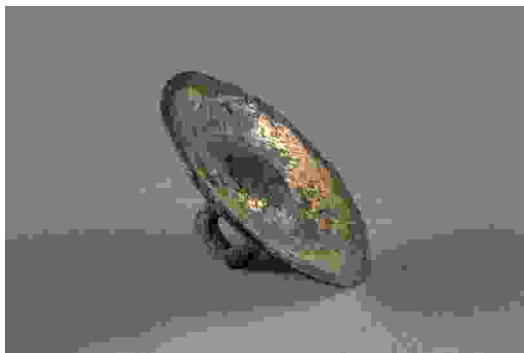
瓦垄，顶部起脊上翘，檐呈弧形，两端下垂，瓦垄近似三角形；体呈梯形，正面中部置近长方形门，体饰数周凹弦纹。模制。顶长19.6厘米，宽13.6~14厘米；体长15厘米，宽11.2~11.6厘米，壁厚1~1.6厘米，通高16.2厘米（图七，1；照片六）。

陶狗 1件。M3:2，泥质红陶。作卧状，双耳竖立，尖嘴，椭圆形双眼，前、后腿强健有力，体态健壮，尾残上卷。手、模兼制，前胸遗有手捏痕。长8.1厘米，高3.2厘米（图七，3；照片七）。

石圭 1件。M3:3，深灰色，长方



照片八 石圭 (M3:3)



照片九 铜扣 (M3:4)



照片一〇 铅俑 (M3:5)



照片一一 料饰 (M3:6)

形，侧面呈梯形。磨制。长9.8厘米，宽4.5厘米，厚0.6~0.7厘米（图七，5；照片八）。

铜扣 1颗。M3:4，通体鎏金，部分已脱落，蘑菇状，中间凸起，扣抵呈梯形。模制。直径3.2厘米，通高1.3厘米（图七，6；照片九）。

铅俑 1件。M3:5，站立状，头戴官帽，双肩耸起，弧形垂下，右肩部有一圆形孔，束腰，腰部两侧向上翘起，垂直足下，胸部饰一只白虎，腰下部饰两只朱雀，侧面片状，背面遗有一道铸线，上下置“U”形环。模制。通高8.4厘米，厚0.1厘米（图七，2；照片一〇）。

料饰 1件。M3:6，残，黑色，两端呈圆弧形，体四棱状。模制。残长7厘米，厚0.4~0.5厘米（图七，4；照片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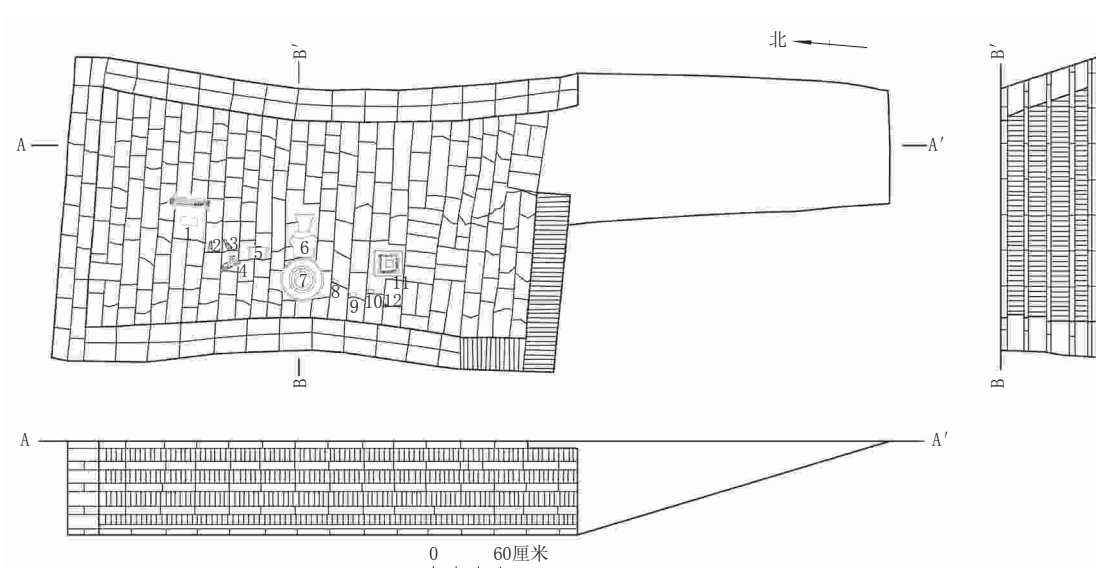
小泉直一 1枚。M3:7，小平钱，圆形，方穿，正背面郭缘较窄，正面篆书“小泉直一”四字，对读。钱径1.42厘米，穿径0.37厘米，郭厚0.13厘米（图一四，11）。

M4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南北向，方向185°。平面呈刀形，竖穴土圹砖室墓。由于破坏严重，券顶已不存。墓圹南北长7.36米，东西宽1.01~2.69米，深0.84米。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图八）。

墓道：位于墓门南部。平面呈梯形，南北长2.79米，东西宽1.01~1.35米，两壁垂直平整。墓道呈斜坡状，坡度17°，坡长2.92米，深0.84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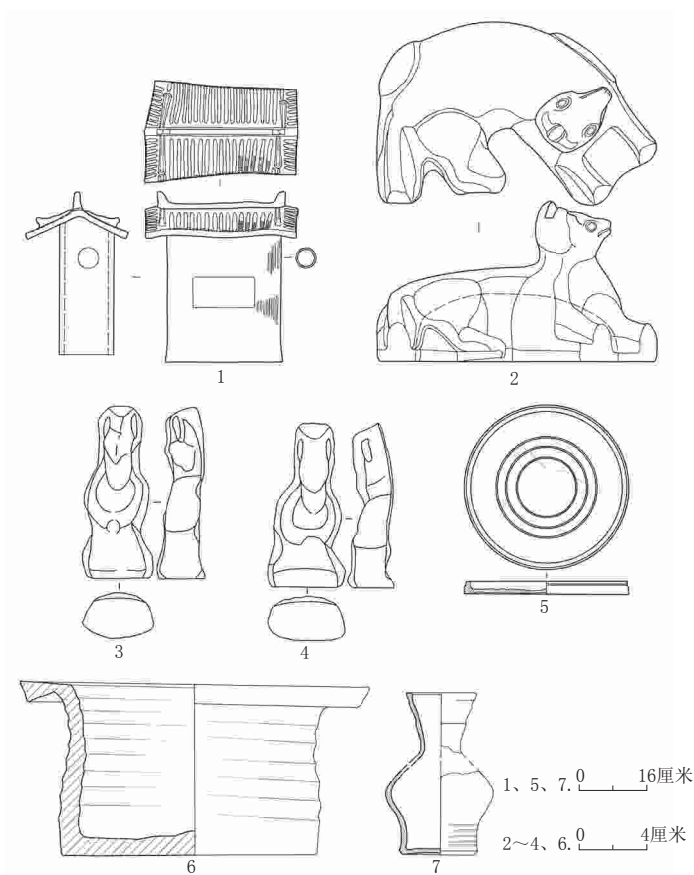
墓门：位于墓室南部。封门砖已不存，东西宽0.72米，南北进深0.3米，残高0.78米。

墓室：位于墓门北部。长方形室挤压变形，南北长4.57米，东西宽2.69米，现深0.84米。顶部拱券结构已毁，现存墓室残墙，四壁用长0.32、宽0.15、厚0.05米红砖在铺地砖上一蹇一卧向上砌筑，墙残



图八 M4平、剖面图

1.陶房 2、3.陶俑 4.陶狗 5.陶井 6.陶壶 7.陶案 8.陶釜 9、10.陶甗 11.陶厕 12.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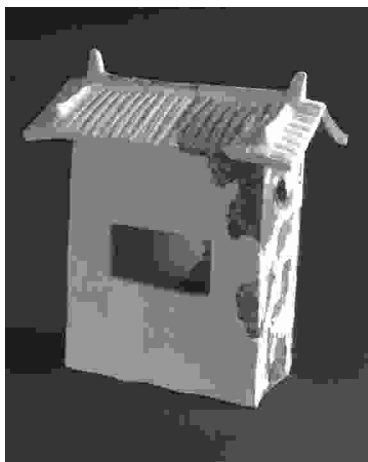
图九 出土陶器

1.陶房 (M4:1) 2.陶狗 (M4:4) 3、4.陶俑 (M4:2、M4:3)
5.陶案 (M4:7) 6.陶井 (M4:5) 7.陶壶 (M4:6)

高0.84米，厚0.3米。铺地砖用红砖两横两顺到五顺一横无序平铺。室内未发现骨架及棺木痕迹，葬式、性别不明。室内中西部出土陶房、陶狗、陶井、陶壶、陶案、陶釜、陶厕各1件，陶俑、陶甗各2件，铜钱10枚。

陶房 1件。M4:1，泥质灰陶。悬山式顶，两坡饰对称瓦垄，顶部起脊上翘，檐呈弧形，两端下垂，瓦垄近似三角形；体呈长方形，正面中部置近长方形窗，侧面左右置圆孔形窗，体局部饰数道绳纹。模制。顶长36厘米，宽20~24厘米；体长26.8厘米，宽12.6厘米，壁厚1.2厘米，通高40厘米（图九，1；照片一二）。

陶俑 2件。泥质灰陶。站立状，头戴官帽，斜坡状顶，低头俯视，身穿束腰官袍，垂于足上，双手拢袖，环抱于胸前，椭圆形底座。手、模兼制。M4:2，通高10.1厘米。



照片一二 陶房 (M4:1)



照片一三 陶俑 (M4:3)

米 (图九, 3)。M4:3, 通高9.6厘米 (图九, 4; 照片一三)。

陶狗 1件。M4:4, 泥质黄褐色陶。呈卧状, 尖嘴合拢, 双耳高耸, 双眼凸起, 颈部高昂, 头向后侧仰望, 前腿强健有力, 向外伸展, 后腿蜷缩侧卧, 长尾内卷, 体态健壮, 内部中空。模制。长16.4厘米, 高9.4厘米 (图九, 2; 照片一四)。



照片一四 陶狗 (M4:4)

陶井 1件。M4:5, 泥质

灰陶。井盘呈圆形, 侈口, 斜平沿, 尖圆唇, 束颈, 斜直腹, 平底。轮制, 通体遗有轮旋痕。口径20厘米, 腹径14.8厘米, 底径14.4厘米, 高9.6~10厘米 (图九, 6; 照片一五)。

陶壶 1件。M4:6, 泥质灰陶。残, 盘口, 斜平沿, 尖圆唇, 长束颈, 溜肩, 扁鼓腹, 平底内凹。颈部饰两周凸弦纹。轮制, 体遗有轮旋痕。口径16厘米, 腹径25.2厘米, 底径16.8厘米, 残高38厘米 (图九,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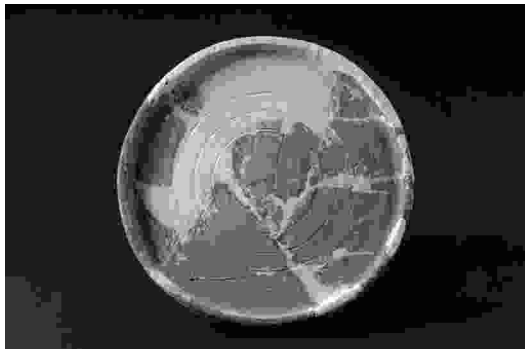


照片一五 陶井 (M4:5)

陶案 1件。M4:7, 泥质灰陶。平沿, 斜直壁, 平底微凹。沿下部饰一周凹弦纹, 内底部饰三周凹弦纹。轮制。口径38厘米, 底径38.6厘米, 高3厘米 (图九, 5; 照片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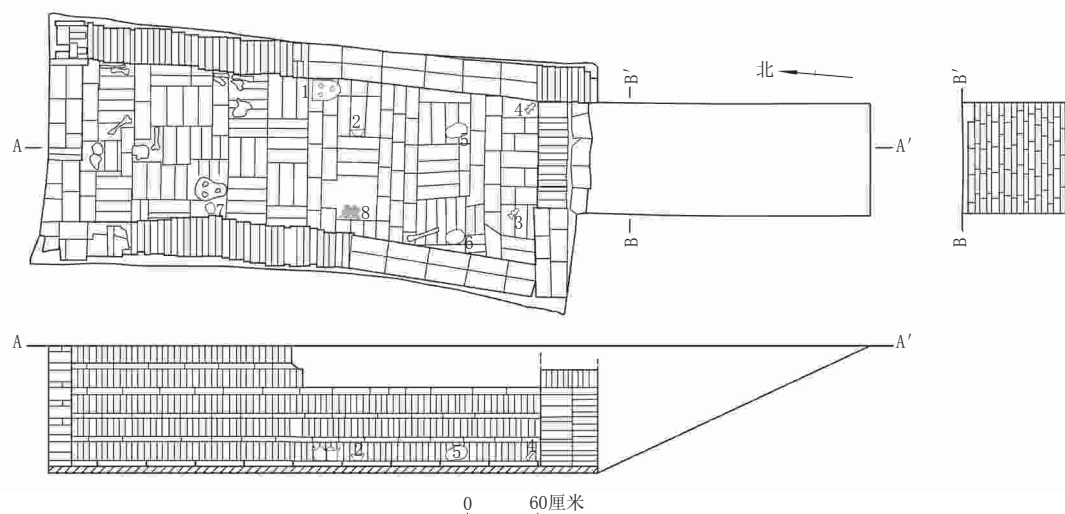
陶釜 1件。M4:8, 泥质灰陶。敞口, 斜平沿, 方圆唇, 深弧腹, 平底。轮制。口径6.6厘米, 底径2.7厘米, 高2.4~3厘米 (图一一, 1; 照片一七)。

陶甗 2件。泥质灰陶。敞口, 斜平沿, 方圆唇, 深弧腹, 平底。轮制。M4:9, 底部有五个圆形算孔。口径6.9厘米, 底径3厘米, 高3.3厘米 (图一一, 2)。M4:10, 底部有一圆形算孔。口径6.6厘米, 底径2.8厘米, 高2.6~3.1厘米 (图一一,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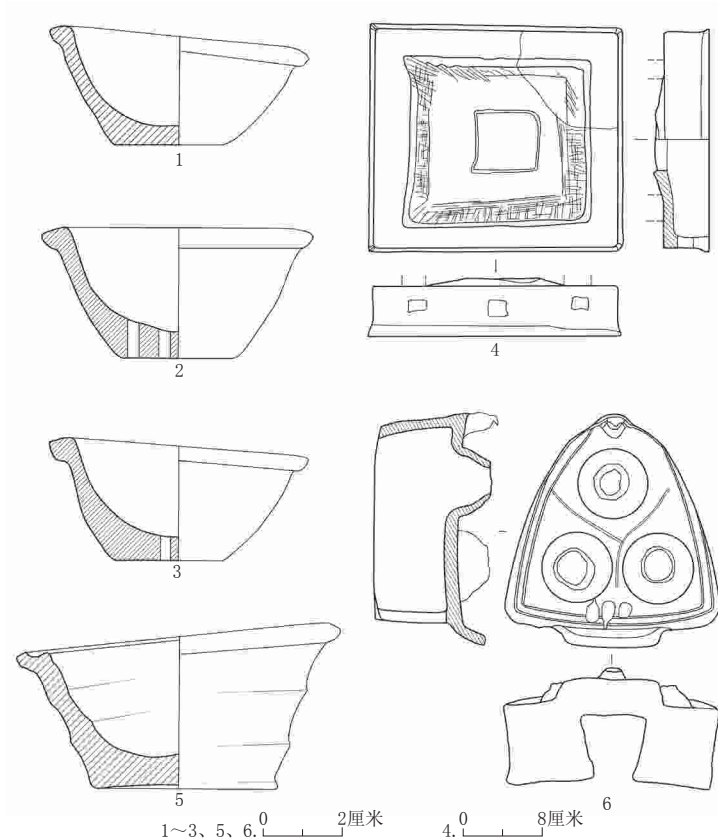


照片一六 陶案 (M4:7)

陶厕 1件。M4:11, 泥质灰陶。残, 上窄下宽, 漏斗状, 平面呈长方形,



图一〇 M5平、剖面图
1.陶灶 2.陶盆 3、4.陶甗 5~7.陶耳杯 8.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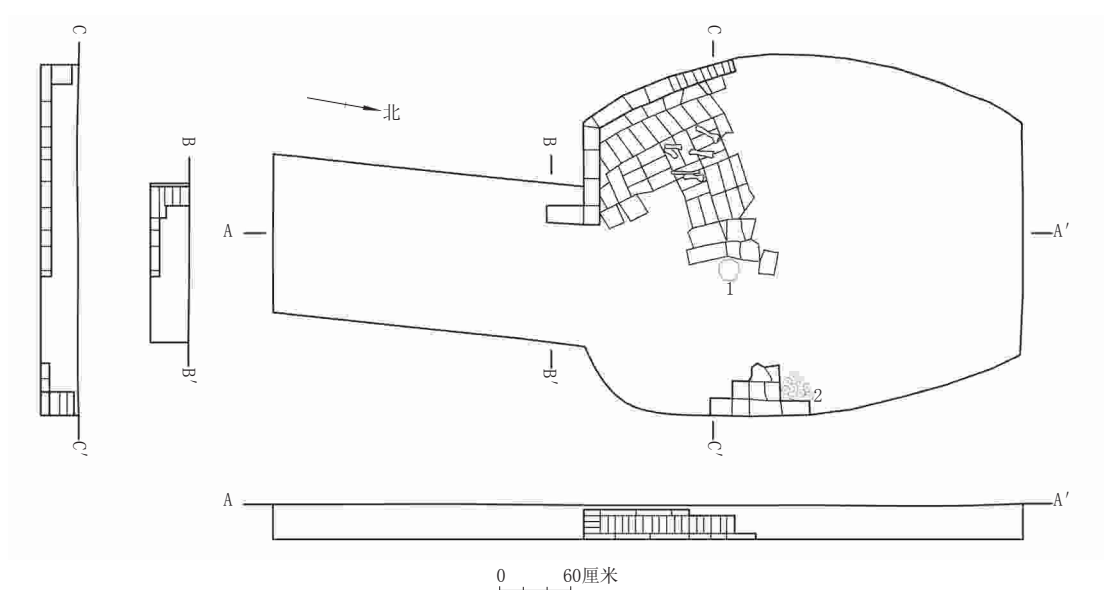
图一一 出土陶器
1.陶釜 (M4:8) 2、3.陶甗 (M4:9、M4:10) 4.陶甗 (M4:11)
5.陶盆 (M5:2) 6.陶灶 (M5:1)

25.6厘米，宽23厘米，残高5.6厘米（图一一，4；照片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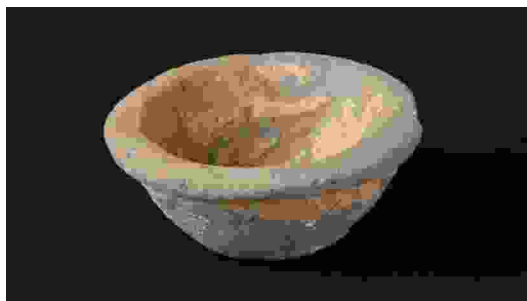
五铢 10枚。平钱，圆形，方穿，正背面郭缘较窄，正面篆书“五铢”二字，顺读。“五”字两股交笔弯曲，上下两横笔对称齐平。“铢”字金旁上部三角形，下部四点竖笔较短，朱旁上下均圆折，中部竖笔细长齐平，横笔略粗。M4:12-1，钱径2.47厘米，穿径0.9厘米，郭厚0.12厘米（图一四，3）。M4:12-2，钱径2.5厘米，穿径0.94厘米，郭厚0.14厘米（图一四，4）。M4:12-3，钱径2.54厘米，穿径0.98厘米，郭厚0.12厘米（图一四，5）。M4:12-4，钱径2.54厘米，穿径1厘米，郭厚0.1厘米（图一四，6）。

中部置斜坡状方形漏孔，侧面置三个近长方形孔，上部遗有连接痕。模制。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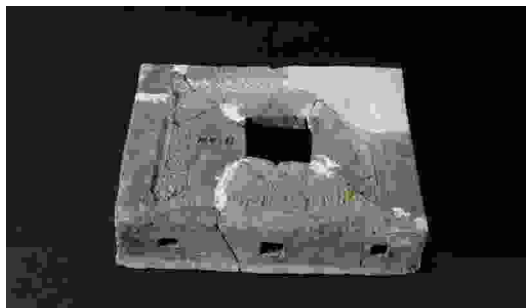
M5 位于发掘区西北部，南北向，方向185°。平面呈刀形，竖穴土圻砖室



图一二 M6平、剖面图
1.陶罐 2.铜钱



照片一七 陶釜 (M4:8)



照片一八 陶厕 (M4:11)

墓。由于破坏严重，券顶已不存。墓圻南北长7米，东西宽0.95~2.14米，深1.08米。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图一〇；照片一九）。

墓道：位于墓门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32米，东西宽0.95米，两壁垂直平整。墓道呈斜坡状，坡度25°，坡

长2.56米，深1.08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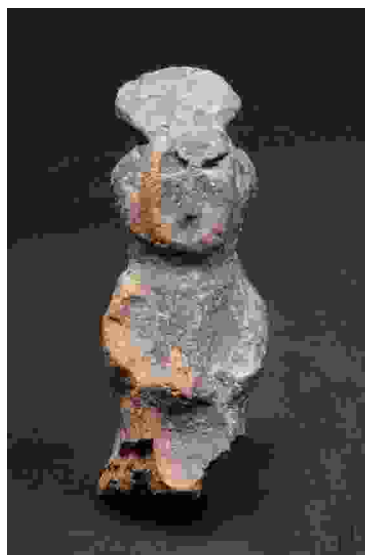
墓门：位于墓室南部。东西宽0.94米，南北进深0.46米，残高0.88米。封门用红砖向上平砌，残存15层。

墓室：位于墓门北部。长方形室挤压变形，南北长4.68米，东西宽2.14米，现深0.73~1.08米。顶部拱券结构已毁，现存墓室残墙，四壁用长0.32、宽0.16、厚0.05米青砖在铺地砖上一瓮一卧向上砌筑，墙残高0.73~1.08米，厚0.32米。铺地砖用红砖两横两顺到五顺一横无序平铺。室内东北及西南部残存零散肢骨，葬式、性别不明。室内东壁墙中部出土陶灶、陶盆各1件，南部近墓门处出土陶俑2件，西壁墙南、北及室东南部出土陶耳杯各1件，中西部出土铜钱44枚。

陶灶 1件。M5:1，泥质灰陶。灶体近呈三角形，上大下小，灶台内凹，上有三个圆形灶眼，呈“品”字形分布，中间饰“人”字形纹间隔，灶台前置斜直圆形烟囱，后面灶门呈梯形，上置弧形斜坡状挡烟墙。模制。长23.6厘米，宽8~22厘米，高12.2厘米，壁厚1.2厘米（图一一，6；照片二〇）。



照片一九 M5



照片二二 陶俑 (M5:4)



照片二〇 陶灶 (M5:1)



照片二三 陶耳杯 (M5:5)



照片二一 陶盆 (M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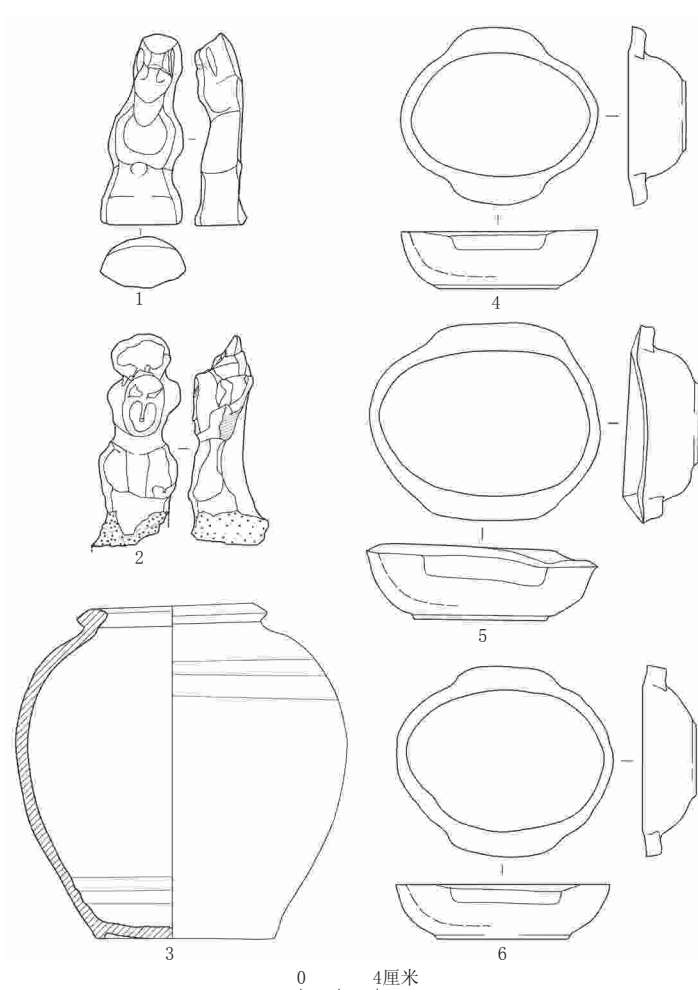


照片二四 陶罐 (M6:1)

陶盆 1件。M5:2, 泥质灰陶。敞口, 凹沿, 尖圆唇, 深弧腹, 平底内凹。轮制, 通体遗有轮旋痕。口径8.2厘米, 底径4.6厘米, 高3.4~4.2厘米 (图一一, 5; 照片二一)。

陶俑 2件。泥质灰陶, 手、模兼制。M5:3, 站立状, 身体侧倾, 头戴官帽, 斜坡状顶, 低头俯视, 身穿束腰官

袍, 垂于足上, 双手拢袖, 环抱于胸前, 椭圆形底座。高10厘米 (图一三, 1)。M5:4, 残, 头系小冠, 椭圆形斜坡状顶, 头发向后盘绕拢起, 椭圆形脸, 月形双耳, 隆鼻, 身穿束腰官袍, 双手拢袖, 环抱于胸前。残高11.1厘米 (图一三,



图一三 出土陶器

1、2.陶俑 (M5:3、M5:4) 3.陶罐 (M6:1)
4~6.陶耳杯 (M5:5、M5:6、M5:7)

2; 照片二二)。

陶耳杯 3件。泥质灰陶。体似船状，敞口，平折沿，方圆唇，浅弧腹，口沿两侧附半月形双耳，椭圆形平底。模制。M5:5，长11厘米，宽10厘米，高3.2厘米，底长6.8厘米，底宽3.8厘米（图一三，4；照片二三）。M5:6，长11.6厘米，宽9.6厘米，高3.8厘米，底长6.6厘米，底宽4厘米（图一三，5）。M5:7，长11.2厘米，宽10厘米，高3厘米，底长6.8厘米，底宽3.8厘米（图一三，6）。

五銖 44枚。平钱，圆形，方穿，正背面郭缘较窄，正面篆书“五銖”二字，顺读。“五”字两股交笔弯曲，上下两

横笔对称齐平。“銖”字金旁上部三角形，下部四点竖笔较短，朱旁上下均圆折，中部竖笔细长齐平，横笔略粗。M5:8-1，钱径2.6厘米，穿径0.93厘米，郭厚0.1厘米（图一四，7）。M5:8-2，钱径2.55厘米，穿径0.96厘米，郭厚0.13厘米（图一四，8）。M5:8-3，钱径2.53厘米，穿径0.89厘米，郭厚0.13厘米（图一四，9）。M5:8-4，钱径2.56厘米，穿径0.93厘米，郭厚0.13厘米（图一四，10）。

二、唐代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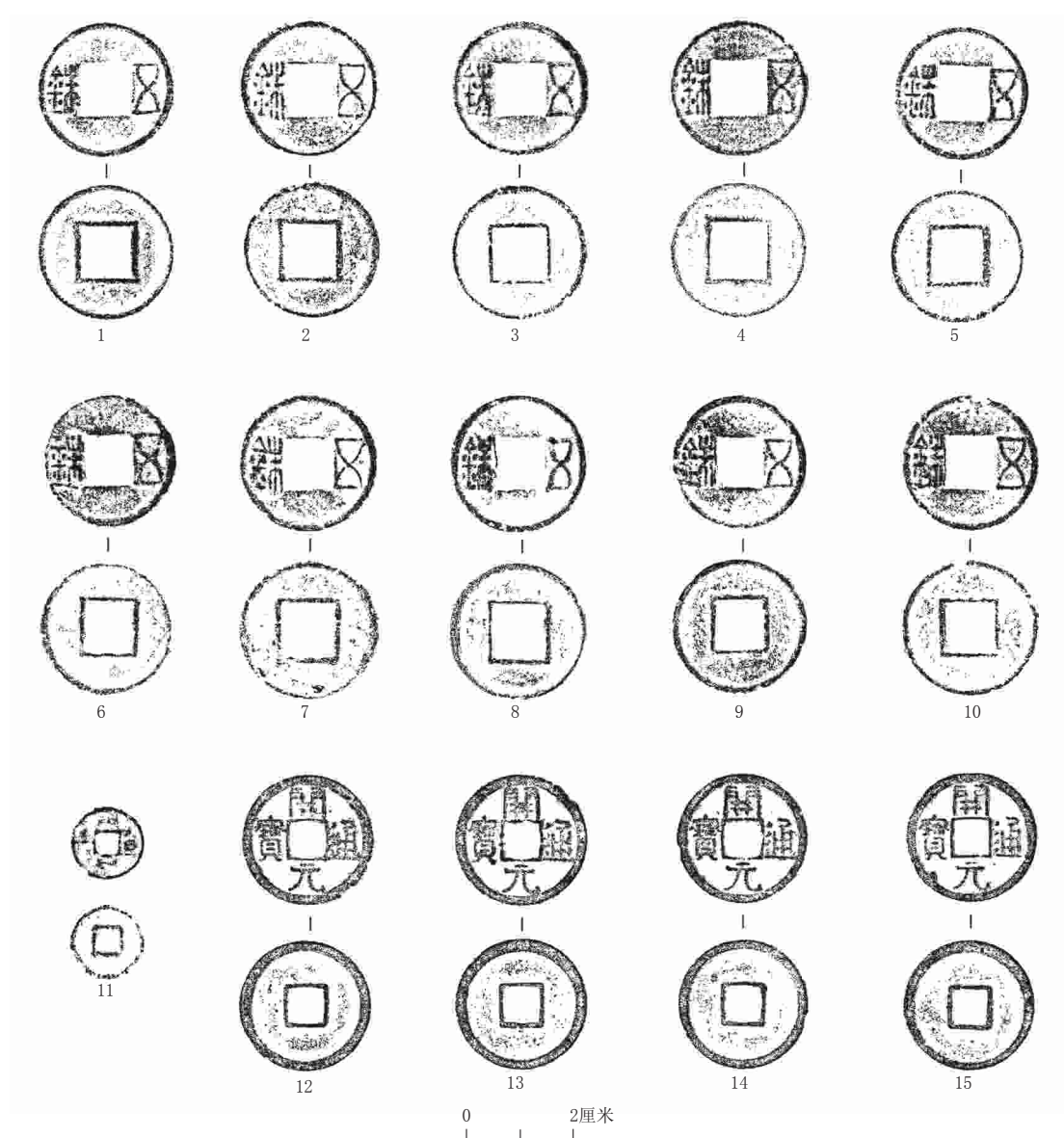
M6 位于发掘区东北部，南北向，方向170°。平面呈“甲”字形，竖穴土圹砖室墓。由于破坏严重，券顶已不存。墓圹南北长6.4米，东西宽1.35~1.98米，深0.31米。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图一二）。

墓道：位于墓门南部。

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66米，东西宽1.35米，深0.31米，两壁垂直平整。内填花土，土质较松。

墓门：位于墓室南部。东西宽1.04米，南北进深0.48米，残高0.33米。封门砖已破坏无存。

墓室：位于墓门北部。平面呈弧方形，南北长3.74米，东西宽1.37~3.1米，深0.25米。顶部结构已毁，现存墓室东西两壁残墙，用长0.3、宽0.15、厚0.05米青砖在铺地砖上一卧一垫向上砌筑，墙残长1.47米，残高0.25米，厚0.15米。残存铺地砖用青砖两横两顺、两顺一横错缝无序平铺。室内西南部发现零散肢



图一四 出土铜钱(拓片)

1~10.五铢(M2:8-1、M2:8-2、M4:12-1、M4:12-2、M4:12-3、M4:12-4、M5:8-1、M5:8-2、M5:8-3、M5:8-4) 11.小泉直一(M3:7) 12~15.开元通宝(M6:2-1、M6:2-2、M6:2-3、M6:2-4)

骨,葬式、性别不明。室内中部出土陶罐1件,东壁墙中部出土铜钱9枚。

陶罐 1件。M6:1,泥质灰陶。敛口,斜平沿,尖唇,束颈,圆肩,鼓腹,内圈足。轮制,腹上部遗有轮旋痕。口径10.2厘米,腹径17.4厘米,底径9.2厘米,高17.2~17.6厘米(图一三,3;照片二四)。

开元通宝 9枚。圆形,方穿,正背

面郭缘较窄,正面楷书“开元通宝”四字,对读。M6:2-1,钱径2.46厘米,穿孔0.67厘米,郭厚0.13厘米(图一四,12)。M6:2-2,钱径2.46厘米,穿孔0.66厘米,郭厚0.14厘米(图一四,13)。M6:2-3,钱径2.43厘米,穿孔0.7厘米,郭厚0.13厘米(图一四,14)。M6:2-4,钱径2.46厘米,穿孔0.63厘米,郭厚0.15厘米(图一四,15)。

三、结语

此次发掘汉墓均为刀形竖穴土圻砖室墓，除M1为双室外，余均为单室墓，结构简单，形制与房山南正^①、大兴亦庄^②、丰台王佐^③、房山窦店^④、平谷^⑤等同类墓葬相同或相近。随葬器物中，壶、奩、案、灶、盆、耳杯等生活类明器，房、井、厕等建筑类明器，鸡、狗等动物俑及人俑，均为北京东汉中期墓葬的典型器类。从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来看，此批墓葬年代应为东汉中期。此外，该批墓葬排列无序，相对分散，不似家族墓葬，结构简单的墓葬形制表明墓主人身份、地位不高，或为平民阶层墓葬。

唐代墓葬仅1座，破坏严重，其弧方形墓室与密云大唐庄^⑥同类墓葬形制相同或相近。有研究者认为，北京地区唐墓由早期的长方形发展到弧方形，到唐晚期的圆形风格被辽金元时期大多数墓葬所延续^⑦。墓中出土开元通宝为唐初铜钱。综合推断，此墓年代当在唐代中期前后。

十二平方公里项目南区N14地块墓葬的发掘清理，为研究北京地区汉、唐墓葬的结构特点、丧葬文化及该地区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发掘：张智勇 刘凤亮
绘图：安喜林 黄 星
修复：彭美娟 安喜林
摄影：张智勇 王殿平
执笔：张智勇 张东伟
曾祥江 孙 峥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房山南正遗址——拒马河流域战国以降时期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2003—2005年）》，科学出版社，2009年；《北京亦庄X11号地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丰台王佐遗址》，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窦店与长阳》，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⑤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平谷杜辛庄遗址》，科学出版社，2009年；《平谷汉墓》，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大唐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⑦ 刘耀辉：《试论北京地区唐墓》，《北京文博》1998年第4期。

石头“动”起来 文物也精彩

——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为例

石 奕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坐落于海淀区长河北岸白石桥东约500米处的明代真觉寺遗址内，该寺院建于明朝初年，高石台上建有5座小型石塔——金刚宝座。曾两次作为乾隆皇帝为崇庆皇太后庆寿的场所，真觉寺曾经大放异彩，但在清朝末年随着长河的衰落渐渐沉寂。1961年，“真觉寺金刚宝座”被评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得以修缮，而且以遗址为特色建立了一座收藏、研究、展示北京地区石刻艺术精品的专题性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目前博物馆收藏有北京地区的石刻藏品2600余件套，包括从汉代至今的不同时代、多种风格石刻文物藏品，其中不乏石刻艺术珍品、国家一级文物，例如珍贵的北朝造像、唐代墓志、金元石雕、清代石碑及名家书法刻石等，历史悠久，种类丰富。1987年10月，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为国家二级博物馆、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海淀区美育教育基地。

本文将通过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人文环境营造”“基本陈列设计特色”“临时展览与活动策划”“教育与服务功能建设”“体验式文创理念”5个方面来解读博物馆是如何让石头“动”起来，让观众参与进来，让环境与文化融合起来，让文物“活”起来的。

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人文环境营造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于2013年至2015年间，开展了庭院地面、地下管线、石碑基础加固、遗址防水抢险和东西两路的临建房屋改造、安防系统升级改造等多项基础工程和文物保护工程。与此同时，我们结合明代寺院遗址的环境特色和石刻文物体量庞大的特点，以露天陈列与展厅陈列结合的方式对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北京石刻艺术历史文化展”进行了全面改陈。历经3年时间、闭馆26个月，在北京市文物局领导和各界专家的支持帮助下，在全馆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博物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打造了中、东、西三路展线，中轴线展区包括4个展点单元，分别为真觉寺大殿遗址区域的“真觉年轮——真觉寺历史沿革展”、金刚宝座区域的“密宗神话——金刚宝座文化展”、金刚宝座背部绿化区的“法帖迷宫——诒晋斋、敬和堂法帖赏析”、后罩楼中厅的“石上真草——馆藏石刻拓片期刊展”。东线展区从南至北共有6个展点单元，分别为东部露天区域的综合碑刻区，耶稣会士碑刻区、祠墓碑刻区和东部碑廊的会馆石刻，金石书院里的“金声玉振——走近石文化”，后罩楼东厅的“铁壁传神——透过刀锋看笔锋”。西线展区从南至北共有5

个展点单元，分别为西部露天区域的陵墓石雕展区、寺观碑刻区和西部碑廊的墓志展区、金石走廊里面向儿童的“童蒙求我——娃娃看石刻”展区、后罩楼西厅的“石破天惊——从石头到石刻”。此次改陈我们总结了以往开放的实践经验，结合本馆员工特别是研究人员的研究心得和体会，吸取来自观众和各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解决了石刻藏品体量庞大笨重、古迹遗址在空间上有局限性等问题，进行合理利用，精心策划了这3条展览路线。

同时在设计展线过程中，我们考虑到观众对博物馆的要求与期盼越来越高，他们不仅希望博物馆是一个接受教育的社会课堂，还希望博物馆是一个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休闲娱乐场所。由此，我们的博物馆在保护利用古遗址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人文环境的营造。无论露天展区还是室内展厅，绝大部分的藏品与观众之间或以绿植或以散沙稍作分界，使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感受石文化，缓和了石刻生硬、冰冷的陌生感。每一个石刻展区在加固地基时预留绿化带，栽种了鸢尾、马蔺、金萱等宿根植物，与沉稳古拙的石刻相得益彰，产生了唯美的氛围。我们在中路展线上用四季常青的北海道黄杨围建的两块法帖迷宫，绿植之间镶嵌着铜制的馆藏《敬和堂》《诒晋斋》法帖，观众们在迷宫里寻路之间隙可以停下来赏析这些书法精湛、内涵丰富的法帖。

此外，考虑到进馆参观的游客需要一个可以休息、坐下来欣赏馆内景色的地方，博物馆里提供多处观众休息空间。塔前银杏树下休息区，巧妙地将保护古树的护栏做成一圈木椅，同时展出了明清两代名人咏颂古塔、银杏的诗句，供游人观赏学习；在娃娃看石刻展厅，我们在阳光走廊里设置了亲子休息区域，落地窗与古建筑花窗相互辉映，既增加了展厅与庭院的通透性，又把孩子及家长们的休息环境营造得明快而温暖。为了给孩子及家长提供安心舒适的博物馆休闲、体验学习的环境，

我们在博物馆文创商店外也安排了休息区，并配有遮阳伞与冷热饮服务，休息区还依据季节变化种植了不同的花草，每季观众在这里都可以赏心悦目。每到周三或是周末总是会有许多观众坐在这里，或安静地看着不远处的五塔，或看书谈天，或晒太阳、与猫咪玩耍。我们希望通过博物馆人文环境的整体营造与提升，使观众可以在这里静下来，停下来，在陶冶情操的同时能够放松身心。

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基本陈列的设计特色

在此次“北京石刻历史文化展”改陈的策划、实施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展览展示中的一些细节设计，人性化设计，增加了展览的互动与体验环节。我们希望在为观众营造出自然、亲切、轻松的参观环境时，使观众即使独自欣赏展览，也可体会理解到这些石刻藏品的艺术之美以及它们被赋予的文化内涵。

(1) 为了让观众走进石文化，领略石刻艺术之美，无论露天展区还是室内展厅，绝大部分的展品为开放式展出，有些甚至与观众零距离。结合石刻文物自身特性，我们去除以往惯用的玻璃展柜，使观众可以在藏品之间闲庭信步、身临其境地感受石刻文化与艺术。这样观众不仅能够仔细端详石刻上记录的历史内涵，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品味石刻上精湛的书法艺术和古代雕刻艺术。整个展览里看不到“请勿拍照”“请勿触摸”这样的牌子。我们希望观众在这里可以用眼睛看到、用手触摸到、用心体会到这些石刻文物的艺术之美。

(2) 展览展品的说明文字不再仅仅是展品名称、出土年代、征集地点、材质等固有的几项基本信息，除此之外还增加了对石刻文物的艺术特点、艺术风格的解读，还有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及藏品号等信息，即使是非专业的普通观众通过说明文字也可以大致理解并勾勒出文物历史背景、艺术风格，

文化面貌等方面的相关信息。

我们希望说明文字不仅要使观众读懂,还要能够使观众获得展品之外的信息,通过这些文字来帮助观众架起与过往、与物、与艺术对话的桥梁。

(3)展览中配合文物展示,设计多媒体23项,观众参与的互动项目16项,M-Beacon博物馆智能定位88件,对观众赏析品读展品起到了辅助作用。

此外,根据每个展厅的展品特点,我们从石刻石雕藏品上提取有代表性和艺术性的文字、图案、纹饰,制作成很多模板,并为观众免费提供彩笔和纸张,观众围着互动台,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模板,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作拓印。每个互动台旁边都有关于模板上纹饰、书法的相关细致解读,内容包括纹饰种类、雕刻手法、象征寓意等,观众完成了拓印,不仅可以把作品带回家,更重要的是通过互动体验加深了对石雕纹饰、造型及书法流派书体等文化艺术元素的理解。这个互动项目受到了不同国别、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喜爱。

此外,我们在展厅还为观众安排了拓片技法演示与互动,由拓片技师每天上下午各展演一次。

(4)为了帮助青少年观众体会石刻艺术的美、探究石刻文化的奥妙,博物馆专门开设了“童蒙求我——娃娃看石刻”儿童展厅,这在国内艺术类专题博物馆中是一种新的尝试。设计的互动单元包括“一笔画石雕”“大石出山记”“运石体验”“五塔拼图”“搭建石拱桥”“世界石头人柱”“翻版趣味问答”“拓彩色石雕”等,小观众们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了解石雕雕刻艺术、造型艺术,从而促进观众的感受力、创造性和批判精神。

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临时展览与活动策划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为了盘活馆藏文

物开创了期刊式展览模式、策划并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临时展览与活动,使博物馆的展陈更加多元化。

我们依据馆藏文物策划了4个主题的期刊展,以季度为单位,每季一期,这样一来,不仅使存放于库房的藏品有机会展现于观众面前,而且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观众带来常换常新的感受,吸引观众走进博物馆。目前四期展览分别为:

“馆阁气象——馆藏石刻拓片展”“玄宫档案——馆藏墓志拓片展”“笔走龙蛇——草书、楷书帖石展”“论晋春秋——清代成亲王永理藏历代名家书帖展”。每期展览我们还会加入一些与主题相关的互动体验环节与多媒体宣传片。

2016年以来,我们还举办了“名门之秀”摄影特展、“花木邂逅——馆藏古典家具修复成果汇报展”“两朝帝师翁同龢及翁氏家族文物特展”“丝路寻石——丝绸之路十三国建筑与石刻艺术考察图片展”4个临时展览,举办了第四届“五色五香——五塔寺端午文化嘉年华”“投石问戏——寻梦承泽”两场主题活动。我们的展览与活动主题以馆藏品为基础又不仅仅局限于此,我们希望博物馆的展览内容是多元化的、多维度的,更多地涉及一些传统文化和民俗题材、艺术题材,更贴近公众的生活。

比如在策划“花木邂逅——馆藏古典家具修复成果汇报展”时,我们以一方石刻花盆为引子,展出了40余件传统中式插花作品,与博物馆藏的一批古旧木器家具结合在一起,同时配以插花工具、传统细木工具等展品,30多位花艺师参与了展览,并举办了两场讲座,与观众一起营造了一场石、花、木、人的邂逅。这场具有文化与艺术氛围的展览赢得了参与者与观众们的喜爱,他们纷纷通过微信、微博转载了展览照片与观后感,形成了线上线下的良性互动,给博物馆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一位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在这里,我们体验了一次与传统文化、与艺

术、与美的邂逅”，看到这段话，对于我们文博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此外，我们博物馆在2016年末举办的“丝路寻石——丝绸之路十三国建筑与石刻艺术考察图片展”中，也尝试了新的办展模式，为了更好地弘扬创新丝绸之路优秀的石刻文化艺术，展现丝绸之路文化与艺术传播、交流的历史发展轨迹，丰富展陈内容，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原馆长王丹提议“要做一个众筹的展览，邀请观众与我们共同办展”。于是我们向观众发出邀请，征集展品，一起分享他们在丝绸之路中有关宗教信仰、城市文化、建筑设计、居住方式、商品贸易、民族交流等方面的点点滴滴。这场展览最终展出47件由观众提供的展品，254张图片、一场学术座谈会、两个配套互动活动、一本图录、两套展览文创衍生品，活动宣传中我们除了采用传统媒体外，还进行了网络直播，共有65.8万人观看，收集了137.7万个赞，这个众筹的展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们希望未来能创造更多的机会让观众们参与到展览的策划实施过程中来，举办更多立体多维的展览。

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教育与服务功能建设

第21届国际博物馆协会代表大会修订博物馆的定义为：博物馆“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相关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将“教育”调整到博物馆业务的首位，这意味着博物馆在由“藏品中心”向“公众中心”转化。博物馆不再仅仅是文物、艺术品的收藏、保存、展示的机构，也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场所。

(1)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开辟了“娃娃看石刻”“金石书院”科普讲堂、“拓片研习室”“金石雅集”，为观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教育实践的场所，并开

发设计了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项目。

例如每月举办一至两期的“金石大讲堂”科普讲座，内容包括传统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拓技法的学习与互动项目、篆刻技法的学习与互动项目等。博物馆拓片教学碑刻上选取的元素都是具有明清时期艺术特点的纹饰，比如石刻馆藏品上的海水江崖纹饰、动物石雕纹饰、缠枝莲花纹饰等。

互动体验环节活动采取了多种形式，比如交流讨论、触摸感受、创意制作等，尽可能把视、听、说、做结合起来，让观众在参与中想象，在体验中学习，在互动中收获。

中小學生作为博物馆的参观者同时也是受教育者，他们是博物馆教育的重要对象，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和未来文化的开创者。面向中小學生开展多样的博物馆艺术教育，能使更多的学生走进博物馆，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提高中小學生的艺术修养，促进多元智能的开发，培养健康积极的心理。

(2)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近10余年来与北京市几所大中小学校建立了长期共建关系，结合学校的需求，将博物馆的互动项目、讲座、展览等带进学校，充分利用博物馆艺术教育资源，发挥艺术教育功能。

例如，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与温泉第二中学开展共建16年，每年博物馆都会为学校送去反映石雕石刻艺术、历史文化内容的巡展与讲座。同时我们还将传拓互动体验项目带进学校，这个项目一直以来作为学校美术艺术选修课之一，同时也是学校的特色教育之一，在校的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参与这项互动体验，博物馆的专业老师带着教学的碑刻，通过讲座的形式介绍传拓技艺、拓片艺术、碑刻上的文字和纹饰所反映的文化艺术内涵，并现场演示，辅导同学们创作自己的拓片作品。博物馆和学校还共同编写了《石刻艺术》的校本教材。每年我们还会和学校共同举办拓片比赛、优秀作品展等活动。这个具有

传统文化、艺术创作、体验互动的项目深受师生的喜爱，老师们也纷纷表示：学生们通过拓片，学习了传统技艺，激发了同学们的创造力，提升了审美能力，丰富了历史知识。

我馆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附小分校共建多年，博物馆曾经做过“翰墨写正气 丹心照汗青——馆藏《正气歌》帖石拓片展”，结合这个展览内容，博物馆和学校师生根据《正气歌》中所载的12个历史典故，自编自演历史舞台剧，其中《一身正气——在齐太史简》的演出赢得了各方好评。学生们自己编写、创作设计舞台道具、演出服装，通过这个过程激发了学生们的艺术创作热情，锻炼了他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表达能力、自信心，加深了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提升了文学艺术修养。

(3)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了图书室和拓片资料库，观众可以通过预约的方式查阅自己所感兴趣的石刻历史、石刻艺术、石刻文化等相关领域的电子资料、图书资料和拓片资料，这种形式也是博物馆为公众提供服务的一种新途径。

(4)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已建立了官方网站、公众微信、微博，在网站上设置了石刻展览、新闻资讯、娃娃看石刻、学术研究、导览与服务、博物馆商店等栏目，通过互联网让博物馆的教育与服务范围更为广泛也更为便捷，同时也增强了博物馆的活力。

五、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体验式文创理念

日前，文化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提出《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这对于我们博物馆文化创意发展来说无疑是

一重大利好消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多年来也是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近些年来我们不仅依据自身藏品资源、科研成果、文化特色开发了多种具有实用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的文创产品，还在不断尝试通过结合展览与活动、讲座与沙龙、互动与体验、环境与服务等多种形式推动自身文创事业的发展。

在参与一些国内外的文创展会时，我们注重在展示文创产品的同时，也营造出与展示主题相呼应的氛围，并加入一些互动体验环节，这对于博物馆文创品的销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石刻馆参加的2016年度成都博博会，我们以“古代文青的石刻生活”为主题展示了拓帖、制印、点茶、染香、挂画、插花中与石刻有关的活动，展会现场观众积极参与。观众们在热情体验各种互动项目时，也自然而然地对我们的文创产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大概就是快乐体验式文创所带来的积极效应。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近几年在环境营造、展陈策划、教育服务、文创拓展等方面做了一些新的探索与实践，并得到了一些观众与业内专家的认可。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与尝试能够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知识传播效能。我们还将继续深入开展对观众心理、学习方式、欣赏方式等方面的探究，增强博物馆观众的认知度与参与度，使更多的公众走进博物馆，体验博物馆，并可以有机会参与到博物馆的展览、社会教育等工作中来。我们将在全面提升新时期博物馆建设理念的基础上，努力把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打造成为新时期具有综合教育服务体系的一所特色博物馆。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助理)

博物馆行业也应重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白 崇

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了低端产业的盲目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失衡，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调整、梳理，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解决的是经济该如何发展的问题。那么，在博物馆事业发展领域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视和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强，我国文博事业获得了显著发展。2010年以来，我国博物馆以每年几百家的数量递增，目前已近5000座，每年举办展览超过2万个。博物馆的迅速扩张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增进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但博物馆和展览数量的快速增长并不全是有序的、有研究基础的、有充分和必要条件的，还有许多无序、盲目、无藏品保障、毫无研究水平和社会效益的增量。北京大学宋向光教授在2015年12月8日《中国文物报》第6版发表的题为《居安思危，警惕博物馆“空心化”》的文章中指出，“博物馆空心化是博物馆基础业务落后于博物馆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服务的状况，是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文章阐述了当前我国许多博物馆缺乏对藏品、对展览、对本馆特色的研究，导致了博物馆人才匮乏、展览缺乏内涵，博物馆发展后继乏力的实际情况。

党和政府也意识到了我国文化事业

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2011年10月18日，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事业和产业活力，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肯定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但也提出了一些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我国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文化走出去较为薄弱，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等等。可见，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同样也存在着与经济发展类似的问题。

一、博物馆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哪些问题能否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首先要找出问题所在

（1）收藏、征集功能弱化，许多中小型博物馆藏品数量不足，导致基于自身特色的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不足。

成规模、成系列的藏品是博物馆建馆、举办展览和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收藏功能是博物馆最早也是最基础的社会

职能,而其他如研究、教育等功能则是从收藏衍生而来的。没有收藏,博物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无从发展。

《博物馆条例》第十条“设立博物馆的基本条件”规定,设立博物馆应具备相应数量的藏品以及必要的研究资料,并能够形成陈列展览体系。国家文物局在《关于贯彻执行〈博物馆条例〉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博物馆藏品应真实可靠且来源合法,原则上不应少于300件(套)。可以说,博物馆藏品的多寡、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博物馆发展的潜力。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博物馆特别是中小型博物馆藏品数量严重不足,难以支撑起博物馆科研和展览工作。个别大中型博物馆由于建馆较晚,已失去征集文物的最佳时机,馆藏也非常有限,且不成系列,无法说明问题,这导致了博物馆在布展过程中捉襟见肘,许多展品不得不以复制品代替或用图片展示,观展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博物馆征集功能弱化甚至消失,成为博物馆持续发展的隐患。征集是实现博物馆收藏功能的最重要的手段,能够为馆藏时时增加新鲜血液,为博物馆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可现实情况是,博物馆的征集属性越来越被边缘化。就北京地区博物馆而言,只有极少数博物馆有专门的征集部门,大多数博物馆征集工作被纳入到保管或其他部门,很多中小型博物馆多年来很少甚至从未征集过任何实物,部分大型博物馆每年也只是征集寥寥几件。征集是博物馆的本质属性,是时代赋予博物馆的神圣使命,不管博物馆的馆藏是否丰富,都不应削弱其征集功能。

藏品不足,馆藏不成规模和系统,征集功能的缺失导致博物馆在发展中迷失了其原有追求和特征,弱化或者放弃收藏和征集功能,片面追求其他,如展览、文化活动能够取得的社会效益,只会繁荣一时,很难持久,这也是博物馆内部所面临的功能结构性失衡问题。

(2) 研究水平不高,人才培养乏

力,科研能力的欠缺导致博物馆文化产品产出效率低、质量欠佳。

研究是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研究工作是博物馆的基础性工作,是开展各项业务、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前提。细致有效的研究能够深入挖掘馆藏品内涵和馆藏特色,为展览制作和文创产品开发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能够推动博物馆建设,为文物科学保管保护、放大社会教育功能打下牢固根基;能够推出科研和学术成果,为推进博物馆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建设,为服务社会大众和其他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做出贡献。1956年5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三重基本性质和两项基本任务,简称“三性两务”,即: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的三重基本性质和博物馆应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两项基本任务。在基本性质和基本任务上,都强调了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功能;在现行国际公认的1974年哥本哈根国际博协大会对博物馆的定义和2015年3月20日我国颁行的《博物馆条例》对博物馆的定义中,均认为研究是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可见研究工作在博物馆业务工作中的重要性。

但目前看来,除一小部分博物馆外,绝大部分博物馆研究水平普遍不高,或者说与博物馆应具备的研究水平明显不符,具体表现为:①博物馆对研究工作重视不足,大中型博物馆很少配备专门的研究部门,小型博物馆研究工作则极度萎缩,几近于无;②研究型人才严重不足,人才培养乏力,队伍青黄不接;③研究能力有限,很难推出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对博物馆建设支持不够;④缺乏体系化、系统化的博物馆研究,偏重于博物馆实践研究,缺乏对博物馆学理论的研究。

研究水平不高导致了博物馆展览、文化活动、文创产品等文化产品的产出效率低下、质量不高,难以实现快速有效供

给,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造成大量需求的外溢,涌向其他更有竞争力的文化、旅游场所。

(3) 缺乏深度有效的调研,博物馆和展览项目仓促上马,导致出现了大量低端低效的文化供给,既浪费资源、增加了财政负担,又失去了群众基础,丧失了博物馆文化品牌。

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提供服务的公益性机构,是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其立意之高之远决定着设立博物馆应慎之又慎,要对历史负责,要对未来负责,更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地、各行业、企业纷纷加强博物馆建设,博物馆越做越大、越做越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盛景之下,乱象也频频出现:有的省市博物馆刚刚建成几年,就发觉博物馆建筑已经限制博物馆的发展,不得不改扩建或另外选地新建;有的博物馆贪大求全,展馆高大宏伟,藏品和展览却不“出彩”,不“给力”;有的博物馆虽投入巨大,就因为上级单位的变更或者资金链的断裂而注销登记或者直接销声匿迹;还有个别博物馆注册备案之后,迟迟不对公众开放,只进行内部开放,占用了公共资源却只成为了名义上的“博物馆”。

同时,展览也需要精心筹备和调研。展品精良、内涵丰富的展览对公众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近年来博物馆推出了很多优秀展览,比如2008奥运年首都博物馆推出的“中国记忆——5000年中华文明瑰宝展”、2016年推出的每天限流参观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和引发“故宫跑”现象的“石渠宝笈特展”等展览都是有效供给的典范。但很多展览则缺乏亮点、缺乏内涵、缺乏诚意。动辄几十上百乃至上千万费用制作的展览乏人问津,与应相匹配的社会效益相去甚远,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浪费。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绝大部分观众涌入了

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大中型博物馆和其他有鲜明特点的博物馆,缺乏特色的博物馆依然沉寂,观众贡献率很低。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启示

以上问题都是博物馆事业发展过程中自身产生的问题,博物馆在与广大人民群众关系中,处于供给侧一方,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有针对性地应用于博物馆行业,用来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呢?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化结构和人员配置,提升产品质量。针对上文提出的博物馆征集、研究功能弱化问题,博物馆应加强这两方面的工作,优化内部结构,视实际情况增配机构和人员,努力提高博物馆藏品厚度和研究深度,推动博物馆的良性发展。在藏品征集上,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要从政策层面上给予大力支持,要增加投入力度,为征集工作提供经费保障,博物馆要加强田野调查和市场调研,针对本馆馆藏特色了解社会流散文物情况,及时有效地开展文物征集工作;在研究方面,要提高认识,加强重视。人员编制足的大馆应建立专门的研究部门,中小馆应在各部门强调研究工作的重要性,通过激励机制等办法提高从业人员开展研究工作的积极性,要建立完善的研究体系,除针对不同业务主题进行研究外,还要加强对博物馆学理论的研究,要加强对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利用,提高博物馆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化增量和行业布局,实现博物馆社会效益的提高。博物馆和展览数量的大幅增加是可喜的,是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优异成果的表现,但也要重视快速发展带来的盲目的无序的增量,提高和优化增量质量。

博物馆要找准定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落后的供给能力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对博物馆文化产品的需求已经升级了,但许多博物馆还在原有体制里原地踏步,敝帚自珍。新时期的博物馆应重视人民群众对博物馆的实际需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提高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避免高耗低效的供给;博物馆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博物馆行业布局的研究,注重顶层设计,在博物馆资金、人才和物质的投入上,向我国中西部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边远地区倾斜,提高博物馆的公益文化产品对文化资源贫瘠地区人民群众的供给。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加强监管和疏导,淘汰落后、无序产能,提高博物馆文化产品供给质量。博物馆是开展社会化教育的课堂,肩负着提高民众文化素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使命,博物馆开展的各项展览、文化活动均要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否则不仅达不到为社会及其发展提供服务的效果,还将起到反作用,引起不良的社会反响。博物馆行业管理部门要结合实际,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博物馆各项专业规范和从业标准,使博物馆在开展工作中有更多的依据;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加强监管和疏导,对展示敏感题材、展示赝品伪品的博物馆和展览应予以处罚和取缔,努力营造科学、严谨、清明的博物馆从业环境;要按照《博物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长期不开放、备案后逾期不开放、开放天数上不达标的博物馆予以警告、处罚或取缔,以提高博物馆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博物馆要以“三贴近”原则为举办展览主要标准,社会效益低下、高投入、低产出的展览应尽量少举办或者不举办。

(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化投资结构,激发民间资本活力,使非国有博物馆和民间资本成为国有博物馆的有益补充,推动博物馆行业整体健康发展。博物馆行业管理部门要充分尊重和利用民间资本和文物博物馆爱好者回馈社会的美好愿望,为民间资本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扶植措施,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在博物馆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为国有资本分担压力,营造市场化的竞争氛围,进而带动博物馆行业的整体发展;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文创产品等周边产品开发,鼓励博物馆与社会力量充分合作,建立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促进资源、创意、市场共享;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专业技术和服务性工作,使博物馆能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获得更多的技术和专业人才资源。

(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改革创新突破发展瓶颈。博物馆事业发展还面临着整体规模不大、资源分散、体制机制束缚、影响力差、文化走出去较为薄弱、科技含量低等问题。只有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发展问题。

我国博物馆事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相比,发展时间还较短,管理部门和博物馆从业者对博物馆学理论和博物馆该如何发展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的过程当中,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新常态下,博物馆事业发展也面临着一个个困难和挑战,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的提出,正好给博物馆事业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借鉴。当然,我们也不能直接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嫁接到博物馆行业中来,还要加强研究,切实为博物馆事业发展探索出一条供给侧改革的道路。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副主任)

最后的“高士”——朱家溍先生

姜舜源

近年流行“民国热”“最后的贵族”“最后的淑女”，等等，不一而足，似乎从此之后都是“寒门”，也再无“淑女”；一位名人夫人，本也无甚辉煌业绩，只因享年过百，一时传媒跟风炒作。

“大师风”也刮个不停，日前一位普通建筑史教授80生日，网上为其加冕“中国建筑史泰斗”。泰山、北斗，那是何等重量级的人物？在这学术界鱼龙混杂的年代，笔者描写朱家溍先生，似乎却也唯有“最后的高士”最恰当。他老人家可能是我亲眼见到的唯一可以称为“高士”的人，而且由于历史条件变迁，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高士”，以后或许真难得一见了。

“神马叫‘宫廷喜’呀！”

笔者理解的“高士”，不仅包括品行高洁、出尘脱俗，也包括出身富贵而不骄不矜，身负奇才而不恃才傲物，德高望重而愿意奖掖后进，不拘俗务而又洞破世情，虽经岁月洗礼却始终真情不泯，等等。故宫博物院书画专家王连起先生说：“你若与朱老也是十数年朝夕相处的话，会更加体会他高情厚谊——他是一位非常厚道而没有什么坏心眼的人。”

我于1983年7月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第一次接触朱老大约在1984年春夏，感觉并不“亲切友好”，甚至有点“冷若冰霜”。那时朱老到办公室所属档案室查档案，我正巧遇上。同事们简单介绍后，我就趁机向朱老表达，以后想向他请教

“宫廷史”。不料朱老突然正色道：“别说什么‘宫廷史’，你现在还不懂。”若干年后我才悟出来，这句话原来戳到朱老的痛处。

那是1989年筹备成立“清代宫史研究会”。当时是清史学者、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树卿牵头，朱老做顾问，我当秘书。首先是名称，大家提出“清代宫廷史研究会”。朱老力持不可，说：

“1945年我加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不久去看望陈老师（教育家陈垣先生）。 ”

（接下去就不时切换广东“白话”）

陈老师问：“你在故宫做乜业？”

我答：“研究宫廷史。”

陈老师就反问：“神马叫‘宫廷喜’呀！”

陈垣先生是他念辅仁大学时的老师。在陈老师看来，“宫廷史”就是什么“清宫秘史”之类歪门邪道，根本不是正经的历史研究。所以遭到老师痛批。几十年过去，伤疤虽好、痛还在，当初我第一次见面就碰了这块伤疤，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朱老提出，就称“清代宫史研究会”。因为乾隆、嘉庆相继编修了《国朝宫史》《国朝宫史续编》，那是官修典章制度汇编，以其命名这个特殊研究领域，其来有自。

陈垣先生是广东南海人，老先生可能一直乡音未改，即使改了也是“广普”。而朱老颇有“模仿秀”天分。有一次说起20世纪早期考古学起步，人们不了解什么是考古学。甲骨文学者董作宾在安阳殷墟

发掘时生病了，他的母亲——一位河南小脚老太太，去看望儿子。（这时就又随机切换到河南话）老人家来到考古工地一看，就明白了，一见儿子面就责备：“啧啧！怪不得你老得病啊，你净干这断子绝孙的营生！”在老人家看来，这“挖绝户坟”的勾当，可不是“断子绝孙的营生”么。

一起编书

接触越多，越感到朱老其实非常随和，对年轻人并无隔膜。尤其是当看到你是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他会满腔热忱地支持；对于年轻人的进步，他毫不吝啬地予以肯定；对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他会无保留地奖掖。如今当我走南闯北阅历不少，而且自己也向中老年挺进时，则更加敬佩朱老：这，需要坦荡的胸襟，更需要自信的底气！

大概1994年起，故宫博物院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合作编写出版《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精品全集》，第一步计划先出60卷，以10年为期。朱老参与编委会，实际上是全面的业务指导。此书的总名是我在讨论中提出的，朱老、主抓此事的杨新副院长、研究室主任徐启宪等各位专家都很赞成，认为以后随着藏品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可以继续出下去，都是院藏精品。在确定各分卷主编时，朱老特别提出：不在业务部门工作的同志可以参与编写，还可以做分卷主编，这是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成果的集结，要体现故宫博物院学术队伍的整体阵容。我知道老人家的美意，他说的是我。在故宫博物院，我一直在院办工作，但业务上能够与专业岗位的同龄人共同成长，多年

来在协助院领导、专家们推动年轻人业务成长方面，还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朱老看在眼里，心中有数。

清代宫史研究会成立伊始，确定了办实事的宗旨，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接着编辑出版论文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承德市文物局系统、清东西陵文管处等机构的一批年轻人后来成长为文博、历史专家，清代宫史研究会功不可没。朱老参与了前五届活动的组织、指导。起初两届，大家写好了论文，先在院内与会者当中交流，朱老点评。看到好的文章，朱老很高兴，你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老就说“知者乐，仁者寿”；不太好的，朱老就会说：“回去看书！”又告诉你看什



图一 清代宫史研究会几本论文集都是朱家溍先生题写书名

么书。出论文集之前请朱老题写书名，横写一张、竖写一张，朱老不厌其烦。因为横写的不能竖排，竖写的不能横排，否则艺术效果不好。有一次指着我请他题写书名的纸条说：“这个字不就很好吗？”我自然是无地自容。朱老就正色说：“我不是开玩笑啊。”（图一）

出席迎香港回归笔会

国家文物局前副局长彭卿云先生曾对笔者指出，朱老淡于人情世故，但绝不是不谙世事的书呆子。有一次他们一起参加一位领导兼老专家召集的活动，彭局长因有事中途退场，朱老也跟着一起走了。一上车朱老就说：“老×上当了，这是替人家搭台，给商家‘跑龙套’啊！”再后来，当我拿别处专家与朱老等比较时，彭局长就说：“那些专家可不能与朱家溍、徐邦达、冯先铭等故宫老专家同日而语啊！”

1997年春天，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我方在香港的紫荆杂志社，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一场京津书画家迎回归笔会。故宫博物院方面，我帮社方邀请了朱老、文物专家兼书画家郑珉中先生、中青年画家李传奇先生。杂志社方面为表达对两位老专家的尊敬，专门派驻京办事处的小伙子开办事处的车，去南锣鼓巷朱老家、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郑先生家接和送。到了钓鱼台，我问这位小伙子：“朱老家里阔吧？”小伙子一口老北京腔：“原来就是板厂（儿）胡同啊，我从小在姥姥家住，这一带太熟了！不阔。从一个小小的后门进去，住在大宅子的厢房的小耳房里。但老爷子很有意思。看我来了，说等一会儿啊。不一会儿，西装革履就出来了，倍儿精神！”

下午回去之前，朱老、郑先生对我说：“小姜啊，我们一会儿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别麻烦社里了。”我将此意告诉陈洪社长。陈社长说：“不对。一定是小

伙子开车毛里毛糙。安排新华社（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北办的车送两位老先生。”这时我感到，高人的语言竟是如此言简意赅、寓意深长啊！更令人惊奇的是，没过几天，这位小伙子就开车追尾，出了一点小事故。为筹备这场笔会，小伙子没少开车拉着我满大街跑，买笔墨纸砚、冰盘水碗、毡垫诸物，我怎么就没感到有什么不妥啊？老先生怎么就能够见微知著，有“履霜坚冰至”的预感呢！

研究室的同事陪同朱老和几位老专家出差。回来说：有一次航班延误，大家都很着急：宾馆退了，接待、送行的人也早走了，这怎么办啊？唯有朱老超然物外，稳坐沙发，怡然自得。

他的女儿朱传荣在故宫紫禁城出版社工作，有年轻人想发表文章，但稿件水平不高，朱老就会说：“不就是一篇稿子吗？改一改不就行了嘛。”

没有金钱概念

我素知朱老的家是晚清僧王府，后来，五进大宅改出去三进，母亲、四兄弟的四大家数十口人住最后两院，却不知朱老夫妇竟住最后一进院落的西厢房的北耳房，面积仅有十几米，采光不好，冬天靠蜂窝煤炉取暖。记得曾和老人家谈起向院里申请楼房。朱老说：“住惯了，生炉子可以坐水（烧开水），煤灰不脏，掸一掸就没了。”

20世纪90年代初吕济民先生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正赶上朱老的夫人病逝。计财处报告说：朱老夫人没有工作，住院时拿了故宫的支票作押金，现在结账需要付款一万多块。朱老说，还有几本书卖了吧，好还故宫的款。吕院长当即表示：朱老把所有收藏都无偿捐献国家，他的夫人病逝，还要卖书还账，这说得过去吗？账由故宫支付！

他出身名门世家，为宋代理学家朱熹第二十五代孙，高祖朱凤标，道光时进

士，官至内阁大学士；曾祖朱其煊，曾任山东布政使；祖父朱有基，曾任四川按察使。父亲朱文钧，字幼平，号翼盒，光绪年间公派英国留学，辛亥革命后任财政部参事、盐务署署长，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为专门委员，是当时著名文物鉴赏、收藏大家。朱文钧收藏的四五百件套宋拓晋唐法帖，是故宫博物院都不完备的，因此院长马衡商请他把藏品转让给故宫。朱文钧先生当即回答：身后都捐赠博物院。只因先父一个承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朱家四兄弟便奉母亲之命，陆续把所有法帖捐献故宫博物院，明代家具捐赠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书画捐赠浙江省博物馆，藏书捐赠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等。最后几批捐赠已经是80年代、甚至90年代，那时国内文物市场已经开放，文物艺术品市场行情日新月异，但朱家昆仲不为所动，完成父母遗命矢志不渝。

大概是1993年前后，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主任刘桂英和我联系，说历博策划制作一个文物鉴赏系列的录像带，传播文物鉴赏知识。拟请朱老讲工艺品部分。每部录像好像是两小时，中间休息一会儿，吃点西瓜润润嗓子；还特别提到每部报偿是多少（大约在一两百元之间）。我就按这个设想向朱老报告。朱老听了表示同意。最后我就说人家提出的报酬。朱老说：“别跟我说钱不钱的事。这个事情有意义，值得做，就做。”

还记得那次迎回归笔会上，主办方送大家一袋子新闻出版物，另外每位送两千元港币作为润笔，放在小信封里一起装进袋子里。参加笔会有润笔是惯例。笔会完成后第二天我忽然感觉不妥，朱老可能没在意。就给他家里打电话，说口袋里有个小信封。朱老说：“我把袋子扔到南墙根底下了，我去看看他们扔出去没有。”原来他老人家连看都没看，进了门就把口袋当垃圾扔了，等孩子们丢垃圾时一起扫地出门。一会儿，朱老在电话那头说：“嗯，还在那里，里面是有个信封。”

自评书法

与朱老相处，最突出的感受是，他没有什么矜持，也没有文人相轻。他说的是真心话，批评别人也决非出自恶意。199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70年院庆，院里决定由朱老题写一块匾额作为贺礼。朱老写了“东都金阙”四个大字，由故宫古建筑维修工程队按传统工艺制成大匾，书法、工艺相得益彰，金匾神采奕奕。朱老看了很高兴，说：“我的大字其实比元白（启功先生）写得好；元白的字太秀气了，写条幅好看。”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客观评论，就像说与自己无关的一件事，绝对没有丝毫的文人相轻。

老人家有时又颇有孩子气。他是京剧名票，学杨小楼最有造诣，每年粉墨登场一两次，为专业院团示范。这是老人家晚年最得意的事。杨派是武生，老人家八十多岁了，《挑滑车》还力不减当年。大家说，朱老真是不显年龄。朱老就说：“也就像六十出头；上了妆，也就是二十七八。”有一次我把这话告诉启功先生。启先生说：“你告诉他，别吹牛了。你说这是启功说的。”两位老友多有意思！

老人家重感情、重交情。后来我到香港工作了，到过年就给朱老寄上挂历和贺年片。他就用故宫的小信笺，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上吉祥祝福的语句，寄到香港。1993年我写作出版第一本书，是朱老题签，吕济民先生写序。我还珍藏着朱老给我写的对联：“奇石尽含千古秀，好花长占四时春。”那是他老人家最高兴的时候的得意之作。如今每当我看到这些自制贺卡（图二），就百感交集。

需要专家，也需要学者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蒸蒸日上，如火如荼，不论业外还是业内，似乎文物工作者若不会鉴定文



图二 朱家溍先生手书寄本文作者贺年片

物，就不算是专家。对于此风，单老（士元）、朱老等颇有不同看法。单老称这是“赌眼力”；朱老则认为，文物博物馆工作需要专家，也需要学者，“现在（当时）故宫专家不少，但缺乏学者”。他本人虽有不错的鉴赏能力，但还是以做学者为本职，不汲汲于“鉴宝”，更甚少出去搞鉴定。

记得1991年夏天在承德开清代宫史学术研讨会，先是在承德市里，后又到坝上草原清代“木兰围场”实地考察。一路上接触到不少山珍野味，我们年轻人没吃过，就不停地问朱老，朱老每问必答：“嗯，是狍子肉；嗯，是鹿肉；嗯，是野猪肉；嗯，是野兔肉、是野鸡肉……”我印象最深的是“红烧鹿大肠”，原来如此美味。后来查资料，每年内务府辖下的东北“打牲乌拉”（猎户）都会进鹿大肠若干挂。

朱老是美食家，爱好广泛，他能写会

画，除了唱京戏，有时开会之余举办文娱晚会，他还会清唱一支当年的流行英文歌曲。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做学问不应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唯一生活内容，享受生活也是应有的修养。

在坝上草原，我们夜宿国营林场的招待所。当地林户扛来干山货出售，有蘑菇、木耳、黄花菜等，还有灵芝。灵芝十几块钱一支，大家就问朱老怎么样。朱老随便扫一眼，说：“不错，跟咱们库房里的存货差不多。”有同事就买回来，放了一阵儿，灵芝上的红漆就慢慢翘起来，大家啼笑皆非。大家说：“十几块钱想买什么？朱老肯定是要大家帮帮当地林户。”当时那里还是挺苦的。面对草原深处的老百姓和灵芝真伪两道选题，你要朱老说什么？

用了五十多年的自行车

朱老有一辆英国造自行车。大约是1995年某一天，在故宫城隍庙研究室朱老的办公室，又说起这辆自行车。他说那是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在重庆买的，然后就应马衡院长批准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陪着故宫南迁文物回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上班，一直骑着这辆自行车，已经50年了，从来不出故障，只因日久年深换过两次链子。

这辆自行车有说是英国老式“风头”牌的，有说是英格兰BCC制造“大力神”（Heracles）牌的。中间没有现在男车横直的大梁，而是类似女车那样弯曲的双斜梁制式。朱老天天骑着它，追着老人家问到底是什么牌好像不太尊敬，故而至今也不知究竟是什么牌子。我只几次提请老人家，八十多岁了骑车，千万多加小心。他从南锣鼓巷僧王府的家到故宫北门神武门并不遥远，但从景山前街由东向西骑来，进神武门需左转弯横穿马路。老人家却打趣说，迎面开来车最好，他不敢轧过来；还说骑车能检验自己的应变能力，感觉眼

疾手快、得心应手，就说明自己还没老。

师徒与否？

朱老于2003年9月29日病逝，那时香港“非典”疫情基本好转，我回北京休假，突然得到这一消息；并得知家属遵照遗嘱，已经随即火化遗体，然后在家中设立灵堂。消息太突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糊里糊涂骑车到了朱老故居。灵堂就

设在他生前居住的房间里，魁梧健朗的朱老乘风归去，只留下仙风道骨。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也是从此天人永隔。现在想想，这可能是缘分吧：到香港工作之后很少返回北京，而他老人家就等我回来向他告别。我和朱老，有师徒之实、无师徒之名，师徒与否？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市文物局2016年四季度 文博事业大事记

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

10月11日 市规划委、市文物局联合召开专家论证会，谢辰生、张复合、柯焕章等专家与会，专家们原则同意将原京张铁路清河站整体平移第二套方案。

10月13日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调研海淀区天光寺。

10月18日 市文物局召开《文物艺术品元数据格式规范第二部分：书画》标准审查会及《文物艺术品元数据格式规范》实施评估会。

10月19日 市文物局组织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研讨会暨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议。

10月21日 市文物局第93次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敬一亭举办。本次活动特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魏文博士进行“雪域梵华兆京城——清代北京地区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专题讲座，局系统20余名青年业务人员参加了活动。

10月24~28日 应柏林市政府办公厅邀请，市文物局组织宣传处副处长王昕、市外办欧非处处长李金成等两同志赴德国柏林与驻德使馆及柏林市落实“得月园”项目情况、进行现场踏勘、制订修缮方案等工作。

10月25日 副市长王宁调研房山区文物保护工作。

10月26日 市文物局在孔庙和国子监

博物馆彝伦堂召开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总结阶段工作部署会，落实国家文物局工作要求，研究了北京市及区普查工作总结等事项。北京市文物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办公室负责人、各区普查办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共40余人参会。

10月28日 接待台北市文基会执行总监周珮敏一行4人参观首都博物馆。

市文物局组织机关党员干部50余人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展览活动。

10月30日 为期4天的第十一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品博览会落下帷幕，文物及博物馆相关文化产品展馆在4天的展览中亮点突出，内容精彩纷呈。

10月 市文物局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核准了圆明园大宫门遗址区保护展示工程方案。

市文物局向市政府申请专题研究城市副中心“汉路县故城遗址”原址保护并建设遗址公园。

市文物局完成天安门城楼及城台安全检测方案核准事项，并上报国家文物局备案。

11月1日 接待蒙古国外交部行政管理司尼·安赫巴雅尔司长一行3人参观白塔寺。

11月3日 接待日本民进党常任顾问、众议员、前党首冈田克也一行5人参

观首都博物馆。

第二十届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暨第十一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京港博物馆馆藏资源合作研讨会”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举办。

11月3~4日 市文物局组织举办了“中控室安全管理与检查培训班”。局系统20余家文博单位的安全主管领导和保卫科长,共50余人参加了培训。培训专门聘请专家授课,组织学员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防中心实地考察学习,取得了良好培训效果。

11月6~10日 应英国博协大会邀请,首都博物馆馆长助理杨丹丹同志、文物保护修复部主任高新峰同志赴英国参加英国博物馆协会2016年大会并与当地博物馆交流。

11月7日 接待菲律宾代表团(正部级)一行3人参观首都博物馆。

于平副局长主持“白塔寺西路北侧地下文物库房移交专题工作会”,会上传达了市领导的批示,讨论了移交工作的细节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11月9日 市文物局向全市印发《北京市文博系统2016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要求各区文委和各文博单位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市防火委的工作部署,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制,坚持“属地管理、条块结合”的原则,切实做好首都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确保重要节日、重要活动期间全市文物安全。

11月11日 市文物局第94次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举办。本次活动特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靳枫毅老师以“玉皇庙文化与尖首刀币的起源”为题做专题讲座,局系统近40名青年业务人员参加了活动。

11月12日 接待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大使出席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儿童艺术交流互动并参观首都博物馆。

接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国合作方和

使馆及国际组织嘉宾参观首都博物馆。

11月15日 市文物局、国家宗教事务局、白塔寺管理处和中国佛协在中国佛协会议室举行关于“白塔寺西路北侧地下文物库房移交工作洽谈会”,与会四方对我局的《白塔寺西路北侧地下文物库房移交协议》无异议,决定择期签署。

11月16日 市文物局组织首都博物馆课题负责人参加市科委召开的关于“绿色生物溶壁酶在古文物霉斑去除关键技术研究”课题答辩,该课题顺利通过。

11月22日 接待以色列文化遗址保护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奥马里·沙蒙一行2人参观首都博物馆。

第38期京华讲坛在北京市方志馆多功能厅举办,舒小峰局长做了题为“北京三个文化带保护与利用概述”的讲座,全场座无虚席。

11月22~25日 市文物局组织全市文物系统安全与执法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和业务技能培训,共计100余人参加了培训。向德春副局长做开班动员,邀请了市法制办的领导介绍北京市行政执法形势,并组织全体学员交流执法办案心得、进行组卷实际操作、开展案卷讲评,使文物执法人员提升了法律素质,拓宽了视野,提高了专业技能。

11月22日~12月2日 市文物局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局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轮训班,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局系统全体处级干部和党务、组工、纪检干部共185人参加轮训。

11月28日 市文物局与国家宗教事务局就移交白塔寺西路北侧地下文物库房给中国佛协一事举行签约仪式,于平副局长代表北京市文物局签字。

“5·18”金元时期古文化遗址盗掘案表彰会在延庆召开,市文物局研究决定对在案件查办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案件发现以来,市文物局多次赶赴现场,指导延庆区文委依法调查取证,请文物专家进行鉴定,并协调检察机

关、公安部门、属地政府通力合作。此案成为近年来北京市破获的第一起也是最大一起盗掘古文化遗址案件，是文物、公安和地方政府协同打击文物违法犯罪的成功案例。

11月30日 市文物局会同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对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验收。

2016年第四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金秋文物艺术品拍卖月”自8月1日启动以来已经举办24场现场及网络拍卖会，嘉德、翰海等公司的拍卖场次已经全部结束。

11月28日~12月9日 市文物局组织由各区文委主管领导、执法队长和市文物行政执法人员参加的联合检查组，对各区2016年度文物安全和执法工作进行交流检查，并提出考评意见，作为全市文物执法系统三年一次工作评比的主要依据。检查组人员认真履行职责，实事求是地开展检查考评工作，严格对照评分标准逐条进行量化打分，同时注意收集各区好的创新做法及工作经验。此举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文物安全和文物执法工作，促使各区互相交流、学习、进步，确保全市文博系统安全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11月 市文物局向市法制办报送2017年立法项目申请，建议将修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巡视检查报告制度暂行规定》工作纳入市政府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

市文物局根据国家文物局要求，完成在京中央单位使用文物建筑腾退问题的调研，并提出参考建议。

12月1日 市文物局召开“北京市可移动文物普查项目三期验收会”，于平副局长、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副主任邓贺鹰出席会议。北京市文物局普查办、验收专家组及相关处室共20人参会。

市文物局召开文创产品开发试点工作专题工作会，围绕国家文物局《关于公布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名

单的通知》研究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政策落实。

12月5日 市文物局组织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古代建筑博物馆、石刻艺术博物馆、团城演武厅办事处、正阳门管理处等单位参加了2016第二届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交易博览会。

12月7日 住建部、国家文物局、市农委与市文物局到房山区南窖乡南窖村现场调研，准备将南窖村列入申报中国第七批历史文化名村名单。

12月9日 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长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专项督察的通报》，北京市在全国长城沿线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长城保护工作成绩突出，督察评分排名首位，得到国家文物局的充分肯定。通过部门之间大力协助、市区两级密切配合，全面、扎实、有序地推进了长城保护工作。

市文物局第95次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敬一亭举办。本次活动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外关系史学会执行会长万明老师以“明代青花瓷崛起与全球传播”为题做专题讲座，局系统30余名青年业务人员参加了活动。

12月16日 东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审理了原告孙晓丽等五人不服我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案，舒小峰局长出庭应诉。

北京海关向市文物局移交罚没文物暨《海关罚没文物移交工作办法》签字仪式在北京海关举行，舒小峰局长、于平副局长出席会议并联合签署了《海关罚没文物移交工作办法》，标志着海关罚没文物移交工作实现了依法、规范、长效合作机制。

12月20日 接待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博物馆馆长叶莲娜·尤里耶夫娜·加加林娜一行6人参观首都博物馆。

12月21日 市文物局联合北京拍卖协会，为全市文物拍卖企业管理人员150余

人开展了文物拍卖管理法规培训，并接受了企业现场咨询。

12月22日 市文物局组织召开2016年文物鉴定工作总结会，委员们交流了一年来的文物标的鉴定工作中的经验，研究了网络标的审核等问题。

市文物局、市教委和北京博物馆学会共同携手在宋庆龄同志故居举办了“2016年北京地区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等30余家博物馆和鸦儿胡同小学、北京十三中分校等20余所学校的代表。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同志在大会上致辞，北京博物馆学会秘书长崔学谙同志和博物馆处处长哈骏同志分别主持了讨论会。

12月23日 接待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一行10人参观首都博物馆。

市文物局召开北京地区部分文物商店管理工作座谈会。于平副局长勉励代表企业要诚信经营、合法经营，加强品牌建设，发挥示范作用，共同维护好北京地区文物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12月28日 副巡视员刘正品带领文物

监察执法队执法人员组成的督查组对东、西城文委和文博单位落实安全大检查工作情况开展督查。督查组听取了各区的文物安全工作汇报，并实地检查了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宁郡王府、孚王府、拈花寺、会贤堂、贤良祠等文保单位。要求各单位严格履行职责，遵守法律法规规定，排查安全隐患，确保“两节”各单位安全，坚决遏制重特大文物安全事故和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

12月 市文物局向市政府报送了《北京市文物局关于2016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向市法宣办报送了《北京市文物局2016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总结》；向市法制办报送了《2016年复议应诉统计分析报告》；向市审改办书面确认我局2016版“权力清单”内容。

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视察北京市副中心考古工作。

大高玄殿主体修缮、天安门朝房修缮等重点工程完工。

截至2016年12月 经过4个多月的奋战，在世园会园区内累计考古勘探220万平方米，已确认发现古代墓葬670座。

整理：伊凡